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FACULTY-ORIENTED INFORMATION EXPRESS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主办

- ◆ 经贸动态
- ◆ 金融动态
- ◆ 商务英语动态
- ◆ 法学动态
- ◆ 高教动态

8 Vol.5

2009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9 年第 8 期 • 总第 36 期)

顾问: 叶兴国 胡雪梅

主编: 王群 谢丹迎

编辑: 李静 唐永辉

向玲 李岩 孔凡娟

责任编辑: 李谋信

制作: 艾 致

Email: library@shift.edu.cn

目 录

一、经贸动态

姚景源: 四大指标好转 市场压力带来调结构良机.....	1
商务部: 中国近年来技术进出口逆差约 200 亿美元.....	2
经济增长和碳减排 一个都不能少.....	3
从区域经济规划频频推出看中国经济变局.....	4
2010 年经济转型紧扣两条主线.....	5
对未来通胀预期有七大现实依据.....	6
走低碳道路不可盲目跟风.....	9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及政策取向.....	11

二、金融动态

雷曼之后是迪拜?	20
迪拜的今天会是中国的明天吗?	20
迪拜危机对中国式泡沫发出警示.....	21
中国应重新评估迪拜危机.....	23
迪拜危机是高盛与奥巴马的国际阴谋.....	23
迪拜得救了.....	25
2010 年中国将会过热的与过冷的.....	26
明年货币政策表述为“适度宽松”实则收紧.....	27
人民币汇率的未来.....	29
中国离通货膨胀有多远?	30
中国离重蹈日本覆辙有多远?	32
不发生通货膨胀就发生货币危机.....	33
货币政策正常化, 明年或存五大意外.....	35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9 年第 8 期 · 总第 36 期)

顾问: 叶兴国 胡雪梅

主编: 王群 谢丹迎

编辑: 李静 唐永辉

向玲 李岩 孔凡娟

责任编辑: 李谋信

制作: 艾 致

Email: library@shift.edu.cn

目 录

三、商务英语动态

“It Actually Made Me Think”: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the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Classroom	37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Infusing Liberal Learning into a Business Curriculum.....	48

四、法学动态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	52
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	53
我们为什么要建议人大常委会审查拆迁条例?	56
征收·补偿·拆迁: 各归其位.....	58
废止中国二十一世纪初最大的“恶法”——《拆迁条例》.....	60
《物权法》激发企业生存新生态.....	63
法学教育应该追求怎样的“国际化”.....	65

五、高教动态

中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68
做强地方本科院校——地方本科院校的定位与特征研究.....	68
在不断改革中走向完善 高教改革需要大手笔.....	74
中央教科所发布“新版大学排行榜”引发关注.....	77
对外经贸大学: 奢侈品管理方向研究生班 2010 年招生.....	79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 多维度审视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理念.....	81
中国青年真的连提问都不会吗.....	84
从“超级市场”到“专卖店”——美国高校管理模式的新趋向.....	85

S I F T |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经贸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本期要目

- 经济要闻
- 对未来通胀预期有七大现实依据
- 走低碳道路不可盲目跟风
-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及政策取向

2009 年 12 月

第 8 期[总第 36 期]

姚景源：四大指标好转 市场压力带来调结构良机

经济 要闻

在 12 月 12 日于上海开幕的“2010 中国钢铁市场展望暨‘我的钢铁’年会”上，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结合 12 月 11 日公布的数据，对当前经济形势及下一步发展做了分析与预测。他指出，通过数据可以看到，我国自全球发生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已经取得重大成效，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取得明显改善。但同时也应看到，很多深层次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在即将到来的 2010 年，我国仍然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四大指标好转

“去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幅为 16.4%，二季度 15.9%，三季度 12.9%，到最后 3 个月则分别下降到 8.2%、5.4%和 5.7%，今年 1、2 月份甚至下降至 3.8%，但从 5 月份开始至 10 月份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而至 11 月份，这一数据已经上升至 19.2%。”习惯于用数据说话的姚景源依然用数字来证明其结论。

他表示，工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19.2%的增速已经超过去年一季度 16.4%的增速。其中，在 39 个行业中有 30 个行业在增长，表明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基本态势，已经实现“V”型反弹。“能够在全世界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来之不易，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万众一心的结果。”姚景源说。

对于失业率问题，他表示，西方有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指标，特指 16 岁至 65 岁的人，这一数据中国在 2004 年是 9.09 亿，比当时 7 大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还要多 3 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就业问题更显严峻。去年有人预测说，农民工将成为中国将要面临的最不稳定因素。但这种结果并没有发生，反而是最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又开始出现“招工难”，经济回升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

物价仍是人们关心的关键因素，去年关于通缩还是通胀的两种意见依然萦绕在我们耳边。11 月经济数据显示，CPI 同比增长 0.6%，实现由负到正的转变，但是环比仍然下降 0.9%。姚景源预测，12 月份 CPI 同比将维持增长状态，而环比依然难以转正。“今年总体上低位平稳，既没有通缩，也没有看到通胀。”

值得一提的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成为支撑 CPI 转正的主要因素。姚景源表示，这也向来是他的主张。他举例说，假设粮食增产 100 亿斤，农民人均收入仅仅才能增加 2 分钱；而如果总量不变，每斤粮食价格上涨 1 分钱，那么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 10 元。“这才是农民增收的最主要途径。价格的变动影响大于产量变动，对于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大影响。”

加上国家收支平衡也在进一步改善，4 大经济指标无疑显示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天赐良机

尽管有利因素不断增多，但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回顾危机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带来的便是外需的萎缩。

姚景源表示，去年以来，我国的出口额、进口额和进出口总额均出现负值，这在过去很长时间是没有的。2007 年 11 月的进出口总额增幅是 23.9%，去年却是-9%，其中出口由 22.8%变为-2.2%。进出口的下降导致相当数量的企业没有订单，减产、半停产甚至停产成为当时我们最常听到的词，上千万农民工不得已被迫返乡。

应该看到，2010 年我国仍然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依靠外需、投资拉动显然不是长久之计。长期与短期、国内和国外的困难交织在一起，有可能使来之不易的成果并不牢固。对此，姚景源表示，在继续完善一揽子方针政策的前提下，转变发展方式应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

“表面上看是对数据的冲击，在深层次上是对结构的冲击。”姚景源认为，保持经济增速并不是大问题，难点在于调结构，怎样调？

在生产上，要由主要靠一产支撑向一、二、三产特别是三产支撑转变。“三产不单是指餐饮等，更重要的是现代服务业，这恰恰是吸纳就业最多的行业”。目前，我国三产对 GDP 的贡献只占 40%，比美国低 40 个百分点，比全球平均还要低 20 个百分点。

在需求上，要由依赖投资、出口向依赖消费、投资、出口转变。一个危机来了，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种情况不能再发生了。”

同时，还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技术进步。“正是因为诸多不利因素给我们带来了市场压力，我们才能有转变方式、调结构的天赐良机。只要按照既定方针，把困难估计充分，措施落实扎实，增长就没有问题。”姚景源说。

作者：贾瑞涛 来源：《经济导报》2009 年 12 月 15 日

商务部：中国近年来技术进出口逆差约 200 亿美元

商务部与科技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技术出口的若干意见》。数据显示，多年来，我国技术出口金额远低于进口金额，进出口逆差约 200 亿美元。

为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优化出口结构，推动技术出口快速增长，提高技术出口在技术贸易中的比例，近日，商务部与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技术出口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我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大量成熟的产业化技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已成功实现电力、通讯、建材生产、石油勘探、汽车制造、化工和冶金技术出口并带动大量成套设备出口，对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推动出口结构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技术出口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多年来，我国技术出口金额远低于进口金额，进出口逆差约 200 亿美元。

《意见》从政策扶持、加强国际合作、完善管理和服务等三方面提出了政策措施，以支持企业积极出口成熟的产业化技术。一是在落实好现行政策的基础上，积极提供金融保险支持，推动科研机构承接境外研发业务，鼓励科技型企业“走出去”。二是要在进一步推动国际技术合作的同时，利用各种促进平台，组织举办技术出口推介和洽谈会，宣传我优势技术。三是要推动技术出口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





《意见》的发布，为推动成熟的产业化技术出口提供了政策保障。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意见》的实施。通过完善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推动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建设技术出口服务体系和交易平台，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来源：中新网 2009 年 12 月 15 日

经济增长和碳减排 一个都不能少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提出“到 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的自愿减排目标，这一与 GDP 相关的碳排放新概念——碳强度的提出，让欧美国家在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同时，也产生一些质疑之声：“为什么中国不提出绝对减排量，而是提出了一个与经济增长挂钩的相对值？”

根据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CDM 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杨宏伟的解释，碳强度公式中，分子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分母是 GDP 总量。与 GDP 挂钩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碳减排同样得到重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下降不以牺牲经济增长作为代价来换取。

中国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指标，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不开。尽管 2008 年中国 GDP 跃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 GDP 仍然很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全世界共同的目标，但保持经济增长也是发展的应有之义。要进一步到位地实现绝对碳减排，意味着减少能源消耗，或者迅速改变能源结构，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增长。在城市化、工业化共同推进的发展阶段，中国能源需求具有明显的刚性，而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

发展清洁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当然是降低碳排放的路径之一，但清洁能源的高成本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是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还是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升级，都需要大量技术、资金的投入。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囿于发达国家对部分技术的封锁，我国无法直接有效地利用清洁能源替代来改善能源结构。

在资金方面，近几年中国利用 CDM 机制获得了一些对清洁能源利用的支持，但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进行资金援助方面做的很不够。甚至近期有称中国风电定价偏低是为了“套取”CDM 补贴的言论出现。

事实上，当别的国家还在讨论自己的减排指标时，中国已经在实践自己的减排行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对中国并没有减排要求，而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提出 2010 年在 2005 年基础上减排 10%，这相当于二氧化碳减排 15 亿吨。

在缺少成熟技术、没有足够资金支持的背景下，我国主动提出 GDP 碳排放强度降低，是既立足国内发展实际，又承担国际责任的做法。要实现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一方面需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增长，减缓排放增速，另一方面 GDP 的增长也将影响最终减排目标的实现。据专家分析，碳强度下降 40%—45%，意味着未来几年我国 GDP 的增长率需要保持在 8%—9% 左右，这样的设计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碳排放减少路径。

但也不可忽视，减排的难度必将越来越大。“十一五”期间，为达到 GDP 能耗降低 20% 的目标，我国已经关掉了很多的小电厂、钢铁厂和水泥厂。可见，最容易减排的、容易提高能效的都已经为了达到“十一五”目标率先实施了，后续的减排需要对整体经济结构动“手术”，这将进一步考验决策者的决心和智慧。

作者：李阳丹 来源：中国证券报 2009 年 12 月 14 日





从区域经济规划频频推出看中国经济变局

今年以来,国家先后批复了九个区域发展规划,还出台了十一个产业振兴计划。由此带来资源配置及要素价格的变化,将会影响整个经济大局,并对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构成挑战。

观察今年中国经济走向,有些东西也许被人们轻视了。

今年以来,国家先后批复了九个区域发展规划,同时还出台了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十一个产业振兴计划。这么短的时间内推出如此多的规划和计划,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明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明年的政策调整空间也很有限。但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大变局的关口。

首先,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新的发展方式正在跃跃欲试。有别于前 30 年东部地区以点状或线状开发为特色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即将开始的新 30 年,将会以一种新的、动态均衡的网格状方式走出一条各地争雄、百花齐放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新型发展道路,将从地域空间入手,从根本上解放各地的生产要素,缓解各种结构性矛盾,缓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及收入差距。

从已公布的规划看,中国经济现已形成东、中、西部,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四大板块。同时,根据不同禀赋特点,又划分出若干个经济圈、经济带,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等。更进一步,还细分出若干个经济区。也就是说,从 1980 年设立深圳特区开始到今天,经过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摸索,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网格化均衡发展的条件,现在又通过各地的发展规划,将这种诉求表达了出来,紧接着要做的,就是全面实施这些规划。

其次,各地的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正在得到市场化重估,过去主要靠行政手段将生产要素向东部过度配置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在新的格局下,将会更多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以往那种主要靠优惠政策来谋取竞争优势的做法,在未来一段时间也许还会有用,但新的形势是,各地只有发挥本地的禀赋优势或区位优势,才能获取更多话语权、议价权,把经济增长的根系深植在自己的乡土上。

比如,广大中西部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森林、水、油气和矿产等,有丰富的社会人文资源,还有独特的区位优势,甚至包括人口优势和市场优势等,由此对东部地区就有了议价的条件。对于资源的经济属性,需要用经济的方式来处理。如“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就需要照顾输出地的利益。同样道理,如果在城镇化过程中把关联区域的经济价值也考虑进去,那么城乡一体化改革就活了。

再次,劳动力市场将出现明显变化,劳动力的地域流向会有新的态势,劳动力价格的地域差异也将会逐渐缩小。过去那种大量农民工往东走的景象会逐渐消失。而由于生产成本与生活成本日益高昂,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慢通道,大都市的吸引力将逐渐转弱。甚至反过来,由于中西部比较优势明显,出于资本逐利性的考虑,有可能出现东部资金、技术和人流往内地走的景象。

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比如,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明显呈“西高东低”走向。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东部增长 7.5%,中部增长 8.7%,西部增长 13.8%。另外,固定资产投资,东部增长 28.1%,中部增长 38.3%,西部增长 38.9%。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台资企业正在往东北、往内陆地区布局。在东部有些地区经济还没完全转暖的时候,就出现了“民工荒”问题。这些都是变局的征兆。

此外,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重新洗牌之后,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资本流、信息流等,都会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大开大合”的重组配置。由于东部地区受到内外两头挤压,





其产业形态必然要往高端寻找出路,这将对不同偏好的资金、技术、资本、人才流向构成影响,也将非常有利于多样化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资源的议价、定价问题,自然而然地就摆在了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面前,甚至各类市场本身的建设也将面临一次大洗牌。由于这场大变局将是又一次前所未有的利益大挪移、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大整合,因此,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将是新的机会。

当然,从各地的规划看,有相当一部分只考虑了经济因素,缺少对自然承载力与人文价值的评估,同时在总体上也缺乏一个系统标准。这是有隐患的,不能不预警。

作者:亚夫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9年12月11日

2010年经济转型紧扣两条主线

刚刚闭幕的本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明年的经济工作将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专家分析认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了刺激消费和产业结构调整两大主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的真正开始。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将为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结构调整主导明年调控思路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此,专家指出,结构调整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宏观政策的着力点。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明年我们要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大力促进结构优化,即改进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提升结构调整、科技支撑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培育带动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天相投顾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定调的趋向是在总量增长的目标实现之后,逐渐过渡到以一揽子结构调整为标的的政策走向。这种政策走向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既是对过去政策和经济运行的修正,也是开启结构调整提升未来经济动力的开始。

天相认为,结构调整将突出体现在明年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搭配中。在宏观经济层面,主要体现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在宏观政策层面,主要体现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组合中的“结构性渐退”,即,财政政策突出实施重点,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建项目;货币政策保持针对性和灵活性,管理好通胀预期。

刺激消费是调结构重点

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刺激消费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专家认为这完全是切合时宜之举。因为,目前世界经济的前景并不明朗,出口不可能大幅增长,过度投资又将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因此未来国内经济的增长还需依靠消费。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表示,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消费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失衡最主要的表现。因此,下一步调结构主要工作之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从而促进消费。贾康对此表示认同。他同时建议,下一步应加大对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力度,以解除居民后顾之忧,促进扩大消费。

贺铿同时表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对提高国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说,改善消费、促进消费最重要的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大力推进城镇化、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对提高农民等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强调了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并提出壮大县域经济,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专家表示,中央提出城镇化作为发展方向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开始,城镇化将使得中国经济全面受惠,城镇化道路将培育更多的城市消费者。

产业结构调整要两手抓

要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在当前形势下,调整产业结构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其中,抑制产能过剩,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推进节能减排,抑制产能过剩。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产业结构调整在明年非常关键。首先,信贷适度宽松的政策必须以此为前提,既要遏制产能过剩领域的盲目扩张,也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其次,产业升级、制度创新是我国目前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如果不能及时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下功夫,我国目前良好的经济形势肯定无法得到延续。

在抑制过剩产能方面,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日前明确指出,当前,在保增长的同时,必须把结构调整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此,发改委将尽快修订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从宏观政策方面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以引导。

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近日,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逐步使新兴战略性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申银万国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认为,中央提出要抓紧研究提出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将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他预计,明年国家将会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空间海洋开发、地质勘探等7大领域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节能减排以及淘汰抑制落后产能都是政府的战略考虑,将对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他说。

作者:肖波 来源:《证券时报》2009年12月09日

专家 观点

对未来通胀预期有七大现实依据

在货币政策持续刺激下,未来的通胀形势将会日趋明显。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中存在价格粘性和预期粘性,因此会出现经济较快增长而物价相对合理的表现。预计明年这种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自然而然地保持下去。因此,货币政策应前瞻性地考虑适度的市场流动性,以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

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使人们对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向产生了明显歧见。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不存在通货膨胀,今明两年也不会有。甚至有人把物价上涨看做好事;另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近在眼前,预计明年的通胀形势将会相当严峻。

对此,本人认为,由中国经济的固有特征所决定,通胀预期具有现实依据,明年下半年后发生通胀的概率很大。为此,货币政策在保持适度宽松的同时,也要防微杜渐,以引导经济在低通胀的环境下平稳发展。

一、同比与环比经济数据回暖,通胀预期正在形成





尽管各方对通胀的看法存在分歧,但商品市场在通胀预期中有先知先觉的反映。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预示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心。在美元走软的刺激下,黄金和原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以及资产价格都在稳健上扬。而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将总体维持并继续支持对通胀的预期。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0.5%,比上月降幅缩小0.3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5.8%,降幅比上月缩小1.2个百分点。这表明,物价同比降幅进一步收窄,尽管CPI环比11月份下降0.1%,但自下半年以来CPI环比总体上是上升的,PPI环比更是出现了连续7个月的上涨,总体数据呈回暖态势。

由此预期,在2009年年底, CPI将触底回升,并由负转正,通胀预期持续强化。而在2010年下半年后,通胀问题还可能比较突出。有鉴于此,政府已经把管理好通胀预期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表明也许通胀现在还不是问题,但通胀预期有其现实依据。

二、资源和公共品价格改革直接触发通胀预期

最近,资源和公共品价格改革已经选择在通胀要来未到来的“时间窗口”启动了。11月20日起,全国非民用电价每度平均提高2.8分,这是继石油、水等资源价格改革后,电力作为能源价格改革的又一动作。今后还将有资源和公共品价格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推出,势必引起多种能源资源类产品价格大幅度涨价,强化新一轮通胀预期。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分析,2009年居住类在CPI中的比重为14.69%。其中,水费、电费、液化石油气、管道燃气、其他燃料五项占居住类比重的40.8%。也就是说这些公共品在CPI中的比重约为5.99%,高于猪肉在CPI中3.03%的比重。

如果说引发上一轮物价上涨的诱因之一是猪肉涨价,那么现在比猪肉对CPI影响更大的公共品的一系列大幅涨价,也可能推动未来物价水平的上涨。资源价格的改革对生产成本有直接影响,对居民生活成本也有间接影响。而现在的资源价格还只是反映资源的开发成本,还没有反映环境成本、安全成本、资源补偿成本等,还没有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资源价格仍然是偏低的,今后改革的路径还很长,价格上行的空间很大。

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回上涨趋势,必然引致输入型通胀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新走高是人们对通胀预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上一轮通胀的生成机制中,输入型通胀构成了重要因素。我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经济成长阶段,对大宗商品有着强烈的需求。大宗商品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强烈,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明确,长期看总是呈现上行趋势。而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其走势是引领国际商品价格的风向标。现在,弱势美元有利于美国降低对外债务的实际价值和总体负债水平,有利于美国刺激出口和扭转经济颓势,促进复苏和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可能把铸币权运用到极致、主动实施弱势美元的策略。

而除了需求的增加、美元的走软外,非理性的投资以及通胀预期本身也推动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全球过剩资本随着经济的复苏会向大宗商品市场流动,经济越是复苏这种流动趋向就越明显,因而全球大宗商品仍将延续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上涨态势,这将再次对我国构成较强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四、农副产品价格仍然有上涨的压力

在我国CPI的商品构成中,食品类权重占1/3,食品价格的上涨始终是我国每次物价上涨周期的先导因素。当前我国肉禽蛋供应有保证,短时期内还不具备大幅上涨的条件。但也要看到肉禽蛋已经有所上涨。





有人认为,我国粮食连续六年增产,生猪、油料作物、棉花的生产能力也达到历史新高,食品供应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进而否认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趋向。不能简单地这么看,当经济复苏来临时,农民工将会重返城市,重新由农副产品养殖回到城市工厂就业,会从金融危机时期被迫回到农村务农、从事家禽养殖等食品生产,再次进入城镇企业就业。

即使那些不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由于农药、化肥、饲料等生产成本的上升,其生产的农副产品价格也会上涨,况且由于他们有返城打工与原地务农的收益比较,也会提高农副产品的劳动力成本,这将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因此,从总体上说,农副产品生产的比较利益是全社会比较利益的最低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价格的上涨是必然要求。

五、境外资本加速流入增加通胀压力

美元贬值是我国面对的外部环境不确定的一个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好转,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中国正成为国际“热钱”逐利的战场。热钱的流入,使国内原本就宽裕的流动性更加宽裕。在全球流动性较多,在美元汇率持续下行的状态下,外汇净流入的态势有可能加剧,进一步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增加通胀压力。

六、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是通胀形成的根本原因

从通胀预期转化为现实问题,不可能与货币供应量无关。通胀形成有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结构性通胀三种,输入型通胀只是另一角度的分析,可以看成是成本推动的一种形式。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可以直接拉动总需求膨胀进而导致通货膨胀。但成本推动等其他形式通胀也不可能与货币供应量增长无关。如果没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成本推动因素只是一次性的物价上涨,要使物价持续上涨必须有货币供应量的适应性跟进。所以,现在有人说通胀与货币供应量无关,这种说法与经济理论、与经济事实都是不相符合的。从我国历史情况看,凡是货币供应量超过20%以上的过快增长,或迟或早都会发生通胀。

当前,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继续呈现同比、环比快速增长的局面,不能不强化通胀预期。10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9.42%。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32.03%。如果用经验判断,M2增长率比GDP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高出20%以上,这是历史上所没有的。而且 $M2\text{增长率} = (GDP\text{增长率} + \text{物价上涨率})$ 这一公式本身一直被认为是宽松的,是迁就通胀的货币投放。

就M1增速来看,也是自1996年1月起可查月度统计以来,近14年最高的增速。与此同时,代表流通中的现金M0同比也增长了14.09%。体现微观经济活跃度的M1增速继续超过M2(9月份高出0.2个百分点),高出2.61个百分点。M1增速持续加快是资金活期化的表现,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在经济复苏、经济活动趋于活跃、民间投资启动时,资金从定期向活期转变,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扩大了流动性总量。

诚然,在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时期,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对通胀的形成不会立竿见影,扩张的货币供应量有相当大部分沉淀下来,无法直接拉动通胀。但是,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货币流通速度会加快。不仅中国,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为拯救金融危机、提振经济都连续大幅度地向市场注资,扩张流动性。这些滥发的货币在经济疲软时沉淀,在经济复苏时活跃,流动性就会急剧增长。这种货币流通速度由缓慢到加快的变化,往往比货币供应量本身的增长更具威力。

七、预期因素对通胀形成具有“促进”作用

预期是经济活动主体对有关经济变量未来值的预见。通货膨胀预期即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见。预期对通胀的形成效应有几个不同阶段。当前经济处于探底回升和复苏阶段,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投放急剧增加,这一阶段有预期陷阱效应,过多的货币量都被预期陷阱吸收,货币沉淀性





强,经济活动也因为通货紧缩或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而不够活跃,经济复苏困难且容易反复。而今年的中国经济大体处于这种状态。

在货币政策的连续刺激下,通胀慢慢有所滋长,但这时货币增长对物价上涨的冲击仍然比较迟缓,价格粘性导致预期粘性,经济逐渐活跃,经济增长而物价较低,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把名义价格和收入增加当作实际收入增加,有一种货币幻觉。在这里,预期粘性起到了缓冲通胀的作用。我们预见,2010年中国经济将会处于这种状态。

在通胀预期初期,由于适应性预期和货币幻觉,预期的通胀率低于实际通胀率。但是,经济活动主体逐步会感觉通胀率比想像的高,就会矫正适应性预期,使预期的通胀率和实际通胀率水平相吻合。实际上,如果这一时期对通货膨胀有一个准确预期,政府下决心适度调整宏观政策,至少是调整力度和节奏,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那么对今后可能发生的通胀的治理就十分有效。如果错过这一时期,就不能对通胀防微杜渐,其后对恶性通胀的治理难度大、代价也大。

作者: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王历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9年12月07日

走低碳道路不可盲目跟风

低碳是一个相对概念,低碳经济的核心是生产和消费活动向着“低碳化”方向发展,没有一个具体阈值可以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为低碳。长远来说,低碳道路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近期来说,走低碳道路需要考虑许多现实条件,不可盲目跟风。在全球将在争夺资源、抢占发展先机等方面激烈竞争的形势下,中国借用低碳经济概念,应先消除误解,从实际出发,在扎实、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开展试点工作,进行战略规划,走出一条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之路。

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是一个简单、朴素的概念,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节能。无论在生产还是生活中,强调节约使用能源特别是碳基能源。节能自然涉及提高能效,但仅靠提高能效是不够的,还必须减少总的能源需求。二是改善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碳密度(即单位能源中碳的含量)。全社会能源消费和能源结构应向低碳方向转化。煤炭的碳密度比较高,天然气的比较低,风能、太阳能更低。

低碳经济的概念由英国首先提出,低碳社会的概念最早由日本提出,后来逐渐扩及全球。各国之所以对“低碳”感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全球开始出现节能趋势。目前所说的低碳经济是最近几十年来节能和提高能效的趋势的延续。另一方面,各国对气候变化问题日益重视,特别是对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普遍关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各国采取的策略不同。欧洲把它既当成挑战,又当成重大机遇——可以以此为契机、动力和压力,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渐渐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在此认识基础上,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在生产节约和消费节俭的理念基础上,日本提出比“低碳经济”更广泛和全面的“低碳社会”概念。这往往令人联想到前几年关于循环经济和循环社会的概念。一般人认为循环经济的概念和实践首先出现于德国,却在日本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

中国低碳经济背景独特

低碳经济、低碳社会的概念近几年传到中国。与日本、欧洲等有所不同,中国提发展低碳经济有独特背景。

其一是节能减排。近年来,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耗能量大幅度增加,开始注重节能减排,要求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效率,转变原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十





“一五”规划中将“单位 GDP 能源消耗（能源强度）减少 20%”列为最重要的约束性指标，能源强度下降本身就是经济的低碳化。前几年，中国开始提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促进法》也于 2009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低碳经济”的含义、作用与循环经济有一定承继关系与交叉重叠。

其二是中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即以大规模、高速度为基本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当前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对今后的能源消耗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城市成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可操作的综合政策单元，无论是低碳经济、低碳社会、循环经济，都能在城市单元上得以实施。在此背景下，低碳城市的说法不胫而走。可以说，在中国，“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发展是以“低碳城市”为基本形式和内容的。

走低碳道路的动力

低碳经济被提上日程，是历史的必然。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人类依赖化石能源创造了很多奇迹；然而从长远来看，石油也好，煤炭也好，总有一天要烧完，人类终究要解决化石能源耗竭后的能源问题。现在，我们遇到更加迫切的问题——污染和气候变化。这两个问题不可能等到化石能源烧完后再去解决，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应运而生。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是否发展低碳经济存在动力问题。如果说动力来自于政府，马上面临的的就是进行规划，制定相关政策、细则、实施方案等。动力还可以来自企业。在一定条件下，企业有节能减排动力。当然，其直接目的可能是为了降低成本。节能和降低成本之间如何联系呢？通过能源价格。如果传统的高碳能源价格很高，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必然就会减少使用，从而降低碳排放。这样，即便政府不去做具体的规划，企业也会有所行动。

怎样让高碳能源价格高呢？两条途径：让市场自主调节，按商品的稀缺程度决定价格；或者通过财政、金融、货币等经济杠杆提高价格。我国最近探讨征收燃油税，就是通过提高税收来调整石油资源的消费。

因为人口多、资源相对稀缺、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竞争中，中国没有太多优势。从发展模式来讲，中国既不能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式掠夺资源之路，也不能像当代西方国家那样用全球化的方式转嫁资源、环境压力，肯定要走低碳发展道路，必须把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研究出来，或者自主创新，或者引进——我们管它叫跨越式发展也好，和平崛起也好，实质上就是要逐步减少对高碳能源的依赖。可以肯定的是，在发展新能源及其相关产业上，我们试图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起跑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中国正在走低碳化道路

按照统计，从 1980 年到 2000 年，中国的 GDP 翻了两番，能源消耗翻了一番，也就是说能源强度下降了一半。2000 年后我国的能源强度一度上升，但从 2006 年“十一五”规划开始，我们的能源强度每年都在下降，而且按照规划，2010 年能源强度要比 2005 年底下降 20%。这是不是在向低碳经济转型呢？当然是。

近几年，一些地方开始提出建设“低碳城市”。2008 年 1 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正式启动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上海、保定入选首批试点城市，保定正在做低碳城市的发展规划。

中国经济的低碳化发展，如果可以用一个指标来衡量，比如万元 GDP 的碳排放，那么它比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家、发达国家的进程要快得多。我们对 1990 年到现在，中国、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低碳化发展情况做了研究，得出很多数据。总体来说，中国万元 GDP 的碳排放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还是比较高，但中国的低碳化发展速度比那些国家快得多。





慎防从概念出发

从长远来说,低碳化道路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从近期来说,必需考虑许多现实条件,不可盲目跟风,因为每一个地区和城市,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地理位置等条件各不相同,发展道路也不可能一样。中国煤炭比较丰富,石油、天然气相对贫乏,要想发展,当然依靠煤炭资源。我们可以探讨完全意义上的低碳发展方向,但需要一个过程,起码近期我们必须考虑资源条件的限制。

中国现在对低碳经济谈得很多,这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重视程度,但一定要慎防从概念出发的倾向。什么叫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做扎实、深入的研究,了解全世界的情况,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试点,无论成败,都对今后的发展有帮助。

总之,无论是低碳经济、生态经济还是循环经济,不管冠以何种名目,我们真正实体的、现实的经济和社会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规律,不会因为冠以不同的名目就一下子发生变化;同时,一定不要因为名称的改变,使得我们对于现实本身的认识产生偏差。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的概念,根据自身的情况,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之路。

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齐晔 来源:《光明日报》2009年12月14日

政策 探讨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及政策取向

摘要:因素分析表明,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是我国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消费率下降也有较大影响,城市化率提高是我国消费率变动的唯一正向促进因素。因此,扩大我国居民消费应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主要着力点,努力提高两个比重,调整三大结构,深化四项改革。

按消费主体分,总消费可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城乡居民消费是总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总消费增长、消费率的变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动趋势看,农村居民消费是我国消费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消费增长速度看,1979-2007年,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5.7%,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政府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2%。只有农村居民消费增速低于总消费增速(9.4%),是总消费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

从消费率看,2007年我国总消费率为48.8%,比最高峰时的1981年下降了18.3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了229个百分点,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度为-125.3%;城镇居民消费率上升了5.9个百分点,贡献度为32.3%;政府消费率下降了1.3个百分点,贡献度为-7%。农村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是我国总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消费贡献率看,2007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9.4%,比1981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3.8个百分点,占比为81%;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占比为11%;政府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占比为8%。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是我国消费贡献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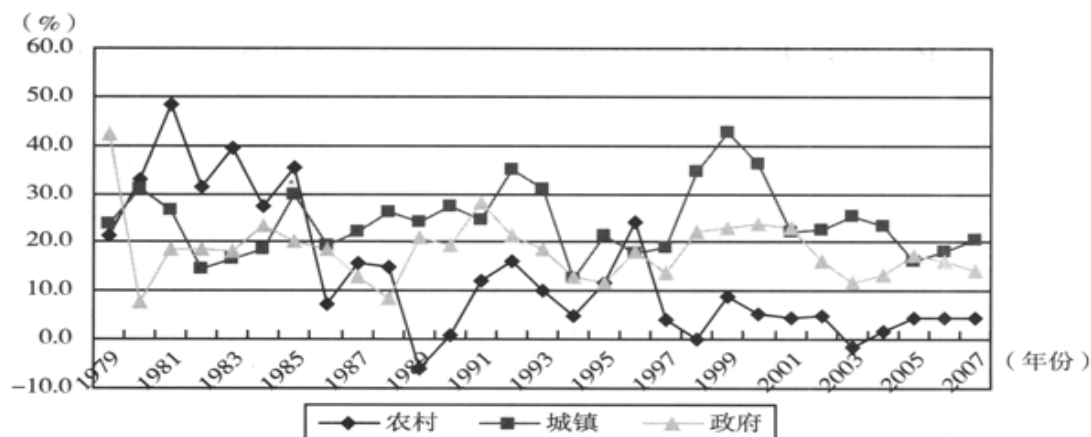


图1 1979~2007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②

二、收入增长是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但人口因素对消费增长有重大影响

居民总消费=总人口×人均消费，居民总消费发展指数=总人口发展指数×人均消费发展指数。而人均消费发展指数=人均收入发展指数×居民消费倾向发展指数。进而有：居民总消费发展指数=总人口发展指数×人均收入发展指数×居民消费倾向发展指数。由于各指标增长率都较小，总消费增长率近似等于人口增长率、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倾向增长率之和。因此，可以通过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来分析消费增长。

1979~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8.8%。其中，人口增长贡献了1.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2.5%；人均收入增长贡献了8.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93.2%；居民消费倾向下降贡献了-0.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7%。

分城乡来看，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其中，人口增长贡献了4.4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0%；人均收入增长贡献了7.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6.4%；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贡献了-0.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4%。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5.7%。其中，人口增速下降贡献了-0.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3%；人均收入增长贡献了7.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24.6%；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贡献了-1.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9.3%。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居民消费、收入及人口增长情况

%

	全国		农村		城镇	
	增长率	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	增长率	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	增长率	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
人口	1.1	12.5	-0.3	-5.3	4.4	40.0
人均收入	8.2	93.2	7.1	124.6	7.3	66.4
平均消费倾向	-0.5	-5.7	-1.1	-19.3	-0.7	-6.4
居民消费	8.8	100.0	5.7	100.0	11.0	100.0

从表1可以看出，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是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对农村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城乡居民消费增长是负的贡献，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要大于农村；人口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有较大贡献，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却是负的贡献。





三、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城镇化进程对提高消费率有重要促进作用

由于城镇居民消费率 = (城镇人口 × 城镇人均消费) / (全国总人口 × 全国人均 GDP) = 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占全国人均 GDP 的比重。而人均消费 = 人均收入 × 居民消费倾向，进而有：城镇居民消费率 = 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全国人均 GDP 的比重 × 居民消费倾向。因此，居民消费率的变动可以看成是城乡居民人口比重、人均收入占人均 GDP 的比重和消费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 GDP 的比重均呈下降态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91.7% 下降到 2007 年的 53.4%，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 -300%。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35.7% 下降到 2007 年的 20.3%，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 -44%。

1978 年以后，随着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 and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乡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呈反向变化。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 1979 年的 18.4% 上升到 2007 年的 44.4%，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 533%。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 1979 年的 81.6% 下降到 2007 年的 55.6%，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 -30%。

1978 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 1978 年的 1.18 下降到 2007 年的 0.86，下降了 0.32，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 -133%。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 1978 年的 1.03 下降到 2007 年的 0.79，下降了 0.24，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 -26%。

各因素对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如表 2 所示。

表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人均收入和消费倾向对消费率变动的贡献 %

	农村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消费	总消费
人口比重(结构)	-30	533	135
人均收入占人均 GDP 的比重	-44	-300	-152
平均消费倾向	-26	-133	-76
合 计	-100	100	-93

说明：使消费率提高为正，使消费率下降则为负。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又使得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收入增速，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进而导致总消费率的下降。1979-2007 年，居民消费率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度为 -93%。其中，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 -152%，城乡居民人口结构变动（即城市化率的提高）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 135%，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 -76%。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是我国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消费率下降也有较大影响。特别要指出的是，城市化率提高是我国消费率变动的唯一正向促进因素。城镇化率偏低，城镇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也是我国消费率低、投资和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





四、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分布结构。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国民收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

（一）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导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

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居民收入最主要来源的劳动者报酬在 GDP 中的比重下降；二是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

表 3

我国收入法 GDP 构成

%

年份	劳动者报酬	固定资产折旧	生产税净额	营业盈余
1993	49.5	14.0	11.7	24.8
1994	50.3	13.8	12.0	23.8
1995	51.4	13.0	12.3	23.3
1996	51.2	12.7	12.9	23.2
1997	51.0	13.0	13.6	22.3
1998	50.8	13.2	14.3	21.7
1999	50.0	13.4	14.9	21.7
2000	48.7	14.1	15.3	21.9
2001	48.2	13.9	15.6	22.2
2002	47.8	13.8	15.6	22.9
2003	46.2	13.9	15.8	24.2
2004	41.6	14.1	14.1	30.3
2005	41.4	14.9	14.1	29.6
2006	40.6	14.2	14.6	30.7
2007	39.7	14.8	14.2	31.3

资料来源：《GDP 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根据各省收入法 GDP 构成加总计算，2004 年以前的数据已做了调整。

按收入法核算，GDP 可分为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表 3 数据显示，在我国 GDP 结构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在 1995 年以后开始逐年下降，固定资产折旧所占比重基本稳定，而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2007 年，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仅为 39.7%，比 1995 年下降了 11.7 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 GDP 的比重为 14.2%，比 1995 年提高了 1.9 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 GDP 的比重为 31.3%，比 1995 年提高了 8 个百分点。尤其是 2003 年以后，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出现较快下降，而营业盈余比重有较快上升，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

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分配结构来看，也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1992-2005 年，企业（包括金融部门）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 11.7% 上升到 20%，上升了 8.3 个百分点；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先降后升，2005 年为 20.5%，与 1992 年接近；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 68.3% 下降到 59.4%，下降了 8.9 个百分点。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企业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基本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而居民所占比重基本上是逐年下降（见表 4）。尽管 2006-2007 年数据没有公布，但作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的劳动者报酬在 GDP 中的比重继续下降，可以判断出国民可支配收入向企业集中的趋势还在继续。





表4

我国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构成

%

年份	企业	政府	居民
1992	11.7	20.0	68.3
1993	15.7	19.7	64.6
1994	14.5	18.5	67.0
1995	16.2	16.5	67.2
1996	13.7	17.9	68.4
1997	13.1	18.3	68.6
1998	13.5	18.1	68.4
1999	14.7	18.1	67.2
2000	16.6	19.2	64.2
2001	17.5	20.5	62.0
2002	18.0	21.0	61.0
2003	18.2	22.0	59.8
2004	23.3	18.9	57.8
2005	20.0	20.5	59.4

资料来源:《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8)》。

(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大幅下降。

1983年以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基本上逐年下降,从1983年的66.9%下降到2007年的27.3%,下降了39.6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1983年的33.1%上升到2007年的72.7%,提高了39.6个百分点。尤其是2000年以后,两者有加速变动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差距急剧扩大。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是一个客观规律。但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提高到2007年的3.33;二是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于人均收入的差距所导致的,人口变动不是主要原因(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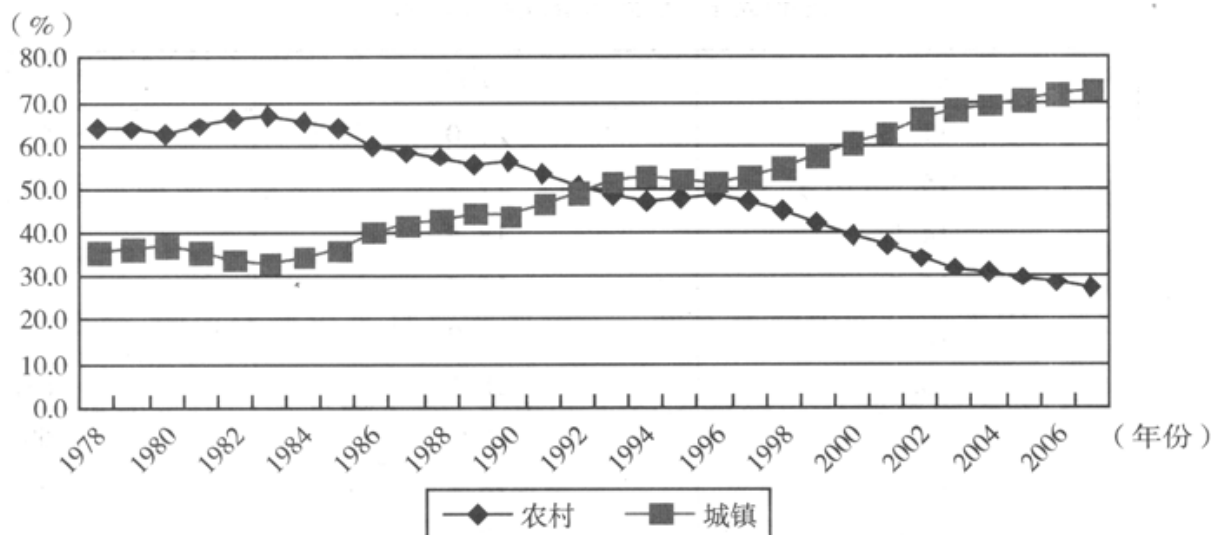


图2 城乡居民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





(三) 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占人口比重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重在下降。

以城镇居民为例, 2000-2007年, 按各收入组权重计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加权平均增长 10.9%。其中, 占城市家庭 60% 的中等收入以下组的贡献率只有 52%, 占城市家庭 40% 的中等收入以上组的贡献率达到 48%。10% 的最高收入组的贡献率为 14.3%, 而 10% 的最低收入组的贡献率只有 6.2%。这说明, 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高收入家庭贡献的, 居民收入正在向少数高收入群体集中, 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增长较慢, 收入比重下降。

(四)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导致社会消费倾向下降。

一般来说, 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低, 而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 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 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反之, 收入分配差距越大, 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越低。利用城乡居民住户资料和基尼系数(1990-2007年)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收入分配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成反比关系, 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 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且,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大。

五、工资性收入增长较慢是城镇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 也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从城镇看, 与劳动者报酬对应的工薪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渠道。1990-2007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 13.9%。其中, 工薪收入年均增长 13.7%, 比重从 76.1% 下降到 74.2%, 是主要收入来源, 也是导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因素。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 14.7%, 比重从 21.7% 上升到 24.6%, 是第二收入来源。经营净收入年均增长 24.5%, 比重从 1.5% 上升到 6.8%, 是增长最快的部分, 也是第三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 20%, 比重从 1% 上升到 2.5%, 增长较快但比重仍然很低(见表 5)。

表 5 **1990 ~ 2007 年我国城乡**
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

项 目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工薪收入	13.7	15.4
经营净收入	24.5	8.9
财产性收入	20.0	9.1
转移性收入	14.7	12.0
社保等支出	36.0	
可支配收入/纯收入	13.9	11.1

从农村看, 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1990-2007年,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名义增长 11.1%。其中, 家庭经营纯收入年均增长 8.9%, 比重从 75.6% 下降到 53%, 仍是主要收入来源; 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 15.4%, 比重从 20.2% 上升到 38.6%, 是第二收入来源, 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 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 12%, 2007 年比重达到 5.4%, 是第三收入来源; 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 9.1%, 比重从 4.2% 下降到 3.1%。从发展趋势看, 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还会持续提高。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较大的是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07 年, 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接近 90%, 转移性收入的贡献率达到 32.8%; 而经营性收入的贡献率为-13%, 起到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财产性收入差距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不大, 但有快速增加之势(见表 6)。





表6 各项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 %

年 份	1990	1995	2000	2006	2007
工薪收入	122.7	112.2	93.8	90.5	89.6
经营净收入	-60.2	-38.9	-29.3	-13.7	-13.0
财产性收入	-1.6	1.8	2.1	1.8	2.3
转移性收入	39.9	24.7	33.8	33.3	32.8

还有两个现象需要特别引起关注：一是转移性支出实际上在扩大城乡差距，2000年以后其对城乡居民差距的贡献率始终在33%左右；二是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增速，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并对中低收入家庭消费产生较大影响。这说明政府支出结构还不太合理。

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还有其他原因，如历史文化、社会年龄结构、流动性约束等，但最直接、最主要的还是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城市化进程缓慢。

六、扩大消费应将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主要着力点

综合国家有关政策，从中长期来看，扩大我国居民消费将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主要着力点，不断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总的思路是：提高两个比重，调整三大结构，深化四项改革。即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政府支出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资源价格和税费改革，垄断性行业改革，税收制度改革。

（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采取综合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一是合理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并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二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适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和完善工资指导价，保证非垄断行业的工资平均增速要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大政府的货币化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扶贫标准、低保标准、抚恤标准和养老金发放水平。四是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农产品价格和生产，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鼓励农民外出务工、本地非农就业和回乡创业，增加工资性收入；继续扩大和完善对农业生产“直补”和社保补贴，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五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持股市的健康发展，扩大股市的财富效应；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力度，减小房价过快增长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发挥住房的长期财富效应；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六是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按照“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整顿分配秩序；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三次分配机制。

（二）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增加对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明显促进作用。近几年，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支出有较快增长，但其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还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导致居民的教育、医疗、社保支出负担率较高。因此，今后我国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支出的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增长快于政府总支出增长，大幅度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一是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二是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应对体制转轨和人口老龄化的财政支持机制；三是完善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机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四是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的收入风险；五是完善保障性住房的资金筹集机制。

（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调整城乡二元结构。

在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居民消费倾向这三个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中，城镇化水平是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率提高的唯一因素。将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战略举措，这一点正在成为决策共识。从国情出发，我国城镇化的重点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变成市民，让农村消费变成城市消费。加快农民市民化的核心是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以及附属其上的城乡二元福利制度，实行以稳定就业和住所为基本条件的户口迁移准入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实现城乡居民身份统一、机会均等、权利平等。

户籍制度改革将因地制宜，先试点后推开，循序渐进。近期，可能全面放开县城和镇的户籍管理制度，适当放开中等城市入户条件，鼓励农民转移到县城及中等城市就业和居住。同时，加强社会管理配套制度改革，进一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为落户农民提供均等的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建立城乡社保的续接制度。

（四）深化资源价格和税费改革，完善资源资产的收益分配制度。

我国一些基础性资源产品价格还受到管制，未能有效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而几乎所有的资源产品价格都未真实反映环境和社会成本。资源产品价格低估，一方面导致企业投资成本偏低；另一方面降低了居民的要素和财产收入，是投资和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深化资源价格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措施，这一点已被中央有关文件多次强调。今后，资源价格改革将与完善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社会性管制、生态补偿制度、资源税费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一是建立“监管统一、分类指导、分级管理、流转有序、运营科学”的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切实解决资源所有权的“虚位”问题，完善探矿权和采矿权的转让方式。二是对能形成有效竞争的资源产品推行市场定价，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比价关系，对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环节实行有效的价格监管。三是加强社会性管制，以安全、环保、质量、劳动保护等作为项目立项核准的主要依据，建立统一有效的行政监管体系，使社会成本能充分内部化。四是完善税收制度，加快改革资源税，按照稀缺性高低调整消费税，适时开征环境税。五是完善资源性资产的收益分配制度，建立政府对居民、企业对居民的多形式生态补偿机制，依法保障城乡居民的土地权益，抑制土地收益过度向政府倾斜，建立对低收入人群的价格补贴制度。

（五）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电力、铁路、电信、石油、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的收入增长过快，是近年来国民收入向企业集中、居民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的主要原因。根据列入政府议事日程的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今后将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实行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在能够引入竞争的环节尽可能地引入竞争，并在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之间形成平稳连接。二是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规范红利资金的收缴、使用程序，将国有企业红利纳入财政预算，并优先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三是建立垄断企业工资增长约束机制，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四是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确定管理者与职工收入的合理比例。

（六）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发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核心作用。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具有“累退”性,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要高于高收入群体。而且,我国个人所得税对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还很小。因此,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核心作用,就必须深化改革,增加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流转税的比重,使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大体均衡。这一点相关决策部门也已达成共识。

一是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征管和调节。调整超额累进税率,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水平,扩大低税率的适用范围。按照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原则设计税率级数和级距;根据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对扣除标准进行适当调整,并考虑地区差距。完善纳税信息档案制度,加强对财产收入的分配调节。二是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对有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垄断企业的超额垄断利润实行特别税收。三是尽快开征不动产税。在不动产的保有环节,将目前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三个税种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房地产税,税率采用累进制,并与单户面积和容积率挂钩。四是条件具备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特别消费税,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 金三林 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66期



金融动态

JIN

RONG

DONG

TAI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9 年 12 月

第8期 [总第36期]

目 录

- 雷曼之后是迪拜？
- 迪拜危机对中国式泡沫发出警示
- 迪拜危机是高盛与奥巴马的国际阴谋
- 2010 年中国将会过热的与过冷的
- 明年货币政策表述为“适度宽松” 实则收紧
- 人民币汇率的未来
- 不发生通货膨胀就发生货币危机

>>>>>>>>>>>>>>更多

迪拜危机

雷曼之后是迪拜？

阿根廷 2001 年的违约并非毫无前兆。雷曼(Lehman)破产也是如此。但两者都对市场产生了冲击。现在或许轮到迪拜了。投资者担心, 迪拜最大国有集团迪拜世界(Dubai World)暂停偿债, 是其大约 600 亿美元债务被迫重组的序曲。人们不得不对海湾区内外的国家的风险进行重新定价。银行股股价昨日大幅下挫。鉴于在阿联酋大约 160 亿美元的风险敞口, 汇丰(HSBC)成为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一家银行, 股价下跌 5%。美元和德国国债则出现上涨。

但这真的如此令人吃惊吗？从“巴别塔”(Tower of Babel)到吉隆坡的“双子星塔”(Petronas Towers)，建筑物高度与狂妄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历史关联。将于明年完工、高 810 米的比斯迪拜塔 (Burj Dubai) 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让投资者感到意外的，或许是迪拜相对疲弱的债务偿付能力。迪拜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750 亿美元，而其国有企业在 2011 年年底前必须偿还约 220 亿美元的债券。与此同时，迪拜税制环境宽松，碳氢化合物收入不高，财政持续维持赤字。因此迪拜未来的资金来源只能是出售资产、发行新债或从更富裕的邻国阿布扎比获得支持。阿布扎比坐拥资产规模达 6300 亿美元资产的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问题不在于它能否提供帮助，而是它愿意吗？如果愿意的话，又会向哪些资产提供援助，以及条件是什么？

如果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外国债权人将面临艰难的局面。当地法规普遍不利于债权人。伊斯兰债券(sukuk)的特性或许是另一个搅局的因素。有利于投资者的一点是，阿联酋执政王族可能会忌惮名誉受损。由于可以依赖信用保险，贷款机构如今已不太愿意接受惩罚性或自愿的债务重组方案。因此，海湾国家推行边缘政策的任何迹象都会加大（而非降低）违约的可能性。

作者：FT 评论家联合撰写，译者：君悦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9-11-27

迪拜的今天会是中国的明天吗？

广州有个珠江新城，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新中央商业区。在这里，新的办公大楼和高档住宅近年来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看上去却是空空的，感觉更像华丽的空壳子。

以市场数据来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无论是办公大楼或高档住宅，一般推出市场后不久就被抢购一



空。以每平方米的价格来看,经过去年底至今年初的一小段下调期后,价格已恢复稳步攀升的趋势,一些广州人甚至认为珠江新城的房价涨到了遥不可及的水平。

有人买却没人用真的健康么?这些办公大楼和高档住宅的租金不但没有像楼价那样稳步攀升,一些甚至停滞不起;广州的楼市明显被炒热,甚至已出现了泡沫。

除了广州外,上海和北京也如此,著名独立房地产评论人牛刀近日就发表文章说,中国的白领中有 50% 由于负债过高可能会在未来两年的通胀中陷入资不抵债的情况。

也有中国媒体报道,“挤出效应”已显现,武汉等二线城市房价狂飙。据报道,高房价的压力开始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向武汉、合肥、长沙、济南、西安等二线城市蔓延;原因之一是,目前已经有不少在一线城市无力买房的潜在购房者担心房价上涨形势继续蔓延,开始有了在家乡所在的二线城市购房的打算。

中国各地的房价不断攀升,其实是预料中的事,中国经济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备受看好,热钱大量涌入,据中国官方估计,今年流入中国的热钱至少有近 1000 亿美元(约 1391 亿新元);另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原本要对房地产市场采取的紧缩政策被迫推迟,不但如此,为了刺激内需和经济,银行放贷的条件放松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因此多了一个催化剂。

很多分析师、经济学家、甚至是政府官员此前都认为,只要拿捏到味、政策妥当,依赖房地产市场来拯救中国、保 8% 增长,是可行的策略,尤其是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紧要关头,但迪拜近期的遭遇却给这个策略泼了一大盆冷水。

迪拜当局近日宣布,受巨额债务困扰,其主权投资实体迪拜世界公司将重组,公司所欠约 590 亿美元债务将至少延期六个月偿还,延期债务占到迪拜政府全部约 800 亿美元债务的四分之三;全球股市受此消息影响而立即大幅下挫。

值得一提的是,迪拜的主要产业不是石油,迪拜作为阿联酋联邦中的一员,只占有其石油资源约的 2%,而且这些石油资源将于 2010 年枯竭;在这样的背景下,迪拜转向服务业,主要是走高借贷开放房地产业和旅游业的道路。

迪拜的教训有很多,但最大的莫过于对高借贷开放房地产业的盲目依赖,迪拜危机的成因是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资金链断裂,大量工程停工;中国目前其实也有这样的“通病”,今年的房价大涨,大城市频频出现“地王”,而房地产炒得火热,如果价格一旦下滑,迪拜式的危机就会在中国重演。

房价不可能无缘无故下滑吧?

中国和迪拜还有另一个“通病”,是彼此都属国际热钱垂青的市场,迪拜现在欠债权人的金额约为 600 亿美元,中国 9 月份外汇储备增加 618 亿美元,其中约 400 亿美元是流入境内的热钱。热钱一旦撤出,中国的楼市就会受到重重的一击;热钱的“情绪”是难以预测的,影响它的原因包括炒作、政治因素等。

中国当局不是没有预见到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威胁,过去几个月来也有一系列的动作,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威胁仍在,动作都不果断。然而,改革的力度不足,行动过于迟缓都可能致命,中国应该吸取迪拜的教训,尽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以确保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作者: 杨永欣

来源: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9-12-10

迪拜危机对中国式泡沫发出警示

上周,阿联酋迪拜政府宣布,它将重组国有集团迪拜世界(Dubai World)的债务,并请求债务偿还暂





停 6 个月。据透露，迪拜世界的负债额高达 590 亿美元，而眼下，迪拜政府总共的债务也不过约 800 亿美元而已。

迪拜世界债务重组和暂停偿债的消息一经传出，国际资本市场立刻发生剧烈的波动。在证券市场上，全球股市普遍下跌，受迪拜债务危机拖累最大的欧洲股市跌势较大，港股 27 日暴挫近 5%，A 股也大幅回调，沪市在 26 日起的两个交易日跌幅约 200 点。总体来看，迪拜债务危机的出现，使得近期投资者的信心遭受打击，美元、日元和各国国债成为资金避险的场所，新兴市场、股票和商品市场则遭遇了资金的流出。

目前，中国国内投资者关心的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迪拜事件是否可以与去年雷曼兄弟的影响“媲美”呢？现在国内外市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以中国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为代表，虽然全球金融市场都做出了剧烈的反应，但他们的本能反应是“这事儿与我们无关”，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是这样，华尔街金融风暴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迪拜倒债事件，依然也是这样，他们的立场和观点等于是在说全球资本市场与中国无关！另一派却是以有新兴市场教父之称的邓普顿资产管理执行主席麦朴思为代表，他警告称，迪拜事件，加上越南盾贬值，他预感新兴市场将发生一次显著调整。至于调整幅度，他称，在一个牛市周期，股市回落 20% 亦非不可思议的事，投资者必须有心理准备。当然，麦朴思也指出，投资者现时仍有充足时间分析事态，暂毋须仓促走货。

在安邦看来，虽然迪拜债务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力度暂时仍有待观察，但其影响显然是不容低估的，迪拜的债务危机实际上唤醒了投资者对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的警觉。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同为阿联酋成员的阿布扎比政府将有限度地出手援助迪拜，不过迪拜危机的后继发展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迪拜世界的债权人是否会与迪拜政府达成债务重组协议，迪拜世界是否会大幅甩卖其旗下资产以偿还债务，而此次危机对深陷其中的汇丰控股、巴克莱金融机构又会造成怎样的打击？同样债务沉重的希腊等经济体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迪拜，并引发金融市场的连环反应？这些问题都还是未知数，也需要投资者密切关注。

迪拜这颗明星的陨落，也能够给中国经济带来深刻的教训。迪拜以金融融资和发展房地产起家，石油美元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涌入，在近些年支撑着迪拜房地产价格的快速提高，棕榈岛和尚未建成的迪拜塔是其标志性建筑。而反观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同样在过度依赖着房地产业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如果房地产泡沫在未来持续酝酿并最终破灭，这给国内普通民众、商业银行以及整个宏观经济势必造成沉重的打击。

同样，迪拜世界也是一家靠债务高杠杆运营的企业，虽然其各类资产超过 900 亿美元，但其中很多都为流动性很差的不动产，而其欠债规模就达到了 590 亿美元。这样的财务状况所隐藏的债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一旦金融市场发生动荡（如去年的金融海啸爆发），这些潜水炸弹就会被引爆。而观察国内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资平台的举债状况，在此轮大规模基建投资的过程中，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比率同样过高，后续的还款能力很成问题。这种情况若遇到经济大幅下滑的时期，其所蕴藏的风险可能会集中爆发，并将整个宏观经济拖下水。

安邦认为，在全球投资者对经济复苏和资产价格上涨感到很乐观之时，迪拜债务危机也许爆发得正是时候，它可以给那些头脑过热的投资者浇一盆冷水。而对中国政府来说，对资产泡沫酝酿和地方高负债风险要提高警惕，这应该成为迪拜危机带给中国的最大“礼物”。

作者：中国安邦咨询公司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9-11-30





中国应重新评估迪拜危机

尽管有专家认为“迪拜世界”的债务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大，但迪拜危机对浙商的影响却已经突显出来。有浙商表示，在迪拜从事贸易的浙江老板超万人，其中起码半数以上拥有或买卖过房产，按照平均每人买一套，而一套以 100 万元计算，浙商在迪拜投资楼市的总额便达 50 多亿元，而现在楼市缩水一半，那么起码有 20 多亿元资产人间蒸发。就单个华商而言，受损最大的当数温商胡宾，他于 2007 年斥资 2800 万美元(约 1.9 亿人民币)买下了迪拜“世界地图”中的“上海岛”，目前已因金融风暴紧急叫停。

据介绍，2004 年到 2008 年初，迪拜的房产曾一路狂涨，“投资 100 万元，一年赚两三百万元的温州人不少。”很多温州人闻风跟进。迪拜“耶稣岛”的别墅，2004 年刚推出时，一幢只卖 960 万元，后来猛涨到近 6000 万元，现在价格跟刚推出时差不多。

最初，浙商赴迪拜主要从事五金电器、皮鞋、箱包和小商品等的销售，而后当他们完成原始资金积累及迪拜楼市崛起后，许多原本从事传统贸易的浙商开始将目光锁定地产领域。迪拜地产开发的鼎盛时期，其拥有的高楼起重机就占了全球的 1/5。

其实，在表面的风光背后，浙商也是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继“炒煤团”兵败山西之后，新疆又出现“炒油团”，一名温州商人在克拉玛依购买了 15 口油井。此事一传开，“炒油团”又是昙花一现。除了炒房、炒煤、炒油，浙商还炒棉、炒黄金、炒商铺……

表面看来，除了少部分中国公司以及涉及到的国内银行之外，其他直接影响并不多。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市场就高枕无忧。迪拜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全球资本对新兴市场模式信任是否可以持续，如果迪拜摧毁了全球资本的信任，那么毫无疑问将引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巨大冲击，并且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不仅因为中国是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还因为国际资金的流入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导致迪拜危机的导火索，是对房地产行业大肆放贷，过度借钱，靠全球巨额融资吹起了房地产泡沫。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表示，目前我国房地产业占到 GDP 的 6.6%和 1/4 投资，直接相关产业达 60 个，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直接命脉。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大的波动，现阶段依靠房地产发展生产的几十个行业，如钢筋水泥生产商等，还有那些投资房地产业的大中型企业都将受到无法估量的损失，甚至可能因为大量资金的丧失，让失血严重的中国实体经济崩溃。

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一方面要加紧控制热钱流动，尤其要避免热钱大规模流出中国市场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要严查涉及迪拜业务的中国公司及其银行信贷，密切监控相关机构的受损和资产恶化情况。此外，要向全世界解释人民币稳定有益世界。只有这样，才能稳住在中国的外资，才能稳定全球资本对新兴市场的评级。

作者：《财经网》专稿

来源：《财经网》，2009 年 12 月 01 日

迪拜危机是高盛与奥巴马的国际阴谋

是阴谋？还是阴谋论？这一次迪拜的酋长愁眉苦脸，高盛又笑了。

看看迪拜的债权银行：汇丰、渣打、花旗、巴克莱等等，这些银行都是向阿联酋提供贷款敞口最大的债权银行，看上去跟高盛无关。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我在研究高盛的时候，尤其是高盛在国际上有大行动





的时候，一定有巴克莱，现在高盛控制的意大利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尼，巴克莱可以说功不可没。

这一次高盛在迪拜危机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搞死雷曼兄弟跟贝尔斯登的过程之中，高盛采取了四两拨千斤以及釜底抽薪的办法，将华尔街的两大投行给搞死了。当然，掌控 AIG 以及花旗等，那就是跟权力的绝对结合。2008 年的金融危机，高盛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自杀式地搅乱市场，释放病毒一般的债权引诱市场上当，当然最后当鱼肉的也就是雷曼跟贝尔斯登。

迪拜危机之中，高盛故伎重演。

迪拜世界未来五年到期债务名单中，高盛、高盛盟友三井住友银行(注：高盛同时持有该银行 12.5% 股权)、盟友巴克莱、花旗。这一次高盛持有的债权并不多，可是三井住友银行持有迪拜世界 2.25 亿美元。这一次高盛迅速跳出来，发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预计，汇丰在迪拜世界中的潜在信贷亏损额为 6.11 亿美元，而渣打银行的则为 1.77 亿美元。

高盛这一次虽然没有 2007 年那样狂踩汇丰，甚至认为这一次风险可控，事实上高盛发布研究报告的时候，美国人正在忙着过万圣节。高盛的报告无疑是在委婉地告诉世界，汇丰这一次又跑不掉了，现在看到的是直接损失，只要迪拜危机无法有效控制，风险还会进一步扩大。

高盛报告的执笔人是 Roy Ramos，这位爷是高盛的合伙人、亚洲区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金融研究主管，从事银行业研究近 20 年的历史，对汇丰、渣打以及日本除外的亚洲地区的其他一些上市银行跟踪研究的时间相当长。2001 年被《财富》杂志评为华尔街明星分析师，在金融研究领域一言九鼎。

Roy Ramos 可以说是汇丰的克星，高盛的风格是干掉一切对手，这一点我在《干掉一切对手》里面详细研究了。早在 2003 年，汇丰收购美国次贷贷款机构 Household International Inc.，进军美国房贷市场野心让高盛非常不爽。到了 2007 年，汇丰陷入了次债漩涡，高盛开始跳出来狂踩汇丰。Roy Ramos 以华尔街明星分析师的身份站出来指手画脚，在 2007 年 11 月 24 日发布报告，将汇丰亚洲挂牌股票评级由“中立”调降至“卖出”。汇丰暴跌，这一次，在高盛的刺激下，汇丰再次暴跌。

万圣节过了，该是逼债的时候了。

历史总是那样的惊人相似。当年中国航油大王陈久霖，陷入高盛的圈套之后，高盛并没有立即站出来逼债，而是他的盟友三井住友银行，这一次日本人再次充当马前卒，表面上站出来将债务推迟六个月，事实上就是在告诉大家，这已经是我最后的期限了。日本人一出马，最大债权人汇丰、渣打还不胆战心惊赶紧要债？迪拜陷入逼债漩涡已经无可避免。

隔山打牛，高盛惯用招术。当年雷曼兄弟找到韩国产业银行，希望能够获得产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双方谈的很欢，突然高盛的老盟友韩国国民银行站出来说不会参与雷曼兄弟的重组，那是一个烂公司。雷曼根本就没有找国民银行，他却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发话，什么意思？很快意思就出来了，韩国的金融服务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银监会)就站出来说，产业银行你不能重组雷曼，国民银行都说很烂，你们干吗要去重组呢？产业银行的总裁闵裕圣原来是雷曼首尔首席代表，执意要救老东家，这个时候国会议员就跳出来，说你这个闵裕圣有问题，肯定拿有好处。国会议员为什么要跳出来呢？原因是高盛为韩国总统李明博提供了大量的竞选贷款支助，跳出来的议员是李明博的人。多么完美的布局，这一次高盛故伎重演了。

高盛什么目的？干掉欧洲人。对的，干掉欧洲人。

这一次迪拜危机爆发，欧洲的金融机构陷入恐慌，股市稀里哗啦地下跌，这就是高盛要的效果，欧洲已经逼近了金融危机第二波，这也是美国政府要求达到的目的，现在高盛捧出来的奥巴马要处理阿富汗问题，他需要通过欧洲人的手来打压欧洲人自己，进一步达到打压中东的酋长们，那是美国国家利益问题。当然中东人之所以很嚣张，主要是他们太有钱，能源太多，这一次高盛的行动，可以让美国政府一箭双雕：干掉欧元，拿下中东能源。

目的达到了。事实上高盛早已在迪拜布局能源了。

2008 年 8 月 11 日，迪拜商业交易所发布了一份声明，该交易所通过发行新股向六家投资者共计出售了 20% 的股权。六家投资者中包括两家美国投行、三家能源交易公司和石油巨头壳牌旗下一家公司。迪拜





商业交易所羞答答的，没有公布具体的交易细节。

迪拜商业交易所到底有多大？背景非常的深厚，作为纽约商业交易所和迪拜和阿曼政府之间的合资公司，迪拜商业交易所于 2007 年启动，目前已经是海湾最大的能源期货市场。事实上交易所声明中的美国投行就是全球两家最大的商品交易机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高盛一直是石油市场的庄家，入主迪拜商业交易所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将石油的钉子直接插到了中东的心脏。

现在一切目的都浮出水面了：高杠杆将最富有的迪拜逼向绝境，将持有最大债权的欧洲金融机构比如危机状态，拖累欧元区经济，打垮拥有能源的中东酋长们的欧洲资金管道，高盛的尖刀在 2008 年通过格鲁吉亚跟俄罗斯战争插刀里海后，再次插到最富有的迪拜，为奥巴马的中东行动提供保障。一箭双雕的背后，迪拜跟欧洲人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作者：李德林

来源：凤凰网财经，2009 年 12 月 08 日

迪拜得救了

上个月，迪拜在资本市场掀起了一场狂风骤雨：这个酋长国要求暂缓偿付国有企业迪拜世界(Dubai World)的部分债务，震惊了投资者。本周，其原油资源丰富的、阿联酋内部的资深邻国——阿布扎比酋长国开始收拾残局，为手头拮据的迪拜提供了 100 亿美元的资金。

在迪拜繁荣时期，投资者曾想当然地认为，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享有来自迪拜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那份表明重组迪拜世界债务意图的仓促声明，激起了投资者对迪拜酋长国偿付能力的担忧。来自拥有数千亿美元储蓄的阿布扎比的担保，应该能够安抚投资者的忧虑情绪。

这个超级富有的酋长国已经在今年通过其商业银行和阿联酋央行向迪拜提供了 150 亿美元的支持。在送出最新一笔资金的同时，阿布扎比还对这位阿联酋“邻国伙伴”说了一番暖心话。阿布扎比暗地里向迪拜收取了什么代价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不过给出的这笔资金没有附加任何公开条件。

一部分新资金将供给迪拜世界，确保其履行即将到期的若干债务。它将偿付其建筑子公司棕榈岛集团(Nakheel)发行的 41 亿美元伊斯兰债券，并支付部分供应商的货款。但这并不意味着，迪拜正在放弃将损失强加于迪拜世界债权人的计划。

迪拜世界依然打算重新协商所借 260 亿美元债务的条款。迪拜将履行这些债务，是因为否则可能触发交叉违约条款(cross-default clauses)，使得迪拜世界部分其它债务的重新谈判陷入麻烦。此次纾困的目的不是拯救债权人，而是使损失以有序的方式传递给他们。

考虑到其它可能的结局，这是好消息。债务持有人以及迪拜酋长国自身的资产价值更有可能得到保护。重组如今将变得更容易。多亏了本周公布的新破产法，即便公司破产，也依然如此。

事实上，考虑到迪拜在处理自身事务上的糟糕表现，能有这样不错的结局相当令人吃惊。投资者现在知道，迪拜酋长国是有偿付能力的，而且也会对酋长国及其企业区别对待。为国家债务投保的成本已经不再等同于为国有企业债券投保的成本。在迪拜，赚钱的途径在于投资稳健的行业——而不仅仅是那些得到政府支持的行业。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社评，译者：管婧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9-12-15





经济展望

2010 年中国将会过热的与过冷的

中国经济有望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红红火火的基建热潮、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和不断加深的通胀隐忧开启 2010 年的大幕。然而，对全球经济复苏以及财政刺激措施失效的担忧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对于收紧政策会慎之又慎。我们预计，由于消费者支出稳步增长而投资增速放缓，2010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比较温和。预计 2010 年一季度实质 GDP 同比增长 11%，至四季度放缓至 9.5%，全年 GDP 增速为 10%。

2010 年经济预测中的一大未知数是无从知晓即将开工的基建项目数量。2008 年 10 月政府公布的 4 万亿经济刺激方案计划持续两年，但其中仅包括中央政府参与融资的项目。自 2009 年开始，大量的由银行信贷等方式提供融资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上马——至本文截稿时，全国投资项目同比增速仍高达约 40%。虽然中央在 2009 年 9 月出台了抑制部分制造业行业产能过剩的政策，但还没有开始控制基建项目投资。预计 2010 年初，银行大规模放贷将再度上演，从而掀起新一轮项目开工热潮。因此，2010 年上半年可能仍将看到大量新项目开工。鉴于 2009 年二三季度启动了巨量的投资项目，我们预计到 2010 年年中投资同比增速将有所放缓。

由于 2010 年大部分时间内 CPI 通胀率同比增幅很有可能维持在 4% 之下，因此中央政府很可能推迟大规模紧缩货币政策出台时间。但我们预计将继续控制通胀预期央行将分别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加息。不过在当前水平下，利率上调不会产生实质性效应。预计 CPI 通胀率同比增速在明年二、三季度见顶，全年平均同比增长率为 3.5%。

缺乏显著的紧缩政策将使房价面临持续上涨压力。资产泡沫产生的风险明显存在。2009 年，上海、深圳、北京等一些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了 30-40%，接下来可能要轮到二线城市的房价上涨。据称，随着开发项目启动预售，明年二季度开始房地产业供给将增加——而价格波动性可能比 2009 年更甚。如果价格持续攀升，2010 年银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可能将受到限制。在未来某一时间——也许是 2010 年，也许是更长时间之后——深圳可能将推出房产税改革试点（相关准备已经就绪）。此举将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地方政府不再过分依赖出售大量土地筹资，从而避免无序的城市化扩张。不过，鉴于大量相关统计数据仍不完备，以及开发商和城市居民可能出现的抵制情绪，房产税改革在全国的推广还需要相当的时间。

目前政府债务总额可能超过 GDP 的 80%。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是地方政府所属企业的杠杆化程度。据财政部门研究人士的私下估算，目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约达 8 万亿元。而且实际规模可能远大于此。

由于很多这类企业盈利状况不佳，某些地方还存在着腐败问题，这些政府债务最终将变成银行不良贷款（极可能出现在三至五年后）。在风险管理系统仍不完善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中问题将更严重。尽管解决这一问题很麻烦，但政府可通过以公共支出，比方说用 5000 万美元外汇储备（或其他政府资源）对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资产重组来防止系统性风险出现。当然，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最终，家庭财富将被用于稳定金融体系。不过，决策部门应该能够找到应对办法。

市场等待北京再次作出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决定。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成为 2010 年上半年的关注焦点。我们认为在春节（二月中旬）前，人民币汇率不会有大的变动，再次这期间将有 5000 万到 1 亿农民工将回家过年，政府不想令他们在节日期间为生计发愁。预计明年二、三季度的某一时点，北京将作出“脱钩”的决定，使人民币恢复 2006 年至 2008 年上半年间的逐步升值之势。一些人主张采用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的政策，并放宽人民币波幅。但我们认为这更可能发生在 2011-12 年，在世界经济前景更趋明朗，并且国内经济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之后。我们预计 2010 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价为 6.70。

12 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致确定了来年的政策基调，2010 年政府的工作重点可能不仅要放在控制通胀上，还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面对全球经济放缓，中国在基建项目上投入大量资源。尽管政府推出了家电下乡的补贴政策并增加了医疗和教育的公共支出，但大部分经济刺激计划投资仍被用于基建项目。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对这种基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表示失望。





除了正在做出的很多改变以外,一个强有力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还需要包括:对私人资本开放服务业,使行业内现有领先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允许人民币升值;放开利率管制,给予储户更高的回报率;在框架明晰且资金到位的基础上启动医疗制度改革计划;引入房产税并控制土地销售;加大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并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放开零售能源和公共事业产品的价格,使其反映成本;强制国有企业上缴红利;改革户籍制度,使农村外来人口能够享受到城市服务;简化法律制度规章。2010 年是下一届政府换届之前,可以踏实做事的一年,我们期待着看到最高决策层对中国中期经济发展谋略的落实。

作者:王志浩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9/12/16

明年货币政策表述为“适度宽松” 实则收紧

12 月 3 日,知情人士透露,200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 12 月 5 日、6 日召开。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此前 11 月 27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为明年经济工作确定了政策基调,即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未来货币政策如何做到适度宽松?2009 年将近 10 万亿的天量信贷投放趋势能否在 2010 年得到延续?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货币政策表述为“适度宽松”,实际应该是“极度宽松”;明年如果真正执行“适度宽松”的话,实际上是要有所收紧。

此前,来自监管层的权威人士曾预期,明年 M2 增速将在 16%左右,全年新增信贷将在 6 万至 7 万亿元左右,而人民银行研究局金融市场处处长卜永祥也表示,明年贷款增长可能会在 5 到 7 万亿之间。

信贷规模匡算法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认为,11 月 27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之所以定调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实际上还不太明朗,复苏基础不稳固的背景下。

货币当局的维稳心态从央行近期公开市场操作可窥一斑。

12 月 3 日,央行公开市场迎来连续第八周资金净回笼。当日,央行在公开市场成功发行 700 亿三月期央票,并开展了 300 亿元 91 天期正回购操作;在经历对冲后,公开市场本周净回笼资金 220 亿元。

同时,从目前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看,持续稳定在 1.7605%,这已经是八月中旬以来连续 14 周保持不变,央行维持利率水平稳定意图十分明显。

王松奇认为,2009 年信贷扩张有一些偏量、超速,明年会适当的进行压低速度,适当进行收缩,但量应该不会过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2009 年投资的大量基建不能形成半拉工程,需要一定的投资的强度和信贷支持的强度。

刘煜辉说,今年新开工很多项目,这些项目需要后续的信贷资金进来;所以“如果信贷目标是以 7 万亿为限的话,明年实际的信贷水平可能会超出。”

据刘煜辉估算,由于今年已经投放了 5.5 万亿的中长期信贷,大部分进入了新开工项目。明年这些项目的信贷不能下降太多,估计需要 4 万亿左右才能保证今年新开工的项目顺利进行。

另外,短期贷款主要是企业用于短期流动资金的需求,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息息相关。刘煜辉预计,明年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企业所需要的短期流动资金在 4 万亿左右。二者相加,明年的信贷需求估计在 8 万亿左右。





信贷结构调整困惑

在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基调不变的前提下,11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还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刘煜辉认为,明年的信贷政策将承担一部分结构调整的任务。

不过,货币政策更多是总量政策,很难兼顾到结构调整。刘煜辉认为,在信贷结构上还需要信贷政策、信贷指导以及其他政策相结合。

“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就是有保有压,要压的行业应该包括过剩性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刘煜辉表示。

10月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六大行业划为过剩行业。在政策出来以后,六大过剩行业中的上市公司进行再融资,都明确要求必须先通过发改委审批,然后再到证监会去审批。这实际上对六大过剩行业的融资进行了紧缩。

市场预计,明年可能会通过信贷政策、信贷指导的方式对过剩行业的信贷加强管理。比如在过剩性行业的新开工项目,只有在发改委批准后才能得到银行信贷。

事实上,今年银监会连续出台了《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项目融资业务指引》,加强了对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融资贷款的管理。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此前也明确表示,为了确保信贷进入实体经济,明年将改变发放贷款办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将按施工进度放款,不见柱子不撒银子,保证信贷在实体经济运营,不去冲击虚拟经济。

在房地产信贷方面,刘煜辉认为会延续今年的调控思路。比如在按揭贷款方面,严格“二套房”信贷条件;开发贷方面,加强对资本金比例的要求等等。

在王松奇看来,信贷结构调整要防止沦为空洞喊口号的危险,货币当局必须出台强制性政策,比如明文规定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必须达到一定比重。

“银行现有的信贷评级体系自动倾向于大客户、大企业,国有大行更甚;在大项目拼抢中处于弱势的中小银行对信贷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会好一点。”王松奇分析。

货币政策不应只盯 CPI

近期,有关通胀预期升温 and 资产价格上涨讨论给货币当局2010年政策制定带来不少无形压力;而重提通胀预期是否应会纳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议题,成为关注焦点。

实际上,尽管来自于国内通胀预期、热钱涌入、人民币升值等多方面的挑战给货币当局带来一定压力,但在近期多个场合,央行和银监会高级官员都表示,明年通胀压力不大;刘明康预计明年的通货膨胀之多在2.5%左右。

在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看来,目前紧盯CPI的货币政策制定存在一定误区;货币政策当局要更加关注于资产价格,而不是CPI。

事实上,美国格林斯潘货币政策的失误就在于货币政策忽略了资产价格,而只认CPI,忽略资产价格的最后结果是导致货币“不经意的大量供给”。

王小广还说,明年货币政策重点关注不在于何时加息,更在于如何适度控制过度的货币供应。

刘煜辉也表示,货币当局应该很清楚目前CPI指数的缺陷。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应该仅仅盯着CPI指数水平,要参考更广泛的物价水平,作出相对正确的政策选择。

刘分析,虽然现在CPI还不高,但由于资产价格上涨,尤其是地产价格上涨,已经影响到了服务业的价格。目前,房地产价格、服务业价格在CPI的权重中不高,导致CPI与真实的通胀情况脱节。

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背后,是M2持续一年的将近30%增速。王小广认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属于非正常现象;2010年货币政策应进入一个正常水平,即信贷增长15%左右,M2增长15%-18%左右。

作者:刘煜辉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04日



人民币汇率的未来

自 2009 年第 2 季度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整体强势反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卷土重来。G20 匹兹堡峰会与 G7 意大利会议均提及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死灰复燃。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已经转变为人民币升值预期,目前境外 NDF 市场预计一年后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将会升值 3-4%。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诱导下,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大陆,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在这种国内外宏观经济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将何去何从?

尽管依然有学者认为人民币现行汇率是合理的甚至存在高估,但大多数学者和分析师持相反意见。当然,人民币均衡有效汇率的计算一直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领域。不过,要判断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即如果央行停止干预外汇市场,看由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应该是多少。鉴于中国目前存在持续的贸易顺差与 FDI 净流入,导致外汇储备持续累积,造成外汇市场上美元供给持续超过美元需求,如果央行停止干预,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无疑会显著升值。当然,如果外汇市场参与者认为人民币未来将会升值,这种预期将会进一步推高人民币实际升值幅度。然而,升值预期绝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它建立在严谨的基本面分析与投资者敏锐的直觉之上。

既然人民币名义汇率存在着显著低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未来人民币应该采取何种升值方式,目前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选择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抗住内外压力,保持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相对稳定。“我自岿然不动,任尔东西南北风”。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是能够继续稳定中国的出口增长,有助于净出口的改善,并通过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与就业。然而这种做法有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相关经验证据显示,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远小于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如果外部需求迟迟没有恢复,仅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对于改善出口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第二,通过保持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的做法其实等于中国人动用各种国内资源去补贴外国人,在福利意义上对本国是不利的;第三,出口换来的外汇收入没有花掉,而是拿去购买了一堆在未来即将缩水的金融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中国劳动者多年的血汗维系在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的手里,实在是情何以堪。

第二种选择是,回归到 2005 年 7 月至 2008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小幅、渐进的升值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包括:一是有助于人民币名义汇率逐渐向实际汇率靠拢,从而逐渐纠正国内的资源配置;二是对中国出口行业的冲击是渐进的,有助于出口企业的调整,因而对增长与就业的冲击也是可控的。但这种模式的最大坏处在于,地球人都知道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持续升值,这种单边升值预期的确立将导致大量热钱涌入中国套利,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资产价格泡沫与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应充分借鉴 05 年 7 月至 08 年上半年的经验教训。

第三种选择是,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真正变为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在货币篮子中应该降低美元的比重。在美元继续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的过程中,采用这种制度将会导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好处在于可以降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是可控的。此外,真正的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具有很强的透明性。采用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依然可能是高估的。一篮子货币制度下形成的人民币名义汇率依然可能偏离均衡汇率,这不符合通过汇率水平来调节资源配置的汇率改革初衷。

最后一种选择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实施一次性升值,然而放开汇率波动区间。这种选择的好处包括:第一,如果一次性升值能够达到均衡汇率水平,那么升值到位后市场将会产生双向预期,从而能够有效地规避热钱流入套利;第二,汇率的真正双向波动有助于推动人民币远期汇率市场的建设,也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这种选择也具有如下问题:第一是如何确认一次性升值的幅度;第二,一次性升值可能对出口行业造成较大冲击;第三,一次性升值这种激进改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很难被一个作风稳



健的宏观经济决策团队所采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的最可能变动方向是回归到小幅、渐进的升值趋势。为了避免这种方式造成的热钱流入,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资本账户的管制,流入、流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任何升值方式都不是一帆风顺或一劳永逸的,政府部门应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然而无论如何,名义汇率向均衡水平回归的大趋势是不容置疑的。

作者:张明

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网,2009-11-27

中国离通货膨胀有多远?

“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其含义十分清楚,即货币供给超过货币需求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将该理论应用于判断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物价走势,就不免产生对通胀的担忧,因为自 2008 年 11 月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无论货币还是信贷都出现了空前的增长。

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需要我们在总结历史上通胀运行的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中国经济特征,才能正确认识现阶段我国的通胀形势。

一、对最近 30 年我国通胀的回顾与总结

从通胀的形成机理来看,可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外部输入型通货膨胀。所谓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指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形成的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导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主要原因是信贷与货币的过度发行及财政赤字的大幅度增加。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导致社会消费品物价水平的上涨,通常国内的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是由于国际市场的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导致的,又被称之为外部输入型通货膨胀。

上述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在我国最近 20 多年的历史中都有所表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出现三次明显的通胀:上个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两次明显的通胀主要属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胀,而 2007 年至 2008 年的通胀属于典型的外部输入型的通胀。

1988 年,国家开始实施“价格闯关”,使物价出现大幅度上涨。1988 年 CPI 同比增长 18.8%,PPI 同比增长 15%。在价格改革之前,我国的商品价格大多属于管制价格,价格没有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尽管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十年,商品供给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但依然没有走出短缺经济时代。在商品供给严重短缺的背景下,价格的“闯关”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如果说 1988 年的通胀主要是由消费需求拉动的话,那么 1994 年的通胀更多是靠投资需求拉动的。1992 年至 1993 年,投资增长速度均在 40%以上。由于投资需求极为旺盛,也必然带动了生产资料成本和工资的较大上涨。

2007 至 2008 年的通胀形成机制与 1988 年和 1994 年有很大的区别,这次通胀是在全球通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由于国际粮食、原油、铁矿石等重要原材料价格飙升,美元贬值,以及国际游资的流入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本轮通胀主要表现为外部输入的特征比较明显。当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飙升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有密切关系,中国经济不仅受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而且是影响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总之,改革开放 30 年里,我国出现了明显的三次通货膨胀,但三次通胀的形成机理和表现形式都有所区别。





二 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通胀形势

2009 年的通胀预期缘于信贷与货币的快速扩张。2009 年三季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 29.3%，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 29.5%。M2、M1 增长率均超过名义 GDP 增长率达 22%左右。前十个月，人民币新增贷款总额 8.92 万亿，据估计，今年全年新增信贷将接近 10 万亿。货币投放的高速增长使市场产生了货币贬值的预期（即通货膨胀预期）。

笔者认为，在出口难以实现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但需要关注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和资产价格膨胀，尤其要关注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上升。理由如下：

从市场的供求关系看，自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就已经告别的短缺经济时代，供给大于需求成为一种市场常态。从宏观经济的总量看，高储蓄率就意味着消费需求的不足，储蓄大于投资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必须依赖于出口的增长。再从经济结构看，最近 10 年的经济发展主要由出口的高速增长带动的，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 70%左右，40%的工业生产能力依赖出口消化。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国际贸易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 2007 年前的高速增长状态，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增长会受到很大制约，因此，中国经济的总体状态将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不太可能出现需求拉动型的通胀。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经济的总体状态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经济有通缩的风险。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货币供给影响物价的另外一条途径，即大宗商品市场。毫无疑问，货币供给影响金融资本的成本，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主导力量。全球中央银行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无法被实体经济所吸收，必然流向大宗商品市场及资产市场（如股票市场），从过去的一年看，石油价格从最低的每桶 30 美元一路上升到近 80 美元左右，其关键的影响因素就是货币，换句话说，石油的价格主要由金融资本决定，与石油市场的供求形势关系不大，石油的供求形势顶多就是金融炒家们的一个噱头而已。与石油一样的还有有色金属及黄金等贵金属商品，它们都成为全球过剩的货币追逐的对象。当然，美元的不断贬值给这些金融资本的投机提供了绝好的题材，成为统一全球金融资本意志的指挥棒。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大幅度上升成为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动力，也是未来中国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动力。

对于过剩的中国金融资本而言，参与大宗商品的投机不会成为主流，因为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市场不在中国，中国金融资本还没有能力主宰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而国内期货市场的资金规模大约只有 1000 亿元左右。我国多余的货币应该主要进入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尽管是否有资金进入股票市场还有很多争论，但股票价格在 2009 年近一倍的涨幅及最近创业板市场的火爆登场等表现无不向世人昭示中国股票市场“不差钱”的现实。但相比股票市场而言，笔者更担心房地产市场。因为股票市场有大量的限售流通股等待流通，还有数百家公司在排队上市和数千亿的上市公司再融资计划等待实施，股票市场不会有失控的危险。退一步说，即使股票市场出现了类似 2007 年的井喷行情，其后果也不会十分严重，因为进入股票市场的主流资金（主要是基金）大多数是储蓄资金而非贷款，股价的波动导致的后果是财富的再分配而已，不会危及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实体经济的运行，2008 年的市场表现已经说明了这一点。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0 月，股市平均价格大跌 70%，但很少金融机构或工商企业因此而陷入困境，即股市的大幅度下跌对金融体系的冲击是很有限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进入股市的资金中信贷资金比例过大则结果就不一样了，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主要区别在于有大量的银行资金介入，如果出现房价的大幅度下跌，将直接表现为银行坏账将迅速增加，会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美国的次贷危机对此已经作了充分的演示，无须笔者赘述。

2009 年初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使房价出现大幅度上涨，房价的上涨已经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扩散，社会公众对房价的上涨形成了一致的共识。概括来说，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影响房地产的价格预期：1）缓解了开发商的资金周转压力，使 2008 年底的降价卖房的情景迅速消失，房价失去了下行压力；2）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地方政府容易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地方财政不再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使地方政府增加土地供给的动力消失，刺激了土地价格的上涨，进





而带动房价上涨；3）社会公众产生货币贬值预期，买房成为抵御通胀的主要选择。

因此，笔者认为，以 CPI 衡量的消费物价不会出大幅度上涨，但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容易出现失控的危险。决策者如果仅仅依靠传统的判断方法来度量通胀形势的话，有可能出现重大失误，90 年代日本出现泡沫经济的最主要原因也正是在此，需要有关方面高度关注。

三、不同类型的通胀与股票市场的投资选择

尽管通胀会导致货币贬值，使我们的财富缩水，但如果投资得当，可以实行通胀背景下的财富增值。

在需求拉动型的通胀里，CPI 的上涨幅度领先于生产价格指数 PPI 的上涨幅度，如：1988 年 CPI 同比增长 18.8%，PPI 同比增长 15%；1994 年 CPI 同比增长 24.1%，PPI 同比增长 19%。CPI 比 PPI 快 4 到 5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工业生产链条中，下游产业的获利要大于上游产业，即生产最终消费品的公司获利要大于生产钢材、有色金属、煤炭等生产资料的企业，因此，在那个时代的股票市场里，家电类的公司必然是市场的宠儿，而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等则是边缘化的角色。

但在外部输入型的通胀中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进入 21 世纪，中国基本上结束短缺经济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过剩，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局面，因此，物价水平上涨的力量主要由成本推动。在供给大于需求的背景下，一般消费品的涨价速度不及生产资料的涨价速度。2008 年 CPI 同比增长 5.9%，PPI 同比增长 6.9%。PPI 比 CPI 快 1 个百分点左右，意味着工业生产的链条中上游产业的获利能力大大超过下游产业，表现为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等行业的上市公司盈利增长快于最终消费品类上市公司，与 80 年代及 90 年代的情况基本相反。

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总体格局中，房地产往往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因为房地产的供给弹性很小，容易成为一种投资品。在股票市场里，房地产板块会成为最耀眼的明星。2006 和 2007 年的股票市场表现已经验证了这一结论，未来的股票市场还将继续验证该结论。

作者：尹中立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2009-11-20

中国离重蹈日本覆辙有多远？

11 月 30 日，在南京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一些国家一方面对人民币提出升值要求，另一方面又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有失公允的，中国将在合理水平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这意味着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但如果中国的出口复苏或者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得到遏制，中国很有可能选择放弃目前的汇率政策，市场人士也普遍预期明年下半年人民币或将重回升值之路。

其实，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或者升值的路径选择不能仅仅以出口和贸易保护主义情况为参照，即使明年下半年中国的出口出现了复苏，人民币也不应该贸然升值。因为本币升值，再加上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恰恰是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日本陷入泡沫经济，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的根本原因。90 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使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目前中国政府已计划在 2010 年维持经济刺激政策不变，如果明年人民币启动升值程序，涌入的热钱再加上国内宽松的流动性势必将让中国离重蹈日本覆辙越来越近。

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覆辙？这曾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最为热门的讨论话题，中国的情况似乎也与上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非常相似：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贸易摩擦加剧、升值压力、从外需转向内需以及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等等。特别是 2007 年时股市和房地产的暴涨，加剧了人们对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的担忧。





但是, 2007 年下半年以来, 虽然中国的股市经历了泡沫破裂, 房地产价格也开始回落, 但似乎对实体经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下滑似乎与泡沫破裂无关, 主要是因为出口的下滑, 从而导致了国内投资和消费的连锁下滑。

中国之所以在 2007 年间没有重蹈日本覆辙, 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政策组合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日本并不相同。日本先是在 1985 年“广场协议”的指引下快速升值日元(日元在两年半内升值了近一倍), 然后在 1987 年“卢浮宫协议”的指引下又转而增加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维持日元稳定, 但这并没有阻止日元的升值势头。为了缓解出口企业的压力和扩大内需, 日本还实施了两年多的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 结果造成国内流动性泛滥成灾, 推动了房地产和股市的上涨。

在 2005 年汇改后人民币开始升值的一段时间里, 虽然中国政府也通过汇率干预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升值“小步快走”, 但中国央行同时也采取了收紧流动性的对冲策略, 从 2006 年到 2008 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直都是紧缩的, 尽管这仍然没有阻挡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 但总好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助推。

但时过境迁, 目前中国一方面要维持经济刺激政策不变, 让政府主导的阶段性复苏逐步过渡到市场主导的持续性增长, 一方面又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如果迫于压力选择人民币升值, 将和日本当年的政策组合非常相似。现在已经露出了一些端倪, 最受人瞩目的是房地产价格和土地价格在宽松政策助推下的逆势上涨。这一方面得益于整体金融环境的宽松,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政府为房地产领域量身定做的救市政策: 房贷利率降低、首付降低、开发商可以通过向银行贷款拿地, 再以此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更多的款、拿更多的地……这些都是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被吹大的诱因。更值得警惕的是, 目前中国地王的频现以及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暴涨也与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前的地价暴涨相似。

房地产行业吸纳大量银行资金是危险的, 经济危机一般都是从房地产价格下跌开始, 股市的下跌可能还有反复, 但房地产价格的下跌趋势一旦形成一般难以阻挡, 日本如是, 美国也如是。尽管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 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和股市泡沫化, 但日本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和破裂却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这也是日本随后陷入长期萧条的原因, 也是美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的原因。

中国要想避免日本的覆辙, 最关键的是不应在国内经济结构还有调整空间的时候, 就盲目启动人民币升值。因为一旦选择人民币升值, 无论是采取宽松还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恐怕都难以阻挡资产价格的泡沫, 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而且, 在保持经济政策整体宽松的背景下, 应率先退出针对房地产的特殊救市政策, 让银行尽量远离泡沫。退一步讲, 即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像日本一样在崩盘后十多年一蹶不振, 一旦中国政府在今后一两年内开始收紧流动性, 中国的房地产必将经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

作者: 崔宇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2009/12/01

不发生通货膨胀就发生货币危机

眼看着房价、股价节节攀升, 对升斗小民最温暖的安慰来自于某些体制内经济学家铿锵的语调, 中国没有通胀, 短期内也不会发生通胀。

如果我们认可 CPI 等于通胀率的理论, 那就得承认通胀确实没有发生, 但这样做无异于掩耳盗铃。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目前的 CPI 指标已经赶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存在系统性缺陷, 有意地隐藏了货币贬值的危机, 增大了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证明 CPI 不高, 9 月份除了烟酒及用品类、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 其他同比都在下降, 民众怨声在道的居住类指标更是明显下降。并不是国家统计局和民众的脑袋构成不一样, 而是





指标的构成不一样。民众看的是房价，而国家统计局是以租金、购房贷款利率、建房与装修材料等作为参考指标。

谁都知道，中国的租售比属全球高位，所谓租售比即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国际上用来衡量一个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的租售比一般界定为 1:300~1:200，而我国的租售比大大突破了警戒线。以一线城市为例，有关数据显示，北京地区房屋租售比自 2004 年以来就一直高于国际警戒线水平。去年基本维持在 1:335 左右。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租售比首次突破 1:400，部分区域达到 1:420，而目前该指标已经接近 1:500，部分地区已经达到 1:600。房价高涨，房租还在原地徘徊，最多略有上涨。再以东莞为例，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租房客减少房租大跌，但随着货币增加，广东的房价却节节上升，不过 CPI 将显示该地居住类指数下降。

国家统计局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11 月中旬，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提醒市民称，现在没有通货膨胀，消费者千万不要因为通货膨胀的因素抢购房子，这样恰恰属于“上套”。姚景源先生是统计行家，也许做得到不对高房价动心，但千万民众面对离谱的房价与眼看要发毛的纸币，恐怕按捺不住购房的冲动。

事实是，不止楼市，为应对货币超发，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投资大幅增长。从今年 5 月开始出现存款活期化苗头，10 月份央行公布的数据终于创出新高。据 Wind 资讯统计，M1 增速自 1996 年 1 月起可查月度统计，今年 10 月的 32.03% 为近 14 年来最高值。M1 和 M2 增速“剪刀差”从 9 月的 0.2 个百分点扩大至 2.61 个百分点。用大白话解读这一数据，就是居民害怕贬值不肯存款，开始将货币从银行搬到股市、楼市和车市等市场。

这是明显的通胀预期。中国历史上，M1 出现 20% 以上，随后 6 个月皆有高通胀相伴：第一次是 1985 至 1987 年的高通胀期间，1987 年 12 月 M1 同比增速高达 26.70%。第二次是 1992 年至 1996 年的高通胀期间，M1 同比增速持续高于 30%，1993 年 12 月甚至高达 38.80%。第三次是 2007 至 2008 年间，M1 同比增速持续高于 20%。1~10 月份企业存款增速高达 36%，而全部存款增速仅为 27.46%，相差 8~9 个百分点。反观反映通胀情况的 CPI，依然如温水煮蛙，在原地缓慢向前。

更有甚者，为了让 CPI 的涨幅不那么高，以前有学者甚至生吞活剥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也就是将农产品(000061,股吧)、资源价格剔除出指标范围之外——是啊，CPI 好看了，但把核心指标剔除出去，这样衡量物价的温度计没有任何价值。

美国曾经有过高增长、低通胀的美好时光，小布什执政的前期就是如此，他甚至把高喊预算平衡的斯诺踢出内阁，而延请了华尔街银行家、原高盛董事长保尔森为财长，美国本已严重的赤字一发不可收拾。由于中日等国购买美国国债、提供了大量廉价商品，美国的幸福时光一直延续到 2008 年上半年。

黑天鹅突然飞过，到 2008 年上半年，能源价格节节上涨，全球惊呼通胀来临，但此时货币危机也就来临了，甚至没有过度期，经济从炎夏突然转入隆冬，这就是货币增发与资产泡沫的威力。

中国比美国稍好之处在于，银行中 26 万亿元以上的存款让宽松的财政政策有了底气，同时金融杠杆程度又不高。当居民争相把钱从银行取出时，银行又靠什么来维持扩张政策，保持长期的资产泡沫呢？

CPI 应该被扫到墙角，以目前的货币政策，在急速的通胀后是下一轮货币危机。君不见，全球资源期货价格上升，中国能源价格拉开大上涨的序幕？

注：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幸福岁月里，大部分时间没有发生通胀，最终国际通胀伴随着货币危机。不发生通胀就需要人买单，美国由全球买单，中国呢？存款居民，投资者，最后是纳税人。

国家统计局承认消费统计有缺陷。

国家税务局提出知情权。现在的关键是预算的透明，如果继续以保密等理由让预算黑箱操作，一切边角的改革难以见到成效。既然广州能够公开，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

作者：叶檀

来源：凤凰网，2009 年 12 月 04 日





货币政策正常化，明年或存五大意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经济政策，引发机构热议。摩根士丹利昨天(12月8日)发布研究报告指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明年将回归“正常化”，但也可能会发生五项政策“意外”，包括中国先于美联储加息、打击房地产市场投机等。

此外，诸机构指出，明年经济的工作重心已经从经济刺激转向了“城镇化”和“促消费”，这将导致投资领域逐渐降温，但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或不降反增，房地产行业被一致看好。

明年可能会发生五项政策意外

谈及对后市政策的判断，各家投行大多表示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大的政策转变。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预计，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明年将回归“正常化”，但整体仍将保持宽松并支撑经济发展。货币政策基调恐怕要到明年年中开始随着银行新增贷款逐渐正常化至 7 万亿~8 万亿水平而转成中性，央行最早将在三季度加息，幅度最多不会超过两次 27 个基点，人民币汇率制度到明年年中可保持不变。

美银美林证券经济学家陆挺预计，至少在明年春季到来前的几个月中，央行不会调整利率或者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保持稳定。

但另一方面，王庆同时列举了明年可能会发生的五项政策意外，预计这些意外发生的概率在一成到三成之间。

王庆指出，这五大意外分别是：中国先于美联储进行加息；中国早在第二季度就出台紧缩政策；全年 CPI 超过 4%；人民币汇率全年不变仍盯住美元；以及出台与 2008 年类似的打压房地产行业的相关政策。

在王庆看来，中国先于美联储提前一个多月就加息的条件是，CPI 急速上升、资产价格泡沫不断膨胀，但即使出现这种情况，央行还可以选择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其他手段来进行调控。此外，如果明年一季度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加速上行，CPI 和出口增速纷纷转正，引发政府对于经济过热的担忧，就有可能激发政策在二季度就开始紧缩，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可能会引起经济二次探底。

另外，在汇率政策方面，王庆指出，不排除一种可能，即人民币汇率实际盯住美元的政策在明年 11 月 G20 高峰会议召开之前都保持不变。但中国很有可能会在会议召开前后重新使人民币走上缓慢升值的通道。

对于房地产政策，王庆表示，一些主要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已经引起一些学者和消费者的不满，并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但考虑到供应量上市约需 6~9 个月的时间，因此在这期间房价仍有可能继续攀升。中国曾在 2007 年底至 2008 年实施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措施限制供给，对于政府是否会再次打压楼市的担忧也越来越多。但王庆指出，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房地产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作为支撑。

“为打击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者，政府可能会出台严格的第二套房贷标准等政策，但这些都不会影响房地产市场明年整体向好的趋势。”王庆表示。

投资将降温房地产、消费行业被看好

陆挺表示，2010 年中国经济的两项重点一是“城镇化”，一是“促销费”。事实上，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投资领域政策态度正发生转变。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强调了政府会“保持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这和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显著增加公共投资”的基调形成鲜明对比。这表示，2010 年开工的新项目可能会比 2009 年有一个显著的降低。

摩根大通中国研究部主管李民指出，预计政府将确保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但会对新的投资项目进行严格审核。

“虽然中央强调了 2010 年继续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投资政策发生变化，”野村证券中国区





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表示,“这通常是为了提前出手遏制投资过热,这一变化表明政府现在不是很担心 2010 年的经济增长,而是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房地产投资或不降反增。

王庆表示,“房地产投资将在明年提速,这将平滑基建领域投资的放缓。”

中金公司发布最新报告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决议内容对房地产行业影响正面。该报告指出,“2010 年房地产政策的重心是增加供给而非打压需求,不仅如此,在需求方面除自住需求外,还明确提出了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需求方面仍是非常鼓励的,我们认为鼓励住房需求释放的政策将作为推动消费拉动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成为长期政策。可以预期到未来 5 到 10 年我国住房居住条件将极大改善。房地产市场将迎来较好的黄金发展期。”

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报告同样指出,从中央工作会议传出的信息来看,并未传出冷却房地产市场的信号,预计在明年年中前不会出台打击楼市的措施。

不过孙明春认为,不排除央行适时取消对房屋抵押贷款,尤其是二套房和三套房抵押贷款的优惠政策,以防止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除了房地产行业被看好之外,摩根大通认为此次工作会议有利于中国消费行业,并看好家电、汽车、零售商及中资银行表现。高盛此前也表示看好汽车、零售等行业在明年的表现。但从短期市场表现看,陆挺则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对市场影响料将有限。

作者: 马骏骏

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2009 年 12 月 09 日





Guide:

- **“It Actually Made Me Think”: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the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Classroom**
-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Infusing Liberal Learning into a Business Curriculum**

We advocate for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s a rhetorical pedagogy for business communication. Briefly put, classic PBL inverts the typical instructional sequence; rather than presenting concepts first and then asking students to apply them, PBL creates situations in which students must

learn the concepts in order to solve a “problem” constructed for that purpose. Thus, students learn in an iterative process as they cycle through the three key questions: “What do we know?”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and “How will we learn it?” We advocate emphasizing three key elements inherent in classic PBL: rhetoricity, locality, and change.

Key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rhetorical pedagogy

FIRST DAY OF classes, mid-January. Students arrive in their classroom to find a simple set of instructions on the white board:

Find your group members and sit with them.

Three questions are list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ard:

1. What do you know?
2. What do you need to know?
3. How will you learn it?

And so begins another

*“It Actually Made Me Think”: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the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Classroom*

semester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WRT 227,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RI). After asking the instructor for help and not receiving any, students are forced to rely on themselv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and complete this first assignment of the term. Lost, they turn to the three questions on the board. *What do we know?* They know that they are in a computer classroom, and they know how to use the computers to some extent. They also now know that the instructor will stay out of it until they figure out the solution on their own.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Where to find the list with the members of each group. *How will we learn it?* Accurately, they quickly realize that they need to use the tools in front of them to learn what they don't yet know.

Within 5 minutes, most students have logged on to WebCT (the online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read an introductory message in their mailboxes, and found the list of groups posted to the discussion board. Within 8 minutes, they relocate around the room in their assigned groups. The few students who don't already know how to use WebCT are quickly taught by their classmates, and all students have logged on by 10 minutes into the class session. By 10 minutes into the class, students know that they will have to do the work for themselves, that this is no lecture class.



Both of us have been teaching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 various forms for over 10 years. We were trained in the active and rhetorically robust “case” method advocated in Porter, Sullivan, and Johnson-Eilola’s (2003) *Professional Writing Online* and, since that time, have continued to integrate some of the best insights and practices as circulated in the journals and discussed at conferences. We have also borrowed from other disciplines our approach to active, constructivist pedagogies in which students create knowledge together, pooling thei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sights, experiences, and areas of expertise—in theory, for deeper learning and more engaged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for more on constructivist pedagogi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see Bain, 2004; Erickson, Peters, & Strommer, 2006; Kuh, 2008).

In this article, we advocate for one such pedagogy in particular for the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course: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Briefly put, classic PBL inverts the typical instructional sequence; rather than presenting concepts first and then asking students to apply them, PBL creates situations in which students must learn the concepts in order to solve a “problem” constructed for that purpose. Thus, students learn in an iterative process as they cycle through the three key questions: What do we know,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and how will we learn it? In this article, we advocate emphasizing three key elements inherent in classic PBL: *rhetoricity*, *locality*, and *change*. Rather than keeping those possibilities embedded, we want to foreground their prominence within PBL.

Since PBL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local communities surrounding our classrooms, we begin with an overview of our context. We both regularly teach WRT 227: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This course is taught through the Writing & Rhetoric department at URI by our faculty, instructo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It is intended for sophomores and juniors from the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usiness students at URI major in account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wanting business.” This final group of students consists of those petitioning to get into the College of Business, who take the course hoping that they will soon be admitted to the college. Many, but not all, of our classes meet in networked computer classrooms, providing each student with a laptop or desktop. This situation allows us to ask students to begin assuming roles found in their majors; for example, how might an entry-level accountant respond to this problem? We also know the courses that certain students have taken and will take in the future, offering us some background knowledge that we can expect them to have.

Before discussing PBL in more detail, we want to first bring it to life with a more complex problem than that in the opening vignette. Both of us teach a blood drive project at some point in the term. In terms of documents produced, the blood drive project is rich: In order to host a campus blood drive, students must fill out forms and compose a range of solicitation letters, agreement memos, inquiry emails, publicity flyers, radio spots, tent cards for the dining halls, signup sheets for volunteers, thank-you notes, and a reflective transmittal memo to the professor. The research is also rich: Students can use the Web, but they also need to visit campus sites and talk to actual human beings. And the collaborative work is undeniable, as this is too large a project for any one student to do alone in the short time frames we allow. This example from our classes might help to illustrate how these three elements—rhetoricity, locality, and change—can work together in PBL and thus help our students more effectively learn what we consider to be key concepts i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Blood drive projects epitomize much of what brought us to shift our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course toward PBL. In addition to promoting active,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in a collaborative setting and requiring students to practice a wide range of business-oriented genres and situations, our blood drive





projects also highlight rhetoricity, locality, and change.

Rhetoricity. Throughout the project, students attend to the full rhetorical situation:

- Who is the audience? (Example: owner of the local pizza place)
- What is their purpose? (Example: to obtain a donation of free pizza for all who give blood)
- What genre is appropriate? (Example: a letter, followed up with a phone call and a face-to-face

visit)

- What tone and style will be effective? (Example: respectful and professionally concise)

• What document design issues matter? (Example: the choice of letterhead, bulleting key information on logistics)

• What is the writer's ethos? (Example: a student, but also the representative of an organization hosting a major service event)

Locality. Reflecting a turn toward place in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this approach is reflective of and responsive to local communities and campuses (Keller & Weisser, 2007; Reynolds, 2004). No matter when we teach this project, it always seems to coincide with an actual blood drive happening on campus. Thus, the blood drive is a local issue, successful only with support from local organizations. Although the Red Cross is involved, student research inevitably leads them to its local instantiation, the Rhode Island Blood Center. More importantly, campus blood drives are indeed hosted and organized by students just like themselves on their own campus.



Change. This notion of change operates on multiple levels for us. First, we are interested in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students experience the pragmatics of, simply put, getting something done. More elegantly stated, our students are learning how to accomplish coordinating tasks with complicated outcomes within an organizational setting. Second, we are also interested in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students can test out for themselves different social, political, and ethical stances, different ways of being in the world, so to speak, especi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The blood drive compels students to envision change as “doing something good.”

Students in one of Michael's classes picked up on this theme of change.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blood drive project, a 3-day blood drive was just beginning in the student union. Reflecting on the coincidental timing, he entered class expecting to see not only their finished projects but also a few bandages on the arms of those who had just given blood. Students, after all, had just spent the better part of 2 weeks advocating for more blood donations through student organizations. They knew the facts, and they realized the urgent need for continuous donations. Collecting their folders, Michael asked how many students had given blood yet. No hands were raised. Further, no students planned to donate blood during any point in the next 3 days. One student turned the conversation around and asked Michael if he had donated yet, or if *he* was planning on it. Admitting he neither had nor was planning on it, Michael allowed the class to consider how difficult change can be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class. As one of Libby's students wrote in a course self-evaluation, “I can't believe how difficult it can be to try to do something good!” Indeed, it is.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 OVERVIEW

Like other pragmatically based theories and pedagogies, PBL thrived in professional schools long before making its way to the more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in the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e earliest cited examples of PBL appear in reforms to medical education at Canada's McMaster University (see Neufeld & Barrows, 1974). In the mid-1970s,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necessitated a different radical teaching paradigm to prepare medical practitioners. Reliance on content cramming—the predominant model at the time, in which each doctor was trained as an “expert” with knowledge on the tip of her tongue—grew increasingly impossible with the rapid proliferation of new information, new research, and constantly changing protocols. Instead, educators at McMaster devised a more *strategic* approach, in which students would learn how to find and use the information appropriate to any given situation. Rather than counting on having the research on the tip of their tongues, so to speak, students learned how to access and apply what they needed, keeping it within reach of their fingers instead. In other words, they learned and practiced procedural knowledge. They engaged with large amounts of content through a procedural framework, thus learning how to learn as they went. This more strategic approach has since been adopted by numerous medical and other professional schools: business, pharmacy, dentistry, and nursing, to name a few (Albanese & Mitchell, 1993; Amador, Miles, & Peters, 2006; Delisle, 1997).

In its purest forms, PBL follows a set and predictable pattern in the classroom:

1. Instructor presents student groups with the problem.
2. Students compile their own knowledge, asking “What do we know?”
3. Students reach the limits of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brainstorm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4. Students rank-order their learning goals and ask “How will we learn it?”
5. Students divide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se learning issues and execute their plans.
6. Students bring back their new knowledge to the group, integrating and negotiating what they’ve learned with what they already knew.
7. Students take stock of where they are now and articulate what they need to learn next, repeating steps 2 through 7 as often as needed.

Note the agent in six out of seven of these stages: Students mus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learning. The instructor’s role is to set up the problem, to facilitate and guide, and to sequence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problem to help students accomplish the course objectives. With the creation of thoughtfully sequenced and situated problems, PBL leads with the scenario, demanding that students learn their way into the course content through a particular context. Thus, our PBL classes do not begin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theory that we are about to apply or the approach that we are about to try. Instead, problems function inductively, so that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theory from their practices in a framework that we create.

For example, consider the opening day prompt on the white board with which we began this article. In past semesters, we might have taught an introductory sequence on “getting started with WebCT,” perhaps with some interaction and a front-of-the-class demonstration. It probably would have taken at least 20 minutes and would have been both boring and redundant for most students—and for us. Instead, students began working the problem on their own using their own resources, resulting in deeper learning that was both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PBL has a few qualities that we think make it particularly well-suited to the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curriculum. First, as already discussed, the concept of “rhetorical situation” drives the learning. Working with the new owner of a local child-care center, Libby’s students devised multifaceted marketing plans and presented their recommendations to him. In addition to their onsite, Internet, and print research, they also needed to pay very careful attention to their audience—the nice man who attended their presentations and genuinely wanted their creativity and insights. One student wrote on an end-of-semester evaluation that “it was a lot more difficult to do with a real audience, because if we





wanted him to really change things, we had to be careful about how we presented i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motivated the students to greater sophistication in both their visual presentations and their written reports for him. 

Second, PBL demands writing and speaking. These elements are crucial to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to any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curriculum. Likewise, they are also crucial to the PBL process in any discipline. During every class session, groups informally report to the rest of the class about their progress and new insights. Each project—and many times, each phase within a problem—culminates in a written product. Specific to our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classes, each final packet contains an extensive reflective memo, articulating and justifying the rhetorical choices made.

Third, PBL relies on a flexible and generative inventional framework that must be altered to suit the occasion—a heuristic. Students internalize this heuristic through repeated practic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enabling them to become more effective business writers wherever they may end up. With this model, a second-year course becomes not a mandated coverage course but rather a set of learned practices that can be called upon and deepened as students continue through their education and careers. Libby’s students illustrated this principle in action in fall 2007. Frustrated by repeated technological failures in their classroom, one group of students began to joke about their “problem” classroom. They mockingly used the three-question framework at the start of class:

- *What do we know?* “This classroom sucks. The laptop batteries are shot before we get here.”

-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Why can’t we just plug them in? Why are there no outlets or cords available to us? Why was this brand new ‘smart technology’ classroom designed with inadequate technology?”

- *How will we learn it?* “Storm the Dean’s office!”

From their joke, a new problem was born; Libby dropped the fourth project in favor of pursuing their new “not-so-smart” classroom problem. Whether or not the students realized it, we could see that they had internalized the heuristic deeply enough that when confronted with a frustrating situation, they used it.

Fourth, PBL establishes the importance of distributed roles and expertise in collaboration. In a PBL situation, students cannot effectively work on the project unless the tasks are distributed and completed simultaneously and cooperatively. For example, in Michael’s class, one group member conducts background research on the company’s Web site while another calls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company with questions being fed to him by a third student, working between the two.

WHAT PBL ISN’T

Since PBL relies on situations within which students consider change, it overlaps with many pedagogical approaches i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Moreover, situational learning in general is not new to the teaching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 fact, even many genre-based approaches tend to rely on situations or cases for the context within which students employ a particular genre, such as a memo or business letter. Th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extbook market offers numerous books that rely on real-world situations. However, most of these situations only use the context for background in order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with a genre. Thill and Bovée’s (2008) *Excellence i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d its family of related texts provide students with numerous real-world contexts involving companies very familiar to students. For example, in the “Writing Negative Messages” chapter, instructors may assign students any number of longer writing projects, such as “No deal: Letter from Home Depot to faucet manufacturer.” The





task and title, while surrounded by thorough descriptions of context, give students the answer up front—students do not see how genres and documents emerge from a particular problem and situation. Instead, the genres and documents are predetermined and applied to a situation. In contrast, a PBL approach might use that same real-world situation but not require a specific outcome or product. We tend to use textbook situations for ideas, but then we revise them into a PBL format. The title might instead read “Leaky Faucets, Leaky Profits,” and the students would be charged with deciding what genres and documents they need to produce in order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as Home Depot employees.

Additionally, PBL may strike some as a case-based approach because it does not foreground genre. Self-contained and well-developed cases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fairly structured point of access and ask students to analyze a particular incident. Cases provide an excellent means of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how such communication is influenced by organizational crises (see House, Watt, & Williams, 2004; Zoetewey & Staggers, 2004). Cases differ from PBL in two important ways. First, similar to the real-world contexts discussed above, case projects often demand specific products from the students—an analysis paper, or a memo, or a business plan, for example. Second, most cases are introduced after a thorough discussion of the theories or concepts to be addressed. In a casebased classroom, instructors might offer the principles for a “bad news” letter and then push the concept further through the use of an organizational crisis situation. In contrast, instructors in a PBL classroom would present the crisis first and then guide student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how to handle bad news sensitively, how to find appropriately broad and efficient delivery systems, and how to collaborate effectively to find creative solution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is in the ordering of the pedagogical sequence: case first, rather than concepts first.

Following the service-learning turn in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has also witnessed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ervice-learning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pedagogies. Unlike case-based approaches, such initiatives tend to move students beyond the classroom and into the community. In general, such learning highlights the service aspect of assigned projects, with the goal of “helping” a targeted group,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see Bowdon & Scott, 2003; Bush-Bacelis, 1998; Littlefield, 2006; McEachern, 2001; Mennen, 2006). In its best form, service learning echoes many of the goals of PBL. Recent advocates of service learning,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writing, have given thoughtful consideration to the role of “service” in these curricular shifts. Grabill (2001) writes, “Service learning allows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move into community contexts in structured, meaningful, and potentially longterm ways in order to solve problems” (pp. 152-153). Such a characterization of service learning is more productive as it avoids creating and relying on the dichotomy of non-profit versus for-profit organizations (see Hutchinson, 2005; Mara, 2006). This view “puts more emphasis on doing things than on being someplace” (Deans, 2007, p. 292). Rather than entering the community or partner organization with a “product” in mind, more critical pedagogical approaches, such as Mara’s (2006) use of charettes (a collaborative problem-solving process between professionals and community members), involve “no prefabricated solution” (p. 231). As with both real-world and case-based assignments, servic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can easily become powerful and exciting PBL projects. Indeed, service learning can and should provide meaningful real-world contexts and cases. The crucial distinction, again, is in the amount of parameters set by the instructor and the order in which those elements are introduced to students.





PBL AND RHETORICITY

Although it may seem like splitting hairs to differentiate among these pedagogical approaches, we would argue that PBL moves the classroom situation closer to authentic rhetorical learning, with its emphasis on deriving solutions from the situation itself. Another way to conceptualize this switch is to think along a spectrum of how many parameters are given to the students upfront, and how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rhetorical choice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make for themsel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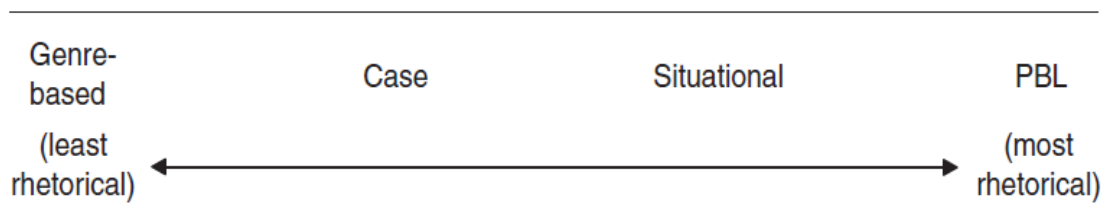


Figure 1. Rhetoricity of Pedagogical Approaches

We locate genre-based assignments on one end of this spectrum: In the typical *genre-based* assignment (e.g., “write a memo to your boss requesting permission to telecommute” or “revise this bad news letter to a client”), most of the rhetorical parameters are given—the genre, the audience, and often the tone as well (see Figure 1). In such classrooms, teacher and textbook present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students practice the skills at home and turn in their completed draft for review and revision. Farther along the spectrum, we’ve found *case-based* assignments, in which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concepts that they then apply to a case. The specific genre or genres may or may not be assigned; other elements of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may or may not be spelled out. Approaching the opposite end of the spectrum, in *situational* assignments, students are placed in a situation and need to figure out for themselves how to respond, often guided by a particular chapter in a textbook. Their completed projects may include a range of genres. At the far end of the spectrum, we put PBL. With PBL, students are not provided with a guiding theory or theme for the project; rather, it is up to them to figure out what the situation calls for, how to do what they are being asked to do, and how to do it effectively. Because it prescribes so few of the parameters, we claim that PBL provides an inherently rhetorical framework for th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classroom. But it is also more than that.

According to Amador et al. (2006), PBL “allows both us and our students to see the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 informed, thoughtful, and engaged citizens working together to solve problems that people really care about” (p. 131). And in this manner, it bridges the rhetorical divide of much professional writing pedagogy. Servicelearning initiatives sought to overcome the *techne*-centric approach to professional writing.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the “making of” professional documents, service learning focused on *praxis*, on the social action of professional writing. In turn, seeing professional writing as *praxis* promotes the goal of creating a critical citizenry. PBL, as described by Amador et al. (2006), further blurs the *praxis*/*techne* divide introduced by Aristotle, in which *praxis* occupies public life and *techne* occupies the work/professional sphere. As Mara (2006) describes in his characterization of *charettes*, they “fold *praxis* and *techne* concerns together in a way that demonstrates how bodies are affected by both practical and political concerns” (p. 220). When solving local problems, students engage in activity systems that require a concern for *praxis* and *techne*, even if they remain physically on campus. Genres and audiences change daily—there are no predetermined products. And, as students quickly realize, change is difficult and messy.





PBL AND LOCALITY

Our arguments for PBL's rhetoricity, locality, and potential for change may sound a bit too pie-in-the-sky without some additional examples. The local angle functions at several levels, beyond simply making it "real" for the students. Here, all the standard arguments in favor of service learning apply (Adler-Kassner, Crooks, & Watters, 1997; Cushman, 2002; Deans, 2000; Peck, Flower, & Higgins, 1995). Students see us modeling a connection to our community, and they also begin to notice things around them that they might not see otherwise. As with service learning, focusing on the local allows students to begin constructing themselves as student-citizens, not just as precorporate business students. Shifting to PBL has required us to stay open to local situations that may present themselves. We read the community and campus newspapers differently, and (as with the "not-so-smart" classroom problem) we listen to our students a bit differently as well.

In a recent semester, one of Michael's students came to class out of breath and visibly shaken. After she got settled, she explained her situation: She is diabetic and needs to eat when her blood sugar gets to a certain point. Most buildings have vending machines with snacks available somewhere, but this particular building did not. Other students were concerned on her behalf, offering a variety of snacks from their backpacks. A month later, Michael designed the final project to investigate the vending machine situation on campus in light of health and disability issues. What is the campus policy on vending machine availability? How need for change? If so, who would be



Unbeknownst to Michael, the university was in provider, making the research driving such

assiduously is it followed? Is there a responsible for improving the situation? a negotiation year with their vending questions especially timely and difficult.

Local doesn't just mean "campus," service learning has persuasively argued the relations with the organization with whom we

however. Excellent scholarship on need to foster longterm and ethical do service projects (Cushman, 2002;

Grabill & Simmons, 1998). It is clear that the same holds true for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riting situations as well. We have been mindful of these arguments and have sought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as well. Libby has been a board member for a local charter school, with a public commitment to fostering a sustained relationship. There, too, a problem found us: The school quickly implemented a "no-nuts" policy when a 5-year-old student with a severe nut allergy enrolled. Many potential problems ensued. We decided that an appropriate scope for Libby's students would be to research hot-lunch options and arrangements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school.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is problem, students needed to research the federal regulations for providing free and reduced lunches in public schools, understand the school's mission statement and curricular framework, find all the possible hot-lunch providers in the state, compare their costs and menus, and deliver an oral presentation of the financially and ideologically feasible possibilities to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board, following up with a written recommendation report. Quite literally, the school had a problematic situation, and our students helped research and find a way through to viable solutions.

PBL AND CHANGE

As we've suggested above, we contend that designing PBL problems with a specifically local emphasis allows instructors to push the rhetorical components of the course into high gear. Now we go further—emphasizing the local makes possible an ethic of change permeating the class. As we have discussed and developed our courses over the years, we have asked ourselves and each other if the PBL approach might encourage students both to conceptualize possibilities for change and to realize





their own capacity to enact it.

It has been our hope that PBL does just that. By placing students in multiple rhetorical situations, it develops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differences among and across those situations. By creating complicated problems situated locally, PBL allows students to see for themselves how change can realistically happen in all its messiness and complicatedness—and when it is not possible, as well. After a few problems, students see that the solution is never simply topdown or bottom-up. Instead, it is usually both/and, within a more community-based context with additional pressures from outside the classroom. Students quickly learn that they need to attend to all dimensions—immediate, organizational, social, political, ethic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in a given problem. It gets beyond simple “just resist!” approaches (rare in business students anyway) and simple “okay, you’re the boss!” responses (far more common). Instead, they find that they need to locate where and how they can have just enough power to get the job done. 

For example, one of Libby’s students wrote in her reflective memo, “In order to pull this off, I had to write myself in as a managerial-level employee. Once I made that assumption, I could get things done.” In another class, a different group had designed and drafted a contract to specify the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for different parties in the blood drive. One student had lined up her sorority and another offered his fraternity as “sponsors” for the blood drive, and the group was asking for seed money to purchase extra incentives for donors. Their third member asked, “But what do we call ourselves? We can’t just say WRT 227 is our organization.” The key: They didn’t need money from the Greek system, they needed the organizational credibility.

Thus, we believe that if PBL is more rhetorical and more local than other approaches, it carries with it more potential for engendering an ethic of realistic change.

COMPLICATIONS, FRUSTRATIONS, AND SIGNS OF HOPE

As with any situational learning that asks students to move beyond the classroom, there are complications. The same elements that make PBL so rich and rewarding for our students and us also introduce obstacles. In what follows, we describe five of those complications, while also pointing to the potential for such opportunities to function as reflection on our teaching—pedagogical reality checks.

1. Too local. In our experience, the best problems are local problems. Local problems engage students, provide various avenues for research, and offer insight into change on a local level. However, local problems also provide the potential for students to be involved in or affected by the problem. More than likely, a number of our students will have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with a particular problem we use for the course. Again, this is generally a positive element of PBL; for example, many students had experience using a campus-based designated-driving program or had friends who had volunteered for the program. Unfortunately, there was also a student who had lost a boyfriend that semester in a car accident. The designated-driving project hit unusually close to home for her. When we use very local problems, we also open the class up to uncomfortable situations that may involve them on a personal level.
2. Phase discomfort. Some students are uncomfortable with the PBL structure, in which a clear end product or outcome is not presented along with the problem. In a typical genre-based pedagogy, students know that they are producing a bad news letter to employees, for example. The lack of such predetermined ends proves frustrating for some students; as one student wrote, “It was frustrating not to know what our final project would be from the beginning (3 phases). It almost caused me not to work on the first 2 because by the time I got to the third, the project was





completely changed.”

3. Group dynamics. This particular complication is not unique to PBL. Group projects in all courses are prone to difficulties in group dynamics. However, our experience shows that creating balanced groups is key to successful PBL. Luckily, since our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courses are populated by business students for the most part, we can divide them up based on majors, such as account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so on. Also, PBL makes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a sole group member to complete the entire project. Each group member needs to contribute or the group suffers, especially since there is no predetermined outcome that a single group member can target. Having said that, peer evaluation mechanism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ensuring accountability.
4. Level of client involvement. When the problems directly involve outside audiences such as clients, the success tends to hinge on the clients' level of involvement. Students need feedback and guidance as they are working on the problem. Much of this cannot come from the teacher, requiring a client to guide students. Without active client involvement, a project can suffer and groups can get frustrated. After presenting recommendations to what seemed to be a disinterested audience, one of Libby's students mused, “I liked the real life scenarios, just wished our visitors followed through more.”
5. Teacher not expert. Since there are few predetermined outcomes or products, and due to the expansive potential for problems, teachers do not function as experts in the subject matter. Occasionally, we lead students down wrong paths as we try to help them research a problem. We do not have solutions for the problem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us to offer “right” answers. There could be a multitude of right answers. Another student acknowledged that “at times it was frustrating, but it got you think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at you may not have normally done.” During the designated-driving project, students quickly realized that the teacher lacked the answer to why the program failed. As one student wrote, “It was difficult when we had questions that no one could answer. I did like the sharing of ideas by peers, though.” This can be an unsettling dynamic for many teachers, comfortable in their traditional role as “experts.” Nonetheless, it potentially places the teacher in a position like the students—a researcher looking for clues and potential answers. We learn with our students.

Despite the pedagogical, logistical, and sometimes emotional difficulties, we have found that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PBL satisfies our compulsion to teach with an emphasis on rhetoricity, locality, and change. Our students can be a tough crowd, yet over the years we have found that they respond well—with some very sophisticated results—to our rhetorical, local, and change-oriented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course design. We are fully aware that students might be just as happy in (and well-served by) a more traditional syllabus, but our commitment to rhetorical pedagogies for change pushes us to try. Happily, it seems this effort lands with some students. One end-of-semester evaluation claimed that in our class, “we do much more work. My roommate is in a different class and it's a joke. But I learned more, so HA!” In the refreshingly honest course evaluation referenced in our title, an anonymous student wrote that the course “actually made me think. A lot of professors just spoonfeed, which is cool with me, but you don't learn as much.”

Through PBL, students are experiencing deep rhetorical learning, developing organizational sensitivity, learning to respect the local, and practicing an ethic of





change, and some even suggest that they are working really hard. Which is cool with us.

References

- Adler-Kassner, L., Crooks, R., & Watters, A. (1997). *Writing the community: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service-learning in composi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 Albanese, M. A., & Mitchell, S. (1993, January). Problem-based learning: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its outcomes and implementation issues. *Academic Medicine*, 68, 52-81.
- Amador, J. A., Miles, L., & Peters, C. B. (2006). *The practice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A guide to implementing PBL in the college classroom*. Bolton, MA: Anker.
- Bain, K. (2004). *What the best college teachers d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wdon, M., & Scott, J. B. (2003). *Service-learning in 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Longman.
- Bush-Bacelis, J. L. (1998). Innovative pedagogy: Academic service-learning for business communicatio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1(3), 20-34.
- Cushman, E. (2002). Sustainable service learning programs.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64, 40-65.
- Deans, T. (2000). *Writing partnerships: Service-learning in composition*. Urbana, IL: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 Deans, T. (2007). Shifting locations, genres, and motives: An activity theory analysis of servicelearning writing pedagogies. In C. J. Keller & C. R. Weisser (Eds.), *The locations of composition* (pp. 289-30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Delisle, R. (1997). *How to use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 Erickson, B. L., Peters, C. B., & Strommer, D. W. (2006). *Teaching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Grabill, J. (2001). *Community literacy programs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Grabill, J., & Simmons, W. M. (1998). Toward a critical rhetoric of risk communication: Producing citizens and the role of technical communicators.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 415-441.
- House, R., Watt, A., & Williams, J. M. (2004). Teaching Enron: The rhetoric and ethics of whistle-blow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47, 244-255.
- Hutchinson, M. (2005). Living the rhetoric: Service learning and increased valu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dagog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Teaching Literature, Language, Composition, and Culture*, 5, 427-444.
- Keller, C. J., & Weisser, C. R. (Eds.). (2007). *The locations of composi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uh, G. D. (2008). *High impact educational practices: What they are, who has access to them, and why they matter*. Washington, DC: AAC & U Publications.
- Littlefield, H. (2006). Service learning i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Real-world challenges develop real-world skills. *Busine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9, 319-322.
- Mara, A. (2006). Pedagogical approaches: Using charettes to perform civic engagement i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classrooms and workplaces.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5, 215-236.





- McEachern, R. W. (2001). Problems in service learning and technical/professional writing: Incorporating the perspective of nonprofit management.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0, 211-225.
- Mennen, K. (2006). Use service learning to add real-world writing experience to your cours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9, 192-195.
- Neufeld, V. R., & Barrows, H. S. (1974). The "McMaster philosophy": An approach to medical education.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49, 1040-1050.
- Peck, W. C., Flower, L., & Higgins, L. (1995). Community literacy.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46, 199-222.
- Porter, J., Sullivan, P., & Johnson-Eilola, J. (2003). *Professional writing online, version 2.0*. New York: Longman.
- Reynolds, N. (2004). *Geographies of writing: Inhabiting places and encountering difference*. Carbondale, IL: SIU Press.
- Thill, J. V., & Bovée, C. L. (2008). *Excellence i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8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Zoetewey, M. E., & Staggers, J. (2004). Teaching the Air Midwest case: A stakeholder approach to deliberative technical rhetoric. *IEEE Transactions o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47, 233-243.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Infusing Liberal Learning into a Business Curriculum

AT BENTLEY COLLEGE, a four-year private institution located in Waltham, Massachusetts, over 90 percent of students major in business disciplines. For decades, Bentley's strong arts and sciences departments have battled for a place within an overwhelmingly career-focused curriculum, and great strides have been made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and the arts and sciences. Recently, for example, students gained the opportunity to pursue a double major comprising a business discipline and an interdisciplinary liberal studies program. And over two recent summers, in an effort designed to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liberal learning principles across the curriculum, the college has offered weeklong workshops to faculty in both business and the arts and sciences.

The value of liberal learning

Bentley's desire to integrate liberal learning principles across the curriculum is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business and the arts and sciences are *complementary*, rather than competitive, elements of a complete education. A genuinely rich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basis for both professional success and a more meaningful life.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ambiguity, for example, or to integrate seemingly unrelated ideas and perspectives helps young women and men succeed in their chosen fields. This notion is echoed by the forme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General Motors, Roger Smith (1987), who believes that "the Liberal Arts may ultimately prove to be the most relevant learning model. People trained in the Liberal Arts learn to tolerate ambiguity and to bring order out of apparent confusion. They have the kind of sideways thinking and cross-classifying habit of mind that comes from learning, among other things, the many different ways of looking at literary works, social systems, chemical processes, or languages."

Fostering such "sideways thinking" is one aim of the liberal arts. Getting business students to





recognize that they, too, can benefit from such a background is essential to their success in industry. Employers are asking for a broader set of skills and attitudes that include mor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quantitative skills as well as familiarity with and grounding in issues related to innovation, diversity, and global cultures (Schneider 2005). According to Roberts T. Jones (2005, 35), “virtually all occupational endeavors require a working appreci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ethic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s that surround the application of skilled work.”

Give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need to reexamine their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preparing their students for the ever-changing nature of “the world of work” (Schneider 2005, 3). As Thomas L. Friedman (2006, 302) observes,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ability you can develop in a flat world is the ability to ‘learn how to learn’—to constantly absorb, and teach yourself, new ways of doing old things or new ways of doing new things.” Such an approach is the basis of a liberal education.

Liberal learning workshops

In 2004, Bentley College received a grant from the Davis Foundation to integrate liberal learning with professional training. Recognizing the overlap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al approaches and enhancing some of those approaches was one goal of the workshops supported by the Davis Foundation. “Our goal,” the grant application explained, “is to reshape the curriculum in such a way that our students will encounter core liberal arts skill sets and perspectives in all their courses, and will be able to make meaningful and productive links between and among seemingly vastly different learning contexts. The priorities of liberal education will then be ‘marbled’ throughout the curriculum.” In addition, we set out to “marble” these perspectives and skill sets into the curriculum so thoroughly that students will repeatedly encounter and practice these elements in a multitude of courses and contexts well beyond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re. Ideally, students will be exposed to these ideas, concepts, and complexities over four years in their general education, arts and sciences, and business programs of study.



Following a collegewide search, the dean of arts and sciences appointed the chair of the finance department as the program director for the Davis gran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dean, the director, in turn, appointed three liberal arts faculty members to serve as both organizers and facilitators of the workshops. These faculty members were chosen from the history, natural and applied sciences, and English departments. During the fall and spring semesters of the first year, they met to assess current liberal learning initiatives on campus, to discuss the needs of the faculty, and to design a faculty workshop. They determined that the workshop should encourage faculty to examine the limitations of discipline-based thinking and practices, to consider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urrent assignments, and to infuse their courses with materials that highlight the five strategic areas of the grant: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echnology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reative thinking and critical analysis;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and diversity and global citizenship.

Throughout the first year, the Davis group worked to develop a workshop that would provide the support, forum, and resources to help faculty consider their syllabi, cases, and course projects in light of the strategic priorities and perspectives; explore productive ways of integrating some dimension of these priorities into what they already do in the classroom; and present their new ideas to and get feedback from workshop colleagues. Faculty were then invited to apply for a place in one of two weeklong workshops to be held during the summer. As part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each described an aspect





of a course he or she was interested in revising (e.g., modifying an existing assignment, revising a course syllabus, rethinking an approach to classroom lectures or discussions, or designing a new module). Once accepted, faculty were encouraged to come to the workshop having thought through the ways in which they might already be incorporating these liberal arts perspectives into their courses or to consider ways in which they might begin to infuse their courses with these perspectives or skill sets.

In addition to enhancing the classroom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the workshops enabled participants to hone their teaching craft. Bentley already provides faculty with a variety of resources for creating dynamic classrooms, such as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classrooms and seminars on topics like ethics and diversity. The workshops supported by the Davis Foundation grant supplemented those programs by providing participating faculty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infuse their courses with liberal learning principles.

Modeling one approach

In designing and leading the workshops, the facilitators were committed to modeling liberal learning principles in the modules offered. For example, facilitators designed sessions that allowed workshop participants to give input on the direction of a session. Recognizing that faculty might attend the sessions with some reservations about being able to implement all of the demonstrated liberal learning strategies in their courses, the first day's module, entitled "Obstacles and Impediments," gave faculty an opportunity to voice their concerns. These included worries about teaching in areas outside of their expertise and sacrificing course content in order to include themes like diversity or ethics. Participants also discussed their anxieties about whether they could rely upon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innovative approaches as well as about the potential downside to innovation.

The overall approach of the workshop was to break down preconceptions of how faculty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divisions teach. During the first two days of the weeklong session, faculty participants deconstructed what currently goes on in classrooms across the college. In order to free them of any disciplinary constraints, modules asked faculty to create assignments, syllabi, and business cases for courses other than their own. In one module, for example, faculty were asked to create a syllabus for a course on Southeast Asia. They were given no other particulars or parameters. The resulting syllabi emerged from collaborations among faculty from a range of departments, including economics, philosophy, finance, and English. Faculty collaborated across disciplines and, by doing so, came up with creative solutions to the many "obstacles" they had listed on that first day. In one case, faculty from history, English, and finance created a transdisciplinary course that included a two-week embedded travel component.

The experience of designing "someone else's syllabus," along with kindred exercises, largely succeeded in liberating faculty participants from their devotion to narrow, rigid disciplinary paradigms. The tran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proved beneficial as faculty moved into a "reconstruction" phas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eek and were asked to concentrate their efforts on changes they wanted to make to their own course materials. This was performed in concentrated personal time called "mini-sabbaticals," which were used to finalize independent work. Following these focused efforts, faculty were asked to pair up with another participant from a different discipline in order to present their ideas. Then, each person presented his or her partner's plans to the larger group.

These paired presentations turned out to be among the most powerful experiences of the workshop. In each case, participants made a special effort to understand and accurately articulate what their partners had developed. For example, in one presentation, a faculty member from the finance





department reviewed the proposed changes of a faculty member from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ogether, they collaborated on ways the literature professor could “marbleize” the themes throughout her Shakespearean film course. In return, the literature professor helped the finance professor think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thical issues into his corporate finance course. In another pairing, a faculty member from the taxation department helped a historian create Great Think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 ambitious course that incorporates material usually fenced off with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and that was later submitted to the college’s curriculum committee for consideration as a future undergraduate offering.



Unexpected benefits

While facilitators planned numerous activities and exercises for the workshop participants, some of the benefits of the workshops derived from experiences outside the classroom setting. Faculty who had often seen each other only at full faculty meetings or during committee work spent one week together from 9:00 a.m. to 4:00 p.m. each day. The lunch hour, often a break from workshop modules, gave participants a chance to become acquainted and to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areas of specialization. The discussions generated during these open periods resulted in arts and sciences faculty and business faculty disabusing each other of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ir pedagogies, curricula, and disciplines. Many faculty expressed delight at being officially encourag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careers, to think in unorthodox and even subversive ways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ir courses and their classroom methods.

The Davis Workshops have been an extraordinary success for Bentley College and have influenced pedagogy and thinking across departments and disciplines. Over the course of two summers of workshops, seventy-four of approximately 250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took part, including thirty-five tenured faculty and twenty-four tenure-track faculty. In all, sixty syllabi in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courses were in some way reshaped by the workshops. But the Davis Workshops were also at the core of a broader redefinition and realignment of the role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culture of Bentley. They served as the intellectual inspiration for innovative arts and sciences initiatives at the core of the college’s mission. In retrospect this makes perfect sense, since the workshops encouraged critical reflection about the limitations imposed by our disciplines and promoted creative connections across disciplines around shared values and perspectives. But the degree to which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has grown is quite astounding.

REFERENCES

- Friedman, T. 2006.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Jones, R. T. 2005. Liberal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usiness expectations. *Liberal Education* 91 (2): 32–7.
- Smith, R. B. 1987. The liberal arts and the art of management. In *Educating managers: Executive effectiveness through liberal learning*, ed. Johnston et al., 21–33.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Schneider, C. G. 2005. President’s message: Liberal Education and America’s Promise. *Liberal Education* 91 (1): 2–3.





SIFT <i>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i>	本期要目
法 学 动 态	➤ 立法动态 ✧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 ✧ 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
	➤ 法治论坛 ✧ 我们为什么要建议人大常委会审查拆迁条例？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 法学教育 ✧ 法学教育应该追求怎样的“国际化”

2009 年 12 月

第 8 期 [总第 33 期]

立法动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67 号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已经 2009 年 8 月 19 日国务院第 77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的行为，便于外国企业或者个人以设立合伙企业的方式在中国境内投资，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称《合伙企业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是指 2 个以上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以及外国企业或者个人与中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

第三条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应当遵守《合伙企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符合有关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国家鼓励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促进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

第四条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用于出资的货币应当是可自由兑换的外币，也可以是依法获得的人民币。

第五条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应当由全体合伙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称企业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申请设立登记,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文件以及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说明。

企业登记机关予以登记的,应当同时将有关登记信息向同级商务主管部门通报。

第六条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伙企业(以下称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七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解散的,应当依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进行清算。清算人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第八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外国合伙人全部退伙,该合伙企业继续存续的,应当依法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九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同时将有关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的信息向同级商务主管部门通报。

第十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登记管理事宜,本办法未作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涉及的财务会计、税务、外汇以及海关、人员出入境等事宜,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中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伙企业,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入伙的,应当符合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并依法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十三条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涉及须经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投资项目核准手续。

第十四条 国家对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合伙企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五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企业或者个人在内地设立合伙企业,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发布时间:2009年12月02日

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在这一进程中,因拆迁而引发的各类矛盾、冲突、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被拆迁人自焚、当事人与政府对峙等极端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有损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激化了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房屋拆迁及其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已经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我们注意到,各级政府对房屋拆迁所引发的各种问题是高度重视的,也采取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屋拆迁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需要从制度上反思,需要标本兼治。如果不能从制度源头上处理好城市发展的公共需求与公民财产权





保护之间的关系,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会进一步加剧,以至严重影响改革、发展(包括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长期从事法律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学者,我们高度认同和支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战略,都强调国家对公民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我们认为:国务院2001年6月6日颁布、2001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并沿用至今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与《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存在抵触,这导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两者间关系的扭曲。立法机关应以法制协调统一原则为基础,对《条例》进行审查,以建立合法、公平、公正的房屋拆迁法律关系。

为此,依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郑重提出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具体依据和理由如下:

一、依据宪法和法律,补偿是征收合法有效的构成要件,应当在房屋拆迁之前完成,而《条例》却将本应在征收阶段完成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

《宪法》(2004年修正后)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2007年颁布)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后)第6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据此,要通过征收获得公民房屋的所有权,必须具备三个法定条件,亦即必须满足三个标准:(1)“为了公共利益”;(2)“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3)“给予补偿”。

可见,补偿是征收的构成要件之一,未依法补偿,对房屋所有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的征收程序就没有完成;而征收没有完成,就不能进行拆迁。但《条例》第三章“拆迁补偿与安置”对房屋拆迁补偿作出的具体规定将补偿与对房屋的征收分开了,将补偿作为拆迁程序的一部分,这实质上就是将本应在征收阶段解决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这与上述《宪法》、《物权法》及《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存在抵触。

二、依据宪法和法律,征收、补偿主体应该是国家,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应该是行政法律关系;而《条例》却将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将拆迁补偿关系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

依据上述《宪法》第13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的规定,征收、补偿的主体都是国家,征收与补偿应该在同一阶段由国家来完成。但是,《条例》第4条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第13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22条第1款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可见,《条例》规定的补偿主体为“拆迁人”。而根据《条例》第4条第2款的规定,实施补偿的拆迁人是“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而不是代表国家实施征收的主体。

依据《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家依据公共利益需要,在依法补偿的前提下,对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实施征收。因此,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完全是行政法律关系,必须遵守依法行政的要求。但是,《条例》不仅把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而且,基于这样的定位,把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订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条例》第15条规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





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正是由于这些规定对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错误，致使一些地方政府在实际运作中只征收、不补偿，而把补偿这一核心问题和矛盾推到拆迁阶段，从而引发了大量的暴力拆迁、强制拆迁。可见，要解决当前拆迁引发的严重社会矛盾，必须废止或修改《条例》关于拆迁主体、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等与《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相抵触的上述条款。

三、依据宪法和法律，对单位、个人房屋进行拆迁，必须先依法对房屋进行征收，而《条例》却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依法征收的前提下就可给予拆迁人拆迁许可

依据上述《宪法》第13条、《物权法》第42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的明确规定，要对单位、个人合法所有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拆迁，首先必须要对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依法进行征收。

然而，《条例》并没有将房屋征收作为拆迁的前提。《条例》第7条规定：“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由此可见，拆迁人获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并不需要以政府已经完成对单位、个人合法拥有的房屋的征收为前提。换言之，在房屋仍然属于单位、个人合法所有的时候，拆迁人就可依据这些与征收程序毫无关联的文件，取得拆除房屋的资格。这是与《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相抵触的。

《条例》自2001年颁布施行起，历经八年，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其应有作用，但其原有框架已经不再适应宪法、法律以及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如上所述，《条例》与《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存在重大抵触，使得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无法得到有效落实，损害了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与尊严，成为引发大量拆迁冲突与矛盾、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因素之一。

为此，我们依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第87条、第88条之规定，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条例》存在的与“与上位法冲突”的问题进行审查。如确认《条例》有关条款确实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应依据《立法法》第88条予以撤销，或根据《立法法》第91条，由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自行修改。此外，我们也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我国城乡领域的征收、补偿、拆迁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在条件成熟时尽快出台土地征收（包括土地所有权征收与土地使用权征收）和房屋拆迁法，统一解决征收、拆迁的条件、程序、补偿、安置标准与争议裁决及救济机制的全盘法律问题。

此致
敬礼

建议人：

沈 岿，北京大学法学院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
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
钱明星，北京大学法学院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www.chinalawinfo.com 发布时间：2009年12月11日



法治论坛

我们为什么要建议人大常委会审查拆迁条例？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2 月 1 日，我和北大其他 4 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审查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建议。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助长了一些地方领导人违反科学发展观，过分依赖“卖地”和发展房地产业发展当地经济的发展思路、发展政策。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但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人却是以 GDP 为本，以建设高楼大厦、大马路、大广场和改变城市外在形象为本。老百姓的痛苦、老百姓的眼泪、老百姓以命相争、相抗、自杀、自焚，他们都看不到，听不见，他们对之无动于衷，野蛮拆迁中不断流淌出的血和泪丝毫不能感动他们，强制拆迁依旧，暴力拆迁依旧。这些同志对通过房地产业拉动当地经济可能走火入魔了，全然忘记了老百姓的需要和痛苦，全然忘记了以人为本。现在我们如果还不把支撑他们那种发展思路和发展政策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撤销或废除掉，他们将仍然不会猛醒，党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将仍然无法由文件、口号变成现实。

其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违反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第一要义是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是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不得参与相应事务的处理和裁决。而《条例》在处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这对明显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时，却授权拆迁人可自行拆迁被拆迁人的房屋或由拆迁人委托他人拆迁被拆迁人的房屋（第 10 条）。《条例》在处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有关补偿、安置的争议时，却授权给为拆迁人发放拆迁许可证的，与拆迁人显然存在利益关联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第 16 条）。由作为拆迁人的开发商去拆迁被拆迁人的房屋，由拆迁管理部门去裁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争议，被拆迁人还能企求公平正义吗？因此，我们如果要坚持社会主义，维护公平正义的话，就必须撤销或废止《条例》。

其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明文规定。这种“违反”在我们的建议书中已列举了三项（尽管实际不止三项）：（一）根据《宪法》第 13 条、《物权法》第 42 条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6 条的规定，补偿是征收的构成要件之一，未依法补偿，对房屋所有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征收程序就没有完成；而征收没有完成，就不能进行拆迁。但《条例》对房屋拆迁补偿作出的具体规定却将补偿与对房屋所有权的征收分开了，将补偿作为了拆迁程序的一部分，把本应在征收阶段解决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条例》第三章），从而明显与《宪法》、《物权法》和《房地产管理法》要求的“先征收补偿，后拆迁”的规定相抵触。（二）根据《宪法》第 13 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6 条的规定，征收、补偿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征收、补偿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必须遵守依法行政的要求。但是，《条例》却将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的法定义务转移给拆迁人（《条例》第 4、13、22 条），将国家（政府）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征收、补偿行政法律关系转变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三）根据《宪法》、《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上述规定，征收是拆迁的前提。但



是《条例》规定的拆迁人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前提条件中，却没要求拆迁人提供被拆迁人房屋所有权和相应土地使用权已被征收的证明材料的条件（《条例》第 7 条）。

其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构建和支撑的现行房屋拆迁制度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章总纲），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章第二条），但是，现行房屋拆迁制度和我们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所推动的一波接一波的拆迁运动是否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我们的很多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在扮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角色呢？也许一些领导人自己这么认为或这么宣称，但是很多老百姓却不这么认为。不要说一些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勾结，为了从房地产开发中谋取他们各自的最大利润而不择手段拆迁，老百姓不认同，就是某些官员真正是为了发展，为了改变城市形象而大力推进拆迁，老百姓也不认同，他们可能怀疑：你是否是在以老百姓的泪和血制造“政绩”而往上爬呢，因为他们看到、听到的那么多强制拆迁、野蛮拆迁的故事很容易使他们产生这种怀疑。因此，要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一定要改变现行做法，以赢得民心。

此外，《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构建和支撑的现行房屋拆迁制度也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司法的根本职能本应是裁决争议，保障法律的实施，维护公正。但《条例》却将裁决争议的职能赋予行政机关，而把强制执行的任务交给法院（《条例》第 15、16、17 条）：拆迁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或由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实践中，政府往往把法院当成“有关部门”之一，要求其参与政府组织的拆迁）。我们设想，让法院帮助开发商去拆当事人的房屋，搬当事人的东西，法院还能在当事人心目中留下公正的形象，这样的司法还能有权威吗？正因为如此，我曾在《行政强制法》立法征求意见过程中，多次建议《行政强制法》不要赋予法院强制执行实施权，而应授予法院强制执行裁决权和监督权（除非紧急情况，强制执行裁决权和监督权绝对不能赋予行政机关）。否则，公民的人权难以保障，国家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将毁于一旦。

其五，我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建议，除了上述考虑以外，还有一个动机，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推动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设计和确立的法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实际运作起来。现行宪法已经实施 27 年，《立法法》已经实施 9 年，但我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未审查和撤销过一个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难道我们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从来就没有过违宪、违法的情形吗？如果说我们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永不违宪、违法，那我们的《宪法》和《立法法》为什么还要设计和确立法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呢？长期以来，我们的《宪法》和《立法法》设计和确定的法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一直在“睡觉”，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这与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治国方略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没有违宪、违法审查，就没有对政府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制约，就没有人权保障。而没有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就没有宪政和法治。正因为如此，法学界多次试图通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审查建议而启动违宪、违法审查制度，但都没有成功（甚至没有收到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收到建议的半言片语的回复），我们这次申请是继续推进这种试图的努力，虽然我们成功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但如果我们不继续努力，就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来源：北大公法网 www.publiclaw.cn 发布时间：2009 年 12 月 10 日



征收·补偿·拆迁：各归其位

沈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毋庸置疑，土地和房屋的征收拆迁，是城市化的重要助推力之一。城市功能区的重新合理布局，旧城区、棚户区或危房的改造，新兴住宅小区、工业园区、商业区、科技区等的建设，公共交通、公用设施、公共绿地的改扩建，以及城市向农村渗透、农村日益城镇化等，都牵扯到土地或房屋的征收与拆迁。就整体而言，这些对于农村村民、城市居民的生活福祉改善是有利的。然而，为什么违法拆迁、暴力拆迁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在这片国土上，出现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以命相搏的惨烈事件？

个中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同事件自然有其背后不同的原因。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寻求“土地财政收入”的增长，急功近利地进行城市开发、发展，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率和 GDP 的增长，忽视社会公平，或许是最为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导致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在制度设计上偏向于拆迁、而不顾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区分，导致了拆迁人（尤其是追逐利润的开发商）通常会得到地方政府的眷顾，导致了个别事件中被拆迁人受到极端不公正的对待，也同样导致了一些被拆迁人激烈的对峙情绪。

乱极求治！现在已经到了理顺关系、重构制度、平衡发展的关键时刻了！

无公共利益则无征收

首先，政府本应是人民公器，本应一切行动以公共利益为准绳。虽然现代经济学揭示政府与普通人一样，都是经济理性人，但这即便是现实，也不能替代规范。所以，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才要求，国家（由政府来代表）只能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公民的私有财产。公共利益标尺的存在，意味着政府不能越过界河，为纯粹的商业利益，出面去征收公民财产。然而，直接关系到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在城市房屋拆迁领域具体落实的拆迁条例，却对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不加任何区分。这就在事实上造成，即便是房地产商开发商品房商业项目，也由政府对于用地上的公民房产进行征收。

必须承认，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利益）之间的界线，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出于商业利益的开发，可能会有公共利益的成分在内。例如，在美国，曾经有一个案例，底特律市拟迁走一个小镇的所有居民，目的是把土地转让给通用汽车公司。居民起诉到法院，认为这是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政府声称这样做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地方税收，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当时判决底特律市胜诉。尽管这个案子在 2004 年被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但在 2005 年的另外一个案件中，地方政府推行的包括一部分商业区开发在内的整体经济振兴项目，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9 个大法官 5:4 的微弱多数比例支持，动迁户的上诉被驳回。这些个案反映出公共利益判断的困难，但困难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放弃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辨别。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恰恰以公共利益难以界定为由、放弃了公共利益标准。

如果政府不能为私人利益去征收公民私有财产，那么，开发商应该怎么办呢？那就交给市场去处理。开发商就必需与被拆迁户就征收、补偿和拆迁问题进行一揽子谈判，谈不拢，自然也就是生意做不成。在法律上即是未达成民事协议。开发商或者放弃或者修改开发计划。唯有如此，方能做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无合理补偿则无征收



公共利益标准即便满足了,也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径直征收和拆迁了。依据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政府征收合法有效的另外一个前提是依法给予合理补偿。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可以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但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强取豪夺的合法理由。政府必须作为征收、补偿的主体,保障被征收人获得合理补偿。拆迁条例规定的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商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现实生活中,拆迁人有可能是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但也有可能就是开发商。这样的制度安排,无疑是把征收和补偿剥离,是政府失位、推卸责任,也是造成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冲突的原因之一。

政府不仅要管补偿,还要保证合理补偿。怎样的补偿标准是合适的?补偿主要有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无论哪种方式,原则上,都应当按房产的市场评估价来确定被拆迁房产的补偿金额。当然,市场评估价又以何种方式计算出,这个问题尚需认真研究,但是,应该计算房屋被拆迁时的市场价而不是房屋盖建之初的市场价。像上海闵行区潘蓉一家480平米的四层小楼,仅给予67万余元的补偿款。换位思考,任谁都不会接受的!

无征收、补偿则无拆迁

现在的拆迁条例,没有“征收”两字,也就是对如何规范政府征收权力,未予任何规定。不仅如此,它还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政府征收决定的情况下,就可以给予拆迁人拆迁许可。拆迁人得到许可的条件,就是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如此,在被拆迁人仍然拿着政府发放的产权证的同时,拆迁人却又拿到了政府发放的拆迁许可。被拆迁人注定要被拆,剩下的“权利”仅仅是与拆迁人谈如何补偿安置。这是极其荒唐的!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生效,即可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如上所述,征收与补偿应该是合为一体的,合法有效的征收决定必然含有征收什么、补偿什么的内容。而一旦这样的决定作出,原来的房屋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政府无论是自己拆迁,还是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允许开发商拆迁,都不是在拆迁原房屋所有权人的房屋了。简言之,拆迁是征收补偿决定的执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当然,如果是出于私人利益需要,开发商与房产所有权人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这时的拆迁不是建立在政府征收、补偿基础上,而是民事合同的履行。

无法院裁判则无强制拆迁

按照上述的制度安排,政府为公共利益需要在征收、补偿阶段即已解决许多问题,拆迁就不容易产生暴力、强制拆迁的问题。如果被征收人认为征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或者征收补偿不合理,与政府的意见不一致,那么,政府有权单方面作出决定,被征收人也有权就这个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是像拆迁条例规定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由政府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来裁决。在法院那里,政府就必须辩论公共利益到底体现在哪里、补偿又为什么是合理的。这种机制的存在,就是对政府权力的合理制约。

假如法院也认为政府的征收、补偿决定是合法合理的,认定被征收人是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从而作出支持政府的最终有效裁判,被征收人就应执行法院裁判,自动搬迁。再假如被征收人依然不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钉子户”,这时才会产生强制拆迁的需要。一方面,强制拆迁是对法院裁判的执行,另一方面,强制拆迁也应遵循文明拆迁的规则。诸如不得断水、断电、断热,不得骚扰正常休息,不得在节假日、休息日或者夜间拆迁,遭遇危及被征收人人身安全的时候应该首先采取保护人身的措施,等等。文明拆迁也需要强有力的手段,遇见强占房屋不走的人时,鉴于这些人已经构成拒不履行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力的裁判的情形,可以采取拘留措施。此时的拘留既是为了保证法院裁判的执行,也同时间接起到保护人身安全的作用。

无公平则无持续效率

可以想象,以上重新理顺关系的征收、补偿、拆迁制度,会使征收、拆迁工作的速度放慢,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发展构成不利影响。的确,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也有大幅的增强。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快速发展、追求效率的同时,我们其实在许多方面轻忽了社会公平问题。贫富悬殊拉大、城乡差别加剧、社会保障不足、官员腐败丛生、资本势力强横等等,都是社会不公平的具体体现。是的,我们的确把蛋糕做大了,但在分蛋糕上的不公平,导致了各种矛盾、冲突的滋生和蔓延。现在,我们该适当地放慢发展速度,考虑一下社会公平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强调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原因所在。若不能适时地平衡效率与公平,就会像注射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一样,身体的内伤不断加剧,直至有一天突然倒在跑道上。

来源:北大公法网 www.publiclaw.cn 发布时间:2009年12月11日

废止中国二十一世纪初最大的“恶法”——《拆迁条例》

师安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又一个孙志刚“诞生”了

谁都知道,“催灭”国务院“收容条例”的那个真实的孙志刚早已被“恶徒”借助“恶法”送离了人间。但是,令人震惊的是,被号称为中国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恶法”——《拆迁条例》近期却又催生了一位新的“孙志刚”——唐福珍。

唐福珍为了阻止暴力拆迁,将汽油泼到身上点火自焚。但她并没有阻止房子被拆,当天房子就成了一片废墟,被抢救十余天后的唐福珍也死了。唐福珍悲剧上演前,曾在上海发生了一位海归人士“潘蓉”夫妇的维权事件。两件拆迁事件中的主角都曾对“物权法”在维护其物权的功效方面寄予了厚望。例如潘蓉就曾说:“那天我们还看了《物权法》,我说那个《物权法》非常好,然后我们还深信一点,就是《物权法》都出来,那肯定是按照《物权法》……所以我们就很理直气壮的。”

但实际上,物权法从一出台起就注定要提前“失效”。笔者曾在一篇对物权法的评论中就指出,物权法实际上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法律。

中国的拆迁之战正在多处爆发。近日媒体即报道,多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建议撤销拆迁条例,或对条例进行修改;要求将强制拆迁的裁决权收归法院。国务院也做出了回应,准备修订拆迁条例。整个事件的处理“路径”好像又回到了孙志刚年代——人死了,是因为某部所谓的“法”造成的——激起了民愤——学者专家上书——然后赶快修改或废除。最后,立法者顺应了民意,一笔新的“政绩”产生了。

什么是“四硬一软”?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针对被拆迁人设计了四项强制性制度:第一是强制许可制度。在尚未征求被拆迁人意见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即可用《条例》所赋予的拆迁许可权向拆迁人发放拆迁许可证,此时被拆迁人的被强制拆迁的命运几乎已被注定;第二项是强制签约制度。拆迁人获得拆迁许可后,《条例》规定拆迁双方负有签约义务。不管被拆迁人是否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其有义务与政府或开发商签订拆迁协



议,意味着被拆迁人对自己的物权必须作出让与;第三项是强制裁决制度。由于补偿标准是拆迁协议的核心问题,标准过低几乎是所有拆迁项目的共同特征。被拆迁人往往在无法抗衡被拆的命运的情形下,退而寻求能获得较高的补偿,并籍拒绝签订拆迁协议以求自力救济,但《条例》规定,当达不成拆迁协议时,任何一方可申请拆迁行政管理部门裁决。现实中几乎均是开发商或是由政府组建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之类的组织请求强制裁决,裁决结果也几乎都是一律拆迁,补偿标准也难以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被拆迁人对裁决结果几乎都不服,但接着由第四项强制制度可保障将拆迁进程继续到底,因为《条例》规定拆迁人可申请行政强制或司法强制执行,通过司法或行政途径将被拆迁人强制迁出原居所地。除上述四项强制性的“硬”制度外,《条例》还规定了一项“软”制度,即补偿评估制度。受政府或开发商“雇佣”的评估机构根本无法将市场价格原则和重置价格原则充分地贯彻到拆迁评估事项中,被征收的物权人只能获得与实际市场价值相比严重“缩水”的补偿额。

通过上述“四硬一软”的立法制度设计,物权人对自己的物权其实是无力予以自主保护的,《条例》所赋予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由于四项强制性制度尤其是强制许可和强制裁决制度的设计而基本上丧失了司法价值。同时,评估软制度的存在使得被拆迁人在被迫拆房的情形下又无奈地接受了低值补偿。

悲剧的产生——立法根源是否存在?

笔者多次在有关法学文稿中提到,国务院的“拆迁条例”给物权人设置了上述“四硬一软”的拆迁制度,而在物权法颁布后,国务院并没有及时修订或废止有关强制拆迁制度,导致在拆迁事件中被拆迁的一方往往手持全国人大的“物权法”,而开发商和政府则高举国务院的“拆迁条例”,双方都说是“依法”办事。最终,“大法”一般是管不了“小法”的,“不长牙”的物权法通常都会在“武装到牙齿”的拆迁条例面前败下阵来。

由于物权法没有对“征收制度”进行细致的规范,只有概括性立法法条,那条看起来光鲜的“物权法定”原则似乎并不能保护物权,因为公民的物权“消灭”制度——“拆迁”似乎往往不遵守法定原则,故在大陆现实的征收法律领域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是国务院的《拆迁条例》。

客观地讲,拆迁制度之所以在大陆地区受到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对和法学专家的普遍质疑,真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该项行政立法在设定拆迁制度时对什么是公共利益已经放弃了立法判断,而直接用强制许可制度、强制签约制度、强制裁决制度和强制执行制度来剥夺物权人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按照国务院现在的拆迁条例的立法精神,无论所涉及的拆迁是否是为了公共利益,无论被拆迁的物权主体是否同意将自己的物权转让于开发商或政府,只要政府给拆迁人颁发了拆迁许可并由政府发出拆迁公告的,则无论物权主体有什么理由,都无法拒绝被拆迁的命运。

国务院的立法滞后甚至立法价值观方面的某类不“与时俱进”的状态,无疑助长了强拆的执法动力。虽然,某一件具体的拆迁悲剧案例可能存在其他的直接性因素,但我们不能不反思立法方面存在的深层次的消极因素。

以上可见,拆迁之所以纠纷不断,主要的根源在于国务院行政立法的缺陷。中央政府的该项立法将房屋所有权人对自己的房地产到底是“拆”或是“不拆”的自主处分决定权完全剥夺,从而实质性地架空了物权法。也即一旦拆迁许可和拆迁公告发出,房产权人只能接受与拆迁人之间的“强制交易”。因此,只有通过物权立法将商业拆迁真正私法化,使得拆迁不再是强买强卖而成为自主自愿的物权让与活动时,才能真正消除恶性拆迁纠纷事件的发生,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此类上访事件发生的总根源。

国旗、宪法、物权法与拆迁条例的博弈





早在2007年,在重庆发生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作为自己维权护身符并号称对抗政府与开发商野蛮拆迁的“中国最牛钉子户”事件,就以实证的方式反映了大陆物权征收制度的弊端。笔者认为,在物权法已生效的情形下,国务院的拆迁条例要么应废止执行,要么必须从根本原则上进行大幅度的修正而不是零星的修补,以符合物权法关于征收制度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立法原则。

更早以前的湖南“嘉禾拆迁”事件,近日最新版的“贵阳强制拆迁”事件。许多被拆迁方的维权行为都被政府或司法机关定性为“暴力抗法”事件,而被“抗”的“法”一般就是这个具有无比强大效力的——拆迁条例。

有的人难以理解,为什么手持宪法、身披国旗、高举物权法仍然对抗不了这个“拆迁条例”?这就是行政机关在事实上享有“选择性执法”的特权,法律虽然没有赋予政府有选择性执法的特权,但既然“选择”了也没有什么法律后果,更没有选民“用选票说话”的政治后果,那当然要选择自己比较“中意”的法律了。比起物权法来,拆迁条例更中意一些,所以……。

难道“法院”就能靠得住?

据报道,潘蓉夫妇已经回到新西兰,虽然新西兰的领事馆也很关注潘蓉强拆事件,但“海归”再次“海逃”,也只能是无奈的选择。

有人把限制或消灭悲剧性强拆事件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大陆的法院身上。但实话实说,我对认为中国大陆的法院根本“靠不住”;如果这句话有点儿极端的话,那么,我把我的观点修正为“在多数情况下是靠不住的”,因为几十年前鲁迅曾说过“我想来不惮于用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中国大陆的法院难逃此“谶”。

无论是国内或海外投资者,在寻求法律保护的有效途径方面很难在法院得到有效保护。因为大陆地区设置的执法格局是行政权绝对强势,而司法权是相对弱势的公权机关。甚至司法权往往沦为行政权的辅助性权利,成为对付诸如征收制度下的弱势群体的“帮凶”。从制度上看,这种责任主要不在法院本身。由于在政治上和法院领导人的任免上大陆的司法部门必须由同级或上级党委决定,在财政经费上大陆法院要受到政府和人大预算的控制,在普通法官的任免上由于大陆地区的法官制度不实行“法官职务终身制”和“非过失不得免职”的机制的保护,而是要在每年的人大会议上或任何一次会议上均可能被要求进行述职审查,故在具体裁判事务上“人大”的很多工作部门诸如法工委往往在客观上有干扰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可能性。因此,在中国大陆地区无论是法院或是法官本人均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司法权利。法院的工作必须要围绕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展开,要为党和政府的执政行为保驾护航,这些中国大陆特色的司法权格局在民众利益与政府利益处于对立或冲突时,对公民一方作出有力保护的可能性将大为降低。从人类现代发展的现有历史经验来看,凡不能受到司法权独立保护的所谓的“公民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在关键时刻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近一年来,许多法学专家甚至是重量级司法官员在孜孜以求地论证着最高人民法院将“三个至上”原则与司法权本身进行“统一”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如果在现实中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统一的程度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但在现实法律生活中,却的确存在着“公共利益”的法律判断与“群众利益”完全冲突的大量实证性案例。不知在“虚假”公共利益面前,“法律至上”的原则与“群众利益至上”的原则如何进行高难度的统一?

暂时,就这么地吧!



话又说回来，我们不靠法院又能靠谁呢？正因为法院比政府“弱势”一点儿，所以对拆迁可能用司法裁决的方式比行政裁决相对更讲理一些，执法手段或许更柔和一些，执法程序也许会更讲究一些。因此，我相信，靠法院比靠政府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靠谱。

如果因为唐福珍的死，能够埋葬一部恶法——拆迁条例，那么，似乎我们这些潜在的被拆迁人都应当“感谢”唐福珍的“死”。只是这种总是以鲜血和人命为代价的立法进步太“残忍”了。

下一个“孙志刚”又会是谁呢？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www.chinalawinfo.com 发布时间：2009 年 12 月 14 日

《物权法》激发企业生存新生态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学习法律要掌握三个层次的东西：第一个是人文精神，第二个是制度理性，第三个是实践智慧。今天我就从制度理性的角度，谈谈《物权法》对企业环境的影响，包括企业的生存环境、投资环境和融资环境。

保证企业生存环境

《物权法》的起草过程有三个数字：一个数字是 13，《物权法》的起草过程历时 13 年；第二个数字是 7，经过人大常委会七次审议；还有一个数字也是 7，法律通过以后七天，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这部法律，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见，我们高层领导对这部法律是何等的重视！胡锦涛同志讲到：制定和实施《物权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对于坚持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胡锦涛同志特别提到了一个“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呢？也就是《物权法》第 3 条规定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实际上是澄清了十七大以后的中国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还是倒退的问题。

同时，在《物权法》里面有一个平等保护的原则。平等保护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保护弱势群体，因为弱势群体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益。而需要保护的恰恰是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我们的中小企业。

另外，关于所有权的三分法，在这次《物权法》中也体现出了我们起草者的政治智慧，所有权分为国有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这种分法也是前所未有的。惟一的先例就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他们这样区分的目的是要突出国家所有权的优越地位。我们的《物权法》写了三种所有权，但是并没有规定国家所有权优先保护。而是在所有权平等的前提下，对三种不同所有权的一些特殊问题作了一些特别规定。比如，对专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做了规定：矿藏、河流、自然资源等，是属于国家所有的。集体所有权则突出规定了一个集体内部成员集体决策的机制。在所有权三分法上还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就是《物权法》第 68 条明确规定：企业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处理的权利。

《物权法》澄清了十七大以后的中国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倒退的问题。

《物权法》也回应了一些人在《物权法》起草过程当中的一些指责，说《物权法》“保护”的是“国有资产流失”，这就是第 57 条的一个原则性说法：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机构应该依法加强对国有资产管理、监督，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损失，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就是管住自己的人,要卖的时候,也有一套审批程序,一旦卖出去了,要打板子也是打自己内部人员。所以,企业改制不能后退,除非你能证明收购方和出售方之间有《民法》和《合同法》通则规定的恶意串通,才可以撤销,否则就维持现状。

改变企业投资环境

《物权法》有一个投资自由的规定:国家、集体和私人依法可以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企业。这就等于把投资自由写进了《物权法》,也就是把这个基本的权利利用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还有一个土地征收的问题跟在座的有些企业有关系,搞房地产也好,哪怕是工业企业,如果你要扩大再生产,就要有新的投资,要有新的场所,就可能涉及到城市拆迁和农村征地的问题。而物权法明确规定了城市拆迁不叫拆迁关系了,叫什么呢?叫征收关系。征收是什么呢?征收就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取得公民或者法人的财产所有权。它区别于征用,征用是强制性的取得使用权,用后还要归还,征收就是剥夺所有权。

《物权法》42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征收的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公共利益,第二是正当程序。”也就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合理补偿”。在第三款里面讲征收集体土地的时候,应该给予依法足额的费用,还要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涉及到房屋拆迁的时候,除了拆迁补偿以外,还要保障被征收人的住房。今后拆迁就不是拆迁单位对个人的关系,而是国家政府对被征收人的关系。现在国务院正在制定不动产征收相关条例,要进一步规范政府的征收行为。

在《物权法》28条还明确规定:如果政府征收决定一旦生效,公民或者是企业所有权就自行消灭了。这一条是一个杀手锏,这也可以解决钉子户的问题,就是政府拆迁令一旦生效,房子就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不能再当钉子户了,因为被征收了,就不叫私人财产了。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当然,实际的结果就是现在按照《物权法》的规定,私人的房屋和土地的征收补偿门槛提高了,除了给钱以外,还要保障他的居住,农民还要管他的社保。

《物权法》还有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开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虽然目前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高层决策者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考虑,相信在适当的时候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因此在《物权法》里面的151条,就写了一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流转,由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法律规定。

关于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方式、取得方式这个问题目前还是保留着双轨制,所谓双轨制就是划拨和出让两种形式。但是这次明确规定了一方面就是出让的土地要采用招标、拍卖、公开竞价的方式,而且明确规定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为经营型用地。基础设施、国防、教育、公共卫生等用地叫做公益性的用地,公益性用地可以采取,但不是一定采取划拨方式。经营性的用地只能采取出让方式,严格限制划拨土地。

土地权利流转这次也予以肯定了,对转让、出资、证明、抵押没有限制,流转自由。另外,对提前收回也有限制,提前收回的话,必须是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提前收回,而且必须对土地上的房屋和不动产给予补偿,退还相应的出让金。对于到期以后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规定,第149条第二款只是规定公民住宅建设用地自动延期,没有说企业建设用地自动延期,还需要以后进一步立法确定。

改善企业融资环境

《物权法》对担保物权的制度有九大改进:第一是扩大了可适用性,与担保财产挂钩。在以往的金融交易中,除了保证担保以外,主要靠物保,一个就是抵押、一个是质押,这制约了企业的融资规模。而《物





权法》增加了一些可用于担保的财产的范围，建造中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可以抵押。还有浮动抵押，浮动抵押就是库存产品、原材料、半成品、设备这些东西。还有基金份额和应收账款的抵押，这是比较新的，特别是对一些服务型的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比较少，但是有比较好的现金流，就可以用应收账款抵押，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债权，就是已经发生的债权，即应收债权；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未来可以获得的现金收益，比较典型的就高速公路收费权的质押，但规定必须有一个专有账户，收入必须要打进这个账户，一旦发生不能清偿债务或者是其他条件的时候，债权人可以马上优先用这个账户上的钱来清偿债务。

第二是增加了担保物权的实现条件。以前是债务人期满不履行的时候可以进行实现，现在银行设定了一些条件，比如：不按照用途使用贷款，有时候是没有按期报告财务情况，披露信息，或者信息披露中有虚假，甚至回溯到贷款当时有欺诈行为。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银行都可以提前收贷。所以，企业贷款的时候也要注意，要更加诚信。

第三是理顺了物担保和人担保的关系；第四是简化了抵押权的实现程序；第五是集合了合同效率和物权效率；第六是完善了最高额抵押的规则；第七是规定了抵押权的存续区间；第八是规定了留置权和其他权的授权顺序；第九是规定了留置权的适用范围。

《物权法》，只是一个开始

总的趋势，《物权法》顺应了金融经济对物权的要求，因为现在有相当一部分质押物不是有形物，而是无形的权利和财产，今后企业无形财产的含量会越来越高，这是全世界普遍的趋势。无形财产的保护和无形财产抵押的规则也会加紧制定。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时期的实物经济了，过去经济流转的产品都是实物产品，要么是粮食、牲畜或者是工业产品，现在除了实物经济以外，还有知识经济，还有金融经济。现在我们的产业的关系，如果说 19 世纪的银行家是工业家的账房先生，那么今天的工业家就不过是银行的打工仔。也就是说，企业对金融的依赖度非常高，现在很难见到一个跟银行不发生关系的企业，个体户开一个小饭馆可能也要向银行贷款，都要牵涉到金融经济杠杆，而金融经济这个循环链是非常复杂的，欺诈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我们希望有机会下一步通过立法完善这方面的管理规定，《物权法》是提供了一个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面还有很多具体问题要通过进一步的立法加以完善。

因此，我们真正讲中国的《物权法》，绝不是指这一部法律，而是以这部法律为基础的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构成的一个庞大的涉及到财产权的规则体系，还需要一个前进中的发展过程。欢迎大家今后根据你们企业的需求，就未来的财产权保护，财产流转遇到的问题，随时和我们沟通，我们共同推进中国《物权法》体系的发展。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www.civillaw.com.cn 发布时间：2009 年 12 月 13 日

原载于《中外管理》2008 年第 1 期

法学教育

法学教育应该追求怎样的“国际化”

万猛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院长

对于一个以国际化为发展战略的法学院而言，其培养目标应该是定位清晰的，就是要培养合格的跨国法律人才，而不是培养主要使用本土法律资源、服务于本土市场的法律人才





时下,“国际化”不仅是一个时髦的名词,而且已经成为各种活动和发展战略的热门标签。然而,深入分析这些现象,其实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在这个貌似热热闹闹的“国际化”现象背后,往往缺乏深入而脚踏实地的、真正的努力。

真诚地追求“国际化”

中国正面临迫在眉睫的跨国法律服务竞争:目前已经有177家外国律师事务所的驻华办事处(2008年数字)获准在中国大陆开展业务。这些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大陆所创造的效益早在2000年就已经超过了1.5亿元人民币。而中国高速膨胀而又高度单一化、本土化、高度理论化的法学教育无法培养合格的“国际化”人才,导致能够从事高端跨国法律服务的人才仍然处于稀缺状态。

根据统计,目前中国各类律师事务所中能承担国际性法律服务的律师不足4000人,在中国范围内有能力承揽涉外业务并占其业务量50%以上的律师事务所还不足100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跨国法律交往能力、跨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占有率无法得到实质提升,常此以往,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有责任、有担当,才能主动地参与“国际化”、全球化,否则只能是被“国际化”、被“边缘化”。

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感,对从事过多年跨国法律工作的笔者而言,更是有着切身的体会。也正是在这样的研判之下,2001年才开始起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教育能够坚定地在法学院数量众多、法科学生“如过江之鲫”的情况下,大胆地走下去。

扎实地推进“国际化”

法学教育的“国际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国际化”。二是法学教育内容的“国际化”。三是法学教育合作的“国际化”。这是一个综合立体的工程,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目标努力。

对于一个以“国际化”为发展战略的法学院而言,其培养目标应该是定位清晰,培养合格的跨国法律人才,而不是培养主要使用本土法律资源、服务于本土市场的法律人才。

北外法学院开办伊始就定位为培养跨国型的法律人才。而绝大部分跨国型的法律人才是从实践工作的同时具有很强的语言能力和适应能力。最终我们将北外法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复合型、实践型和跨国型的法律人才。

北外法学院课程体系是以实践需要为参照,本着为特型人才量身定做的态度设计的。过硬的外语能力是跨国法律人才的基础技能,我们依托北外的传统外语教学优势,与英语专业教学力量进行了多年磨合,在本科阶段实行外语和法学的双学位教育。本科低年级加强外语基础应用能力、高年级增加专业内容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如高级法律翻译和写作等。加上全英课程和双语课程,学生的英语能力突出,毕业生英语水平相当于甚至超过英语专业的学生。

在法学本科专业课程设计上,在兼顾教育部的核心课程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基本上由本国法、国际法、比较法和外国法(主要是英美法)为基本构架。国际法系列课程和比较法课程双语授课,外国法课程由外国专家全英文授课,其他课程至少提供英语对照关键词和英文阅读材料。

另外在课程中,提倡实践性教学和案例教学,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院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和硕士毕业论文的外文资料在文献中的总比率要达到一定水平。对于研究生在本校就读期间,许可其在修





完一定学分后出国留学攻读 LLM，毕业时获得中外双学位。这些推动灵活的安排，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

在推进“国际化”交流过程中，北外法学院的对外交流频繁，但注重实际效果，比如北外法学院和美国德保罗大学法学院(De Paul University Law School)的合作已经持续了 8 年，德保罗每年接受两位北外教师或研究生赴美为期 10 个月的交流；每年定期举行国际会议；每年定期举行中国法和美国法的暑期交流活动，中美学生共同上课，共同讨论；目前正在准备启动互相承认学分的交换学生项目。

理性地对待“国际化”

法学教育的“国际化”顺应了法学教育发展的潮流，但是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终极的追求。“国际化”更需要依托本土资源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学教育水平和科研能力。

北外法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有一半左右都会出国继续深造，但北外法学院不想仅仅成为国外法学院的“留学预备校”。因此，我们在本科阶段就加入如何用英文表述中国法律的内容。我们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中国法律制度和文化的传播者。同时北外也在积极开发针对外国学生、为期半年左右的英文中国法课程，让外国法科学生有机会系统地了解中国法律制度的机会。

“国际化”战略能够培养出更多合格的跨国法律人才，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学院都具备发展“国际化”战略的条件和优势。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终将会失之盲目。

除了超大型法学院，如北大、清华、人大、武大、吉大等少数法学院，其他法学院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才能办出特色、吸引更多的人才和生源。而像北外这样的外语类院校，有着强大的外语教学与研究能力，良好的语言环境和“国际化”氛围。北外就像一个小联合国，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操各种语言的外教和留学生，各国使馆的活动频繁在这里举行。这种氛围非常适合“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只要能很好地设计课程，很好地实施专业教学，法科学生的外语外交能力就会通过耳熏目染得到提高。

在北外法学办学的过程是在外界的怀疑中小心翼翼地走过来的，在探索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波折，目前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办学成本过高等问题，而且未来还会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但是，点滴的努力会汇聚成江海，经由“国际化”发展之路，中国法学教育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来源：法制网 www.legaldaily.com.cn 发布时间：2009 年 11 月 19 日





S I F T	<i>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i>	本期要目 ●中国高教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地方本科院校定位与特征研究 ●高教改革需要大手笔 ●“新版大学排行榜”引发关注 ●多维度审视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理念 ●中国青年真的连提问都不会吗 ●美国高校管理模式的新趋向
高教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9年12月	第8期[总第32期]	

要闻 要事

中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教授12月1日在江苏盐城市召开的全国新建本科院校联席会议暨第九次工作研讨会上作出这一论断。

周远清教授用“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九个字总结中国高等教育建设，他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经过思想、观念、机制等改革取得长足的发展，教育质量显著提高。

在谈到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时，周远清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的建设应遵从“开放是方法，改革是关键，质量是中心，理念是先导”的原则。“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他表示，中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首先，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向高教强国的方向发展，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此尤为重视，曾多次强调要通过高等教育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已先后投入600万元进行13个相关课题的研究。其次，新的教育规划纲要中教育目标实现年限为2020年。2020年对于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是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的一年，因此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20年，也是中国教育快速发展的20年。

周远清教授还提出了应该将怎样的高等教育带入小康生活的问题，他认为应有四大特点：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素质；更加接近高教强国的高等教育；能够培养出一批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力的科学家、教育家等高端人才；高等教育能够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作者：于从文 丁建军 来源：中新网2009年12月1日



做强地方本科院校

——地方本科院校的定位与特征研究

摘要：地方本科院校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是本科教育的重要基地。根据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历史、办学规模、办学类型、办学布局、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应定位于应用型，其主要任务是面向地方服务，培养大批应用型专门人才。





关键词: 地方本科院校, 定位, 特征, 应用型人才

据统计, 截止到2009年4月, 我国普通本科院校770所[1], 加上独立学院322所, 共1092所, 其中地方本科院校约占90%。这些地方本科院校, 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 成为本科教育发展的重要基地。因此, 研究和探索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不仅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课题, 也是应用型本科教育错位发展、办出特色的重大实践课题。

地方本科院校不同于传统的学术型大学, 也有别于职业技术学院, 它实现了高等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的结合。从人才培养上, 它注重全方位的社会需求; 从专业设置上, 它能够更广泛地与实际工作、生活紧密结合, 并具备灵活的反应和变化能力; 从课程教学上, 要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和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现阶段建设地方本科院校, 需要树立创新性的办学理念, 建立以产学研合作为基础的学校发展模式, 编制应用性教学计划与课程教材, 加强具有应用能力的教师队伍建设, 建立适切的评价指标体系, 开展应用性的科学研究和以“应用性教育”为主旨的教育科学研究。

一、地方本科院校的定位

地方本科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 也是本科教育的主体。根据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历史、办学规模、办学类型、办学布局、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我们认为, 地方本科院校的定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 目标定位

发展目标是大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它对学校的办学思想、总体发展方向、思路、运行模式、工作重心、培养目标等具有导向作用。科学制定发展目标, 是大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目标的制定, 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办学特色、办学质量和效益之上, 要紧紧围绕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进行; 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自身的特色, 提升整体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如果抛开市场的需求, 不顾自身的办学特色与优势去定位自己的发展目标, 其结果只能是背道而驰。

(二) 服务面向定位

服务面向是指高校在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时所涵盖的地理区域或行业范围。从地方本科院校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 分布在省会和地级市的高校基本上各占一半。地方本科院校的主要职能是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2]。地方本科院校应遵循服务地方的原则, 坚持以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要的服务方向, 根据地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征建设学科、设置专业, 成为地方的人才培养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地方院校, 必然要主动服务于地方和区域经济, 这些都是区域或行业经济发展对地方本科院校的客观要求, 也是学校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从地方本科院校目前的自我定位看, 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定位于所在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由于地方本科院校在管理体制上属于所在的省(直辖市、自治区), 招生上也以省内招收为主, 学生毕业后多数留在省内就业。因此, 很多高校在人才培养的区域定位上也主要是立足所在的省。如长春大学的区域定位是“立足吉林、服务吉林、面向全国”。

2. 定位于所在的地级市。这类院校在生源上以市内生源为主。如莆田学院的区域定位是“立足莆田、面向全省、放眼全国”, 江汉大学的区域定位是“立足武汉、面向省内外”。

3. 定位于高校所在的大区域。大区域是指我国的6大行政区: 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这种行政区划已经超出了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范围, 扩大到周边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大连工业大学的区域定位是“成为东北地区消费产业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研发中心”, 西安邮电学院的区域定位是“成为西北地区信息产业高级专门人才重要的培养基地”。





4. 定位于行业。这类院校培养的人才主要针对某几个行业或领域。上海体育学院的定位是“立足体育、依托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上海政法学院的定位是“立足政法、服务上海、面向全国”。

（三）学科专业定位

地方本科院校的主要任务在于实施应用性本科教育，培养大量应用型人才，因此，必须加强学科专业建设，要深入分析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调整专业或专业方向，及时增设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性专业，为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各种应用型人才。

应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方面进行突破，形成特色和品牌，不盲目追求高、大、全，及时增设市场急需的应用性专业，以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更要密切关注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设置多学科复合型专业，以适应社会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要[3]。

（四）人才培养定位

人才培养定位是根据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定位，也就是说要培养哪一类型的人才。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最根本的任务。从一些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来看，并没有明确要培养哪一类型的人才，只是用一些概括性的词对要培养的人才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做了描述。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有创新精神”，“有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高级专门人才”，“有理想、有知识、会做事”，“知识结构优、实践能力强、敬业精神强、创新创业意识强”，等等。

还有一部分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定位不准，过分重视学术型人才，而轻视应用型人才。这种重学术轻应用、重理论轻实践的人才取向，不利于我国高等学校的分类发展和多样化人才的培养。地方本科院校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要阵地，其人才培养应既有别于传统本科院校培养的学术型人才，又有别于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地方本科院校培养的是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他们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具有鲜明的特点，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并有较强的科技运用、推广、转换能力等。

通过实际调研，我们认为地方本科院校应主要办成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应走出传统的“精英教育”办学理念和“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开展应用性教育，培养面向地方、服务基层的本科层次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地方本科院校不过分要求知识的深厚，而是着重要求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最佳结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大批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同时，当前地方本科院校应安于本科层次人才的培养，而不急于大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面向区域和行业经济的发展，积极开展应用技术开发研究，发展应用技术产业，努力形成产学研良性互动局面。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格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确立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加强应用性的学科专业建设，发挥优势，形成特色。

（五）教学定位

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校的人才培养规格、层次和类型，有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地方本科院校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院校，必须努力构建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及实践教学，突出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这是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选择。因此，必须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运行机制。建立与完善校内实训中心和校外实训基地，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使其成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练，获取实践经验，形成应用能力的基地。紧密依托行业、企业，通过校企联合、校地合作，培养学生实践能力，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改进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如开展课堂模拟教学，进行职前实战训练；开展实践教学，教师在实践活动中教，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学，教师边讲边做，学生边学边干。

地方本科院校应重视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上的重要作用，采取多种方案，形成完整的、有效的实践教学体系，突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确实体现应用性特色。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学模式，要由理





论主导型向理论与能力并重型转变；教学内容要根据市场需要，反映本学科应用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和岗位前沿要求；教学方法要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以学生为主体；教学手段要多样化，充分利用当地资源，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加强校企合作、校地合作。

（六）科学研究定位

地方本科院校的科学研究以社会需求为动力，为区域或地方经济发展和行业需求服务，要坚持面向当地经济建设，要紧密结合学校教学与人才培养定位展开。

地方本科院校的科学研究，从性质、内容、对象、方法、要求、目的和意义等方面，都与传统的学术型大学的科学研究有所不同。地方本科院校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的开发研究，而非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其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的，是围绕着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展开的。同时也是直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主要基于对高深学问的追求。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应用型不是层次的高低，而是类型的不同。因此，各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要立足于各自层次和类型争创一流，切忌盲目攀高与急功近利[4]。

二、地方本科院校定位的理论分析

（一）地方本科院校定位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作为理论研究逻辑结构的起始范畴，有助于厘清理论体系的基本脉络，进而确定学科的研究范畴。

首先，从高等教育的性质来看，“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教育，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为目标”[5]。专业性教育代表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属性和本质特点。由于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类型是多样的，因而，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性教育，既可以是学科型专业教育，也可以是应用型专业教育。大批地方本科院校根据自己适应的面向，理应定位于应用型。

其次，从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来看，虽然专业性和学术性均是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属性，“高深的专门知识是研究高等教育一切问题、一切现象的逻辑起点”；但就应用型专业教育与学科型专业教育错位发展的价值取向而言，学科型专业教育强调基础性、广博性、学术性和非职业性；应用型专业性教育则强调专门性、针对性、实践性和行业性，在这方面地方本科院校更具优势。

第三，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随着社会专业分工的细化和职业的演变，“专业性应用教育”应是相伴培养专门职业人才的专业性教育机构而较早形成的历史概念。从西周时期的“辟雍”，到古希腊的“阿卡德米学园”，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到中世纪波隆那大学的建立，皆是为社会培养官宦、辩士、医生、法官和牧师的专业应用性教育。

从中世纪的大学到近现代的高等专门学院及我国的京师大学堂，高等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但是“学以致用”，“基于应用、讲求实务”，广育专业性应用人才，一直是她主要的职能。如今，随着经济与科技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弥补现有高等教育体系在人才培养和专业分布方面的不足与缺陷，保证人才培养结构的均衡和增强国家竞争力，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高等专业学院或多科技术学院，这些专业性学院与综合大学并存与互补，共同构成高等教育体系的两大支柱，呈现出普通高等教育向专业应用型发展的基本走势。

（二）地方本科院校定位的理论依据

地方本科院校指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或省市共建的体制框架下的地方普通本科院校。

1.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理论。按照国际教育分类标准，我们提出三分法理论，认为地方本科院校的定位可有三种类型选择：一是高水平职业性技术型本科（5B），但目前因现行制度的制约发展还欠成熟；二是应用型本科院校（5A2）；三是不排除个别地方高校定位于学术性研究型大学（5A1）。

根据我国的实际，我们认为，我国现有的地方本科院校主要应定位为 5A2 类型，也就是介于研究型大学（5A1）和职业型院校（5B）之间的第二类型的应用型本科院校（5A2），而不是学术性研究型大学。





2. “职业带”人才结构理论。“职业带”理论把培养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这三个系列人才的教育,相应地称为“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工程教育”。地方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主要指向职业带中的技术员与工程师的交叉区域,它所从事的是技术教育与工程教育在本科教育层次上交叉部分的应用型教育(而非学科教育),主要培养能适应高科技应用和智能化控制与管理一线工作的本科层次的技术工程师、技术师、经济师、经理等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3. 产业集群与专业化分工理论。现代产业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化分工的日益深化。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集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专业化分工是促进产业集群和规模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集群和规模经济的形成正是专业化分工的产物,是人们为降低专业化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和获取报酬递增的一种产业组织形式。“报酬递增的原因不是规模经济,而是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

产业结构乃至教育结构更新是区域竞争力向高梯度发展的根本动力。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集群的发展,必然要求高等教育专业化分工更加明晰、分类更趋合理,并通过专业性的人力资本生成扩展机制,发挥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成为增强产业集群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永不枯竭的源泉。

从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源看,我们缺少的是应用型人才,而几乎所有的本科院校都在培养“划一”的学术型人才,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成为空缺,这为广大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地方本科院校的特征

地方本科院校不同于研究型、职业型院校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它结合学科和行业分设专业,培养面向社会一线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其面向上以行业性为主导,性质上以专业性为主线,类型上以应用型为主体,层次上以本科为主流,模式上以实践性为主载,突出强调专门性、针对性、实践性和行业性。

(一) 地方本科院校应以“区域或行业”为主导

由于地方本科院校在管理体制上属于所在地方政府,在服务面向上主要定位于省(直辖市、自治区)、地级市,其生源以当地为主,学生毕业后多数留在本地就业,服务于地方特定行业。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应当从自身所处的区位差异、地域特色和行业发展的特定结构特定背景出发,对办学目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科学地、恰当地、实事求是地定位,而不能脱离本地区的行业发展实际,不顾学校自身的综合实力,盲目追求高层次、高水平、高指标。

地方本科院校必须明确“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建立主动适应地方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一方面要坚持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另一方面要尽力以地方为依托,不断拓展学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地方本科院校只有充分适应地方行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需要,紧密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特性和行业需求来确定办学方向,才能使其培养的人才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并切实担负起对地方优势行业和支柱产业的重要支撑作用,实现高等教育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 地方本科院校应以“专业”为主线

地方本科院校的专业内涵与专业结构既强调较强的专业应用性,又具备适度宽厚的学科基础;既有突出行业背景的应用性专业作为坚实平台,又有一定学科背景的宽口径专业或体现应用特征的主干学科和相关学科作为有力支撑。因此,地方本科院校一方面必须注重专业结构优化,对基础学科专业应当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应用性方向的改造,对产业技术含量高的通用性专业应加强宽口径整合和专业群建设,对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专业性应用人才的交叉型专业应优先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地方产业升级和支柱产业具有人才支撑、技术支撑重要作用的应用性专业应重点加强建设,倾力打造成优势专业和特色专业;另一方面,地方本科院校必须按照“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总体要求,构建独具特色的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着力促进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整体改革。

(三) 地方本科院校应以“应用”为主体

在高等教育多样化和大众化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应发展成应用型的院校。





如前所述,专业性代表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属性,而高等教育既可以是侧重学科性的专业性教育,也可以是侧重应用性的专业性教育,两者存在着职能属性与培养方向事实上的差异,学科性的专业性教育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为标志,应用性的专业性教育以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标志;地方本科院校主要定位于应用型,这种教育与侧重学科性研究的普通大学教育同型异质。因此,其教育类型定位应以专业性为特征、以应用型为主体。

(四) 地方本科院校应以“教学”为中心

高等教育的职能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如果说研究型大学以科研作为其凸显特征,那么,地方本科院校立足于自身定位特征,以地方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则更加强调教学职能的实现。可以说,教学是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中心。

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特征:既强调知识结构的基础性和综合性,又强调能力素质的实践性和综合性;既强调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又强调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还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

另外,地方本科院校还应重视学科建设和科研。大学是以学科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学术组织,学科是承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基础,是地方本科院校提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水平、开发专业建设优质资源的重要基础,是增强学校核心竞争力、形成办学实力的标志。地方本科院校也应切实开展一定的应用性研究和科技服务,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五) 地方本科院校应以“实践”为载体

地方本科院校与学术型大学错位发展的关键,在于其重视和强调实践性教学的优势。地方本科院校承担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其主要载体或途径在于加强实践性教学。地方本科院校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必须加大实践性教学的比重,强化实验课教学、实习与实训教学、课程设计或社会实践、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等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实践性教学系统严格的训练,加强与工作体系、工作过程的对接性,以提高人才的专业应用能力、开发设计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综合职业素养,切实增强人才培养的专业应用性核心竞争力。

实践性教学的重要途径是产学研合作。我们认为,产学研合作的深层次意义在于:它不仅是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而且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其中“学”主要是传承知识,“研”主要是创新知识,“产”主要是应用知识,三者本质上都是知识运行的活动形式,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内在本质联系[6]。产学研结合重在发挥实践性教学的主导性,将应用型人才培养计划与行业企业的用人标准实现融通对接,以合作教育为切入点,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点,有针对性地培养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

做强地方本科院校需要一个长期建设的过程,要在明确办学定位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探讨解决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产学研合作、教材、教师队伍及评价指标体系等关键环节的问题,使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型教育落到实处,并真正由大到强,从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由大到强。

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重大项目(08QG010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教育学重点课题“遵循科学发展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之十一:做强地方本科院校”(AGA080340)课题组阶段研究成果。

(课题组负责人:厦门大学教授 潘懋元;执笔: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副教授 车如山)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2009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本科院校名单 [N]. 中国教育报, 2009-04-22.





- [2] 朱科蓉. 应用型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及其提升策略 [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6 (04).
- [3] 朱科蓉. 应用型大学开展院校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对策 [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5 (04).
- [4] 潘懋元. 探索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应用型本科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J]. 教育发展研究, 2007 (7/8).
- [5] 潘懋元. 新编高等教育学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6] 潘懋元. 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 [J]. 中国大学教学, 2008 (03).

作者: 课题组 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12期

高校 博览

在不断改革中走向完善 高教改革需要大手笔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我们应当让全社会认识到, 没有大众化的就业, 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既想要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门槛, 又想要精英式教育下的大学分配是不现实的。

潘懋元(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适应社会需求与大学的内在精神品质应该是统一的。但大学适应社会的需求应该是一种主动的适应, 不是被动的适应, 不能把适应社会的需求简单地理解为迎合社会的需要。

沈红(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副院长): 若真正进行满足社会需求的改革, 就不只是解决就业问题, 而是要使大学全方位地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 推动社会进步之中, 归结到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之上。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 11月底, 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部署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同时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定下这样的基调。

多年来, 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然而, 现实中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在提醒我们, 高等教育必须在不断地改革中走向完善。

“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教师节前夕这段意味深长的讲话, 更加催促我们认真思考, 社会对高等教育、对大学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高等教育和大学又该如何应对? 社会需求多样、复杂, 不能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待社会需求。

记者: 应对目前大环境, 您认为社会对高等教育、对大学以及对大学生究竟有什么样的需求及要求?

纪宝成: 对社会需求本身我们要有全面深刻的认识。社会需求有的表现为人才市场的需求, 也有的并不仅仅通过市场表现出来; 有的是眼前的需求, 容易看到; 有的则是长远需求, 一时不一定看得到。所以, 绝不能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待社会需求, 因为社会需求总是多样的。

潘懋元: 社会需求是多样的、复杂的, 具有双重性。第一, 在基本要求上, 社会需要高校所培养的人才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第二, 在具体要求上, 社会需要高校的专业结构与社会的人才结构基本一致, 大学生能充分就业。因此, 高校在培养学生过程中, 若要满足社会需求, 就不能抛开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而仅仅满足于找到一份工作。其次, 高等教育应反映社会具体的不同层次、类型的需求。





沈红: 我个人认为,若真正进行满足社会需求的改革,就不只是解决就业问题,而是要使大学全方位地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之中,归结到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之上。

记者: 目前的高等教育,在哪些方面不适应社会需求?

纪宝成: 总的来说,社会需求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而这两个需求,我认为有统一,有矛盾,这也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难点之一。

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来讲,目前主要不表现在数量上,而是结构和质量的问题。我们过去长期坚持精英教育,人才选拔模式、专业设置、培养目标,都是在精英教育的背景下设计出来的。而大众化高等教育,决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还有结构和质量的要求。所以,现在的大众化只是在规模上达到了要求,结构方面根本没有很好地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大众化并非要求我们培养多少研究型人才,其最大的结构性变化应该体现在大规模培养高等职业技术人才上。在这方面,目前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没有适应需要,从根本上及时地进行调整。

另一个大问题是规模和质量的关系问题。不能不说,在规模扩大的过程中,有些路现在看来走得不慎妥当。

我特别想强调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四者的统一,规模大了是发展,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效益提高同样是发展,而且是更重要的发展,而在当前,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是前提,提升质量是核心,这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最关键的两座山,如果上去了,效益也就提高了。

我认为,应当立即实施低速增长,稳定发展的方针,让相当一批学校修养生息,以缓解这几年扩招过快积累的大量矛盾。

沈红: 大学的职能我们一般归纳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

我们经常检讨大学教学中的问题:大班课的比例,教师教学状况评价的不实,教师对课堂讲课的重视程度、内容的更新、方法的调整等等。

我们也在经常检讨大学科研问题:由于国家的重视,大学科研得到了长足发展,大学理应为国家的科学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为什么事实并不如此?一是并不是所有高校都应该做科研,二是更不是所有教师都应该、都能够做科研。

为社会服务,产学研结合固然是一种社会服务形式,但并不是所有高校都可以进行这种结合。

我想强调的是,大学的职能与社会的需求不一定是完全吻合的。我不认为大学必须满足所有的社会需求。统一的评价标准下难以凸显高校个性

记者: 许多高校求大求全、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现象的蔓延?

纪宝成: 中国的高校长期以来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这样的评价机制,让学校怎么考虑社会需求,他就考虑我能不能升“格”。不能只怪学校,因为评价机制就是这样。

潘懋元: 高校办学同质化现象严重,政府有着相当的责任。虽然社会上重理论轻应用的思想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政府的评估制度引导了高校同质化发展。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问题。目前,我国高校办学还缺乏自主权。同时高校自身的自主性、自觉性还不够,这一点甚至相当严重。

沈红: 如果评价标准是统一和近乎统一的,有哪所大学愿意凸显个性呢?如果大规模可以得到大投入,有哪所学校不想“做大”?如果投入不是按校而是按学科、按特色,如果在学校评估中设置一个“特色分”,学校是不是会用心用力办好特色专业和特色学科呢?提倡和强调是软指令,评估指标和投入是硬指令。在





中国大学很少体现特色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加强硬指令。不同类型的高校要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

记者:在上述背景下,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应从何突破,怎样体现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潘懋元:既然社会的具体需求是多样的,那么高等教育就应该分类发展,多样化发展,不同类型的高校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我认为我国的高等学校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学术型大学,也就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或所谓的“研究型”大学。二、应用型本科高校,可以是多科性或单科性的院校。三、职业技术高校,也可以是多科性或单科性的院校。从数量结构上看,学术型、应用型、职业型三者应是从少到多呈金字塔型的结构。

纪宝成:我认为当前最有效的改革之举是将高等教育明确区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个体系,分别举行高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精英教育模式下的人才选拔方法一刀切地要求所有人。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一种大手笔的创新,一种根本性的改革,我不相信会永远这样高考下去。

沈红:我的看法是,首先对中国高等学校进行恰当的分层分类。至于如何做一个科学的分层分类并让学校都自愿地、不攀比地居于应该所处的层与类中,我提出四个步骤:第一是经过学术研究兼顾国际比较和中国历史状况,给中国的高校一个层与类划分并给出相应的层与类指标。第二,由高校自己选择本校所居层与类。第三,由区域(省)内其他高校给该校一个层与类位置。第四,按学校所承认的所居位置的标准给以投入和评估。这样做到首尾相顾。没有大众化的就业,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

记者: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内外部环境需要做哪些调适?

潘懋元:从高校外部环境看,应建立多样化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分类评估引导高校分类发展。同时,在体制改革方面,要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给高校自主选择发展方向,自由竞争发展的空间。

从高校的内部改革看,高校的办学不能仅仅看结果,还要看过程。办学水平的高低体现在高校是否提高了教育质量,课程教学的质量如何,师资队伍建设如何,办学条件是否得到改善等方面。此外,除了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外,大学还有其他许多社会责任,如为社会提供服务、引领社会文化等等。就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而言,高校应该根据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构建专业。高校应重视人才培养过程的改革,教学过程的改革,包括专业设置、课程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

纪宝成:我曾经讲过,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也应当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思想的变革,我们应当让全社会认识到,没有大众化的就业,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既想要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门槛,又想要精英式教育下的大学分配是不现实的。

而对高等教育来讲,体制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在解决条块关系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有重要突破但是远未到位;政府与高校的关系问题,则早就破题,却进展迟缓。

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我主张中央的教育职能主要体现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教育的基本制度、规格、标准及实施教育的宏观调控等方面,至于学校的设置、招生计划等具体事务,多数应当逐步过度到“谁拿钱,谁为主”,中央政府部门只保持必要的、权威的监督权和否决权。

关于政府与高校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必须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按学术本位的要求“还权”、“放权”于高校,切实减少行政干预,大踏步地实现高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80年代我们学校建一座房子,盖了200多个公章,现在同样要盖200多个公章。频繁的行政监察、行政审批、行政评估,把工程、项目思维带到政府对学校的管理上来,动不动叫什么工程、什么项目,层层申报,学校办学的自主权,怎样实现?





我建议不再使用“部属”、“省属”高校的概念，代之以“国立”、“省立”的提法，保障高校的法人地位，同时探索建立不同类型、层次的大学联合会等高等教育中介组织。

沈红：尽管是大学的内部环境也需要大学自身和大学外部的共同努力，要加强对学者的学术激励，而最好的激励是学术自由的氛围和学术条件。

在环境上，在给大学一定的层次和类型划分后，各个高校就要“各司其职”。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强校带弱校的观点，因为“带”的结果是壮大了弱校，削弱了强校。这并非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路径。不能把适应社会需求简单地理解为迎合社会需要。

记者：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必然会对大学进行一些更加现实的考量。那么，如何保持一种良好的平衡？

潘懋元：服务社会需求与坚守大学内在品质是表面矛盾，内在统一的。大学理念本身即是历史思想的是继承与现实需要矛盾统一的产物，历史上每一种大学理念的出现都体现着时代对大学的新需求。因此，适应社会需求与大学的内在精神品质应该是统一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学适应社会的需求应该是一种主动的适应，不是被动的适应，不能把适应社会的需求简单地理解为迎合社会的需要。

沈红：大学内在精神及品质要为社会的发展服务，同时，大学行为与社会需求也要保持适度的距离。这种距离不是说大学跟在社会需求的后面，而是大学的精神、品质、行动要超前于社会需求。当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提出新需求时，大学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应对自如。（厦门大学葛喜艳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丰捷 来源：《光明日报》2009年12月16日

中央教科所发布“新版大学排行榜”引发关注

长期以来争议不断、备受关注的大学排行榜近日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2月9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对外发布《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报告中列出的《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绩效评价结果与排序》对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进行了排名。尽管这份报告纯属科研结果，但由于中央教科所是教育部直属国家级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因此这份大学排行榜在人们眼中具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和权威性，而其中一些与人们意料之中完全不同的排名和排名中引入的以绩效进行评价的理念，引人关注。

清华列榜首一些名校落后

在《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绩效评价结果与排序》中，除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部分名校排名符合大家对其通常的认识外，不少高校在排行榜中的位次让人惊讶。在前十名中，清华、北大位居第一、第二位，东北大学位居第三，中国人民大学位居第四，名气相对不大的电子科技大学闯进前五。紧随其后的是复旦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南大学、浙江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而一些人们通常认为排名会非常靠前的名校，这次排名却在20名之后，甚至更为落后。如武汉大学排名第22位、南京大学排名第24位、上海交通大学排名第31位、北京师范大学排名第33位、吉林大学排名第37位、南开大学排名第53位。

近半数高校“高耗低产”





《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是根据“投入产出理论”，从高校资源利用效益方面对高校进行评价后形成的一份科研报告。

为了使绩效评价思想和方法不停留于描述层次，这项研究以2006年、2007年、2008年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为数据来源，并以12项投入指标和13项产出指标为依据，对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2006~2008三年的投入与产出进行绩效评价。

其中，投入的评价指标为：校本部教职工总数、博士学历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副高以上比例、研究与发展全时人员数、科研经费总额、教育经费总额、其他经费拨款、本年度完成基建投资总额、实验室（实习场所）面积、图书册数、图书馆面积、教室面积。其中，教育、科研经费总额为教育、科研经费拨款与教育、科研事业收入之和。

产出的评价指标则为：当量在校生数、当量学历在校留学生数、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数、出版专著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特等奖数、国家三大科技奖一等奖数、国家三大科技奖二等奖数、省部级科学研究与发展成果奖数、国家级项目验收数、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金额、专利出售当年实际收入金额。

经过一系列的测算和验证，最终得出每个学校的3年整体绩效得分，这些数据显示：72所部属高校中，有近半数高校过去3年“投入多，产出少”，显得“高耗低产”；另有29所高校“产出高于投入”；还有7所高校投入和产出的排名一致，“投入产出相当”。

中部高校绩效最低

报告显示，影响高校绩效的主因是资源有效利用。报告解释说，在对高校进行绩效评价后发现：投入-产出与绩效之间形成了两大类六种组合，第一类是“高绩效”，主要原因是资源的充分利用，表现为三种组合：高投入-高产出、低投入-高产出、低投入-低产出；第二类是“低绩效”，主要原因是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也表现为三种组合关系：高投入-高产出、高投入-低产出、低投入-低产出。

而对照《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绩效评价结果与排序》发现，正是这种组合关系最终形成了让人们觉得惊讶的最终排名次序。比如东北大学位列第3，是因为其在投入得分中虽仅列38名，但在产出得分中却位列第16名，而浙江大学在投入、产出得分中都位列第3名，但最终在榜上排名第9。华中农业大学投入得分位列第53名，产出得分位列第38名，但在榜上位列第11名，远远高于投入第10名、产出第8名的武汉大学。

对这种绩效的高低与投入-产出的高低不相对应，报告解释说，绩效偏高的高校不一定投入就偏高，即使投入和产出都偏高的高校也会出现绩效偏低现象。可见，影响高校绩效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报告还显示，高校绩效呈现出地区差异，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东部地区高校的投入得分、产出得分和绩效得分都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高校的投入综合得分低于中部地区，其产出综合得分却与中部地区高校差异不大，可谓绩效偏高。

将为政府拨款提供依据

可以说，高校评价对高校健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对高校进行评价或排行是促进高校发展的一种手段，各国都在广泛采用。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外目前通用的评价与排行大都是以高校投入或产出的绝对产量为标准进行的绝对评价，即绝对产量越多，评价越高。而《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却是依据产出与投入之比对高校进行相对评价。





对此,报告表示,绝对评价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它难以反映高校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效益变化,也不能体现高校资源利用状况,且有失公平。例如,在绝对评价中,那些因历史、政策、时间等客观要素形成的高校资源积累会在评价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这样的偏向,绝对评价把获得发展资源极不相同的高校放置在相同的绝对产量标准上进行评价,使那些获得资源较少的高校即使努力也无法以绝对产量的大幅提升获得较高评价,其结果导致在评价和获得资源上强校愈强,弱校愈弱,损害了高校的办学积极性,也使绝对评价低的学校很难获得国家资源的有力配置,将陷入更为艰难的办学境地,同时还会强化一些高校的“利益聚集”,使绝对评价高的学校更容易聚集和壮大利益群体,并借此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社会资源,影响高校公平竞争发展。

报告表示,高校绩效评价并非是替代现有的绝对评价,但却是很有益的补充和丰富。一方面,绩效评价可以丰富高校评价内容和方式,对合理配置高校资源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绩效评价将为政府实施绩效拨款提供依据,同时,其所反映出的高校资源利用情况,也为高校调整与配置办学资源提供参考。

对于《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一些专业人士认为,以绩效进行排名,可以让人们以新的视角来观察大学的办学之路,对高校不能再只给投入不看效益了。但也有人认为,大学毕竟不是企业,不能简单地套用企业绩效的模式,况且各个院校的历史、特色等并不完全相同。

附: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绩效评价排序

1 清华大学 2 北京大学 3 东北大学 4 中国人民大学 5 电子科技大学 6 复旦大学 7 北京语言大学 8 中南大学 9 浙江大学 10 北京科技大学 11 华中农业大学 12 山东大学 13 天津大学 14 中国矿业大学 15 东华大学 16 华东理工大学 17 南京农业大学 18 合肥工业大学 19 西安交通大学 20 华中科技大学 21 河海大学 22 武汉大学 23 中国农业大学 24 南京大学 25 重庆大学 26 四川大学 27 兰州大学 28 北京交通大学 2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30 湖南大学 31 上海交通大学 32 北京邮电大学 33 北京师范大学 34 西南交通大学 35 大连理工大学 36 同济大学 37 吉林大学 38 中山大学 39 北京化工大学 40 东南大学 41 中国地质大学 42 北京中医药大学 43 上海外国语大学 44 武汉理工大学 45 华南理工大学 46 华中师范大学 47 长安大学 48 中国海洋大学 49 江南大学 50 西南大学 51 东北林业大学 52 中国石油大学 53 南开大学 54 北京外国语大学 55 厦门大学 5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57 中国药科大学 58 东北师范大学 59 华东师范大学 6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61 陕西师范大学 62 西南财经大学 63 上海财经大学 6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65 华北电力大学 66 中国政法大学 67 中国传媒大学 68 北京林业大学 69 中央财经大学(考虑到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独特的办学定位和学科特色,本次绩效评价暂不将其结果列入排序之中。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虽都是分为两个校区的大学,但由于在一些指标上的数据难以分离,只能将6校合为3校。)

作者:王庆环 来源:《光明日报》2009年12月11日

对外经贸大学:奢侈品管理方向研究生班2010年招生

今年9月,国内首个奢侈品管理方向研究生班在对外经贸大学开课。12月14日获悉,目前对外经贸大学正在筹备奢侈品管理方向的学士学位项目,该课程计划于明年9月开课。

第一批招收一个班,规模不超40人





在“2010中国奢侈品市场发展趋势研讨会”上了解到,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由今年1月份的86亿美元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7.5%,上涨了3个百分点。

对外经贸大学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主任朱明侠表示,明年9月学校计划开设国际贸易专业(奢侈品管理方向)的第二学士学位课程,学制两年。第一批将招收一个班,不超过40人。

第二学士学位在层次上属于大学本科后教育,已取得学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和本科应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奢侈品管理方向的第二学士学位既招收本校学生,也招收校外学生,入学须经过学校组织的统一考试。

学费每年5000元,额外收费数额未定

近年来国内各机构开设的“奢侈品管理”培训班,学费普遍不菲。北京大学连续三年开设奢侈品管理短期培训项目,前两年的学费分别是6万多元和8.9万元,今年学费则涨到了10.5万元,累计授课时间仅有15天,平均一天学费7000元。

今年9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设了国内首个奢侈品管理方向硕士研究生班,两年半到3年的硕士课程,学费高达20万元。对外经贸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此前派教师到国外学习,再加上教学成本高昂,3年20万元学费并不算贵。

对于奢侈品管理第二学士学位课程的学费,朱明侠主任介绍,按国家对于第二学士学位的统一标准,每年学费5000元,但出于实际教学需要,还会额外收取部分费用,目前数额未定。

中国奢侈品消费发展迅速,奢侈品管理人才缺口4万

奢侈品管理第二学士学位的课程设置主要包括经济基础知识以及奢侈品本土化战略、奢侈品消费者行为学、奢侈品品牌管理等个性化课程。朱明侠介绍,奢侈品管理在教学上非常重视实践、去企业实地参观,但与研究生课程不同,第二学士学位将更偏重国际贸易知识。

对外经贸大学首届奢侈品管理方向研究生班拟招20人,今年9月开学时,这个班级共招到16名学员。朱明侠主任称,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发展迅速,国内奢侈品管理行业有4万多的人才缺口,她对学生们的就业前景表示乐观。

链接: 什么是“奢侈品管理”

“奢侈品管理”在国内属于新兴的管理科学,在国外却已经有着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在法国,这类专业已形成一条龙格局,从选修基础课到硕士学位和MBA,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选学。

私人飞机、游艇、名酒以及LV、Gucci、Hermes等名牌服装、皮具……这些奢侈品和普通商品相比,在消费者心理、定价策略、产品设计、营销渠道管理、资本运营等诸方面都有特殊的规律。据了解,“奢侈品管理”课程将培养掌握奢侈品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专业管理人才。

在国内,北大、复旦、上海交大等名校近几年均开设过“奢侈品管理”培训班。2007年,对外经贸大学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奢侈品研究的机构。

作者: 关庆丰 来源: 《北京青年报》2009年12月15日




校长
著述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 多维度审视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理念

世纪之交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高等教育的大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高等教育对于中华崛起至关重要。中国在没有成为高等教育强国时，恐怕还不能说是真正崛起了。最近在高等教育界，人们谈论很多的是如何使我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成为高等教育强国。这涉及的问题自然很多，其中有共识的一点是需要好的高等教育理念。而关于高等教育理念，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又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理念至关重要。

在高教界内部，人们都非常关注大学或者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的确，这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但是，最影响我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恐怕不是大学的办学理念，而是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理念（以下简称“国家高等教育理念”）。因为众多的大学中，自然会有一些校长具有好的、先进的办学理念。哪怕现在这样的校长是少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大学校长们会学习并且结合他们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找到合适的、先进的办学理念。因之，大学的办学理念不需要政府过多的担忧，就这一点而言，无为而治倒可能更容易产生百花齐放的效果。这就是说，大学的办学理念对于一所大学、一个校长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而言则不是那么重要。国家高等教育理念则不然，它对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乃至国家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是整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挥棒。国家高等教育理念应该回答的主要问题包括：其一，国家把高等教育摆在何种位置；其二，建立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生态；其三，让大学在社会进步中扮演何种角色；其四，国家管理高等教育的基本思路。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影响国家崛起的速度。

有了好的国家高等教育理念，自然会产生一批具有好的办学理念的大学。如果相关领域和国家部门不予重视的话，仅仅有几所好的大学具有好的理念，未必就能产生好的国家高等教育理念。下文将从目标、功能、路径三个维度去审视国家高等教育理念。

一、目标维

在一段时期内，国家应该有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我国现阶段考虑的国家中长期（到 2030 年）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简单言之，应该把我国建设成高等教育强国。这一问题还应放在特定的历史方位中去考虑。世纪之交，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已经处在了崛起的进程之中。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希望这一进程不仅要加快，而且是可持续的。欲如此，高等教育起着很关键的作用。看看历史上英国、德国、美国的崛起，无一不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强国。非但如此，其中还包括高等教育理念的创新。如德国洪堡时期开始的崇尚科研，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开始的社会服务理念，对德国和美国的发展和崛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今后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不仅是中国崛起进程的需要，也是此进程的必然。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为目标，首先需要清楚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标志是什么？笔者认为，无非有二：其一，中国大学未来将培养出一批世界级的人才，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二，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学生愿意到中国来接受高等教育。

目标的另外一个因素是高等教育体系。可以想象，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志主要体现在少数一流大学中。但作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却不能仅仅考虑少数几所大学，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体系。美国今天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如果它没有一批州立大学甚至社区大学的存在，那些一流大学也未必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大概也不可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一流大学必定与



众多的一般大学伴随在一起。高等教育体系目标应包括：中国高等院校类型及其成分，区域分布等等。国家在支持一流大学的建设时，显然需要考虑区域的因素。这其实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同样可以想象，如果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过分集中在几个城市，还难以令人信服地说明它的高等教育强国的地位。

二、功能维

今天，中国很多大学强调三大基本功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此乃众所周知。笔者认为，未来中国要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其一流大学一定要具有“引领”的功能。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大学（即使是中国一流大学）普遍欠缺的。在规划国家中长期的教育发展时，突出大学的引领作用，应该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理念的基本内涵。并且，引领的作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在科学与技术方面，二是除了科技的社会进步方面。

最近十年来，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成倍增长，中国的一流大学不断致力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总体上看，我们的研究成果多属于跟踪的、或集成创新，真正原创的少。这就是说，我国大学的研究对国家科技的引领作用还很不够。造成这种现象当然有其必然性，是我国科技和高等教育发展必经的过程。但另一方面，尽管其中必然原因很多，但不容否认的是，我国科技、教育部门的导向亦存在值得反思之处。作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理念，需要尽快让大学在引领国家科技进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难预测到，随着中国向创新型国家迈进，中国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越来越高，中国大学未来在企业科技工作中若仅靠集成创新、仅靠解决某些工程问题，就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了。今后，中国大学即便在社会服务中也应该强调引领作用。

除了科技之外，社会进步还涉及到很多方面。中国大学目前在除科技之外的社会进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则更是微乎其微了。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之巨大变化。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举世瞩目，自不必言。但就社会生活这方面，变化之大，实在惊人。曾经有很多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愤怒有余；我们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还得讨论姓“资”还是姓“社”；曾经我们对市场经济讳莫如深；我们不敢批评政府的官员；曾经我们对人权的概念嗤之以鼻……。这些在今天全变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做的很多事情，甚至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曾经是不容许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恰恰是改革和观念的改变给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和人民从那些改革、变化和进步中得到了好处。我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这些改革、变化、进步是靠谁引领的？答曰：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确，对此中国人民应该永远心存感激。不妨进一步发问，在类似的改革与变化中，大学发挥了何种引领作用？客观言，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更应该强调思想统一，更应该强调平稳，所以大学少有引领作用也是必然的。那么未来二三十年呢？中国的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是否依然在此类问题上作壁上观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的大学未来一定要在社会进步的广泛领域发挥引领作用。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历史条件不一样。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国家变得更强大，党和国家的自信心更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增强了，如此等等。其次，历史方位不一样。今后的二三十年，将大不同于以前的30年，更不同于早期拨乱反正的年代。在百废待兴的时代，社会进步靠领导人的引领就够了。今后却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年代，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时代，也是中国更深融入世界的年代，甚至是中国未来逐步引领世界的年代。要如此，肯定需要改变更多的不适应国家快速崛起的观念、体制等。欲如此，仅靠领导人的号召和决策是不够的。其三，历史责任不一样。今后二三十年内，中国势必出现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大学更多地肩负着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责任。而未来，那些一流大学理所当然地肩负着引领中华崛起的历史责任。可以想见，今后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将进一步加强。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新时代赋予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脊梁的引领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理论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改革开放、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精神文化的导向方面，甚至党自身的发展方面，未来党和政府应该更加鼓励大学走在前面，起到引领作用。





三、路径维

清楚了国家未来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和功能,那么通过何种路径去实现其功能和达到其目标?这也属于国家高等教育理念之范畴。路径设计自然不那么简单,所涉及的问题也颇多,这里仅描述几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其一,预算投入。国家对高等教育是否重视,主要不是表现在宣示上,而且应表现在具体的举措上,预算投入则是最重要的。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的确作出了很大努力,大大增加了教育经费。但随着国家进一步的发展,未来若干年内,我们对教育的投入还应该增加到新的水平。这既是国家崛起的需要,也是人民的期望。

其二,领导机制是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的大学必须要由共产党来领导,这一点未来也不会受到挑战。但是目前中国大学的领导机制在实践中又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目前大学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大学办学的自主权不够,大学内部官气颇足,大学精神缺失,其实都与领导问题有关。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党和政府如何管理大学?管到什么程度?通过何种形式?二是,大学内部的领导形式,如何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形式?作为国家中长期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此问题不能不触及。

其三,高等教育生态。从国家层面上考虑高等教育,必须要着眼于培育一个好的高等教育生态。有了好的生态,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才能百花齐放。那时,中国才可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才有可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一所大学办得如何,政府未必能发挥关键作用,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生态如何,某一所大学难以有所作为,而政府却是能起到关键作用。

教育生态涉及到的问题也很多,这里仅提及若干主要因素。

首先,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环境中最基本的问题。高等教育一样需要多样性。其实,教育界人士及政府已经理解到多样性的意义,问题是坚持不够。今后,多一份坚持,则不会有那么多升格的大学;多一份坚持,则不会有那么多博士点;多一份坚持,则不会有那么多学校追求综合性;多一份坚持,评估不会受到那么多批评;多一份坚持,高等院校会更加追求个性而且也更具特色,中国高等教育之园中百花将更加鲜艳。需要注意的是,好的教育生态会带来百花齐放,反之,百花齐放也会带来好的教育生态。坚持多样性、坚持百花齐放,就自然会产生好的国家高等教育理念。因为,从各个大学的办学理念中一定能够凝练出适合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共性理念。前述的德国崇尚科研和美国的社会服务理念都是从大学的办学理念中凝练出来。

其次,学术自由。此乃大学之魂。国家是否真正鼓励这一点,是建立好的高等教育生态的关键,也是我们未来能否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之一。学术自由的本质是鼓励学者探索、探求,而这种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创新之魂,也是培育各种创新型人才的沃土。蔡元培当初在北京大学推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对于北京大学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现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能说此理念仅适合于过去,不适合于将来。真正的困难不在于大学的教育管理者对此的理解和宣示,而是国家对此的真正认可,以及在实践中能否把这一理念真正变成一种习惯。

第三,评价体系。这里讲的评价体系是指政府层面的,而非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之所以重要,乃在于它实际上告诉了高等院校的竞争方向。政府鼓励什么,大学应该追求什么,大学获取更多资源的条件是什么……,都隐含在其中了。评价体系首先涉及到质量观,这是评价大学水平的根本。尽管人们关于质量的看法也不尽统一,但是政府关于大学的质量观却极大地影响着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同时,评价体系制定的主体很重要,是官员还是教育家?评价体系的制定即使表面上是由专家们行使,背后的主体未必就是专家。此外,资源分配的主导也是重要因素。这是一种变相的评价。具体而言,评价体系表现在教学评估、各种评奖、资源分配(如“211工程”,“985工程”等)等,甚至高校主要领导的遴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高校工作的评价。





第四,开放性。高等教育生态绝不是封闭于大学中,甚至不是封闭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开放性表现在高等教育与其前后端的联系,即与中等教育和社会的联系。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高等教育如何影响中等教育?招生机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是高等教育生态的主要问题之一。开放性必须体现在与社会及业界的联系,此联系不仅表现在大学对社会的服务,而且表现在社会 and 业界对大学教育的影响和作用。另外,大学的学生(包括研究生)在学校里,知识面到什么程度为宜?实践能力应该到什么程度?哪些知识或能力应该是在社会和业界中接受再教育的?要培育一个好的教育生态,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五,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教育理念当然是理论。遗憾的是,我国近些年关于教育理念的研究很多,但真正指导实践的又不明显。有些文章其实有深度,但却是用教育实践者很难懂的语言去描述,实在不利于理论在实践中的传播。理论如果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其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另外一方面,很多大学教师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既缺乏理论的指导,又缺乏向理论的升华。

总之,与时俱进是改革者永远应该记住的基本道理。不如此,我国难以成为高等教育的强国,更难以真正在世界上崛起。从国家中长期高等教育的发展角度思考国家高等教育理念,需要我们改变观念。一要在继承中改革,在改革中继承。我国高等教育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仅此就注定了继承的必要性。但真正有意义的继承是在改革中的继承。因为任何时候当前政策或机制中都存在不适应未来发展的因素,这就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改革。所谓“变则通,通则久”。对过去某些做法的改革与变化不等于否定过去,言某项政策或某种观念要改,并不等于说此前这样做是错的,只不过是表明,以前的那种做法不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二要敢于自我批判,未来的高等教育要在不断的自我批判中成长并增强自己的生命活力。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对过去某些做法的批判。要相信,我们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我们已经足够强大,自信地面对批判将使我国高等教育更加成功和更加强大。三要有时空观念。应该尽可能在世界语境中探讨我国今后的高等教育。强国本来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概念。仅仅在国内比较或分析,则无所谓强国。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当前语境。设想我们在30年前的语境中探讨今天的发展,不会有多大意义。如果说作为国家正式成文的规划应谨慎一些,那么至少在研究上则不必顾虑太多。与时俱进,唯变所适,恐怕是从国家层面思考未来高等教育理念的基本原则。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李培根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第22期

时政述评

中国青年真的连提问都不会吗?

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北大学子的7个问题曾引发舆论热议,充满火药味和缺乏善意是当时有代表性的指责;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上海400名青年也提了7个问题,又引发了热议。这次的理由完全不同:平淡无奇、太软。据11月28日《南方人物周刊》报道:一位目睹了整个交流活动的上海市主要领导,很感慨地对身边人说:这些上海孩子啊,比起北方人啊,就是软!很多网民讨论认为,“从给奥巴马提的这些问题看,这些来自上海名校的大学生,无论是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对事物的洞察力,还是政治敏锐性,都有待提高。”

这事儿很奇怪,当初硬也不是,现在软也不是,难道中国青年真的连提问题都不会了吗?学生肯定不乐意,因为站在学子们的角度,他们是做了认真准备的,并以极大的善意“为对方着想、为大局着想”。但耐心想一想,或许,这种软了硬了都会受到指责,除了暴露出指责者的苛刻、过分放大一次对话的提问之外,还真就与我们习惯性的太多“着想”有关。

比如第一个提问的复旦大学女孩陈曦说,她构思了很多问题,有经济的、政治的、生活的,没想到会是第一个提问的。于是,“就选择了一个稍微委婉的问题,以调动现场的气氛”。替奥巴马着想的不止陈





曦一人，第二个提问的钱文韬，就认为自己的问题不尖锐，比较温和，因为“这样才更能体现中国青年的特点”。

面对这篇报道，我一再思考，假如换成自己，面对奥巴马会提出怎样的问题呢？是软的还是硬的？是咄咄逼人还是“善解人意”？思考的结论是——或许这已经是一个伪命题了，根本就不需要我自己来决定，到时候“话语环境”自然会告诉我该怎么办。据记者的采访，这400名学生在8所大学的遴选，虽然政府没做要求，但很多大学都是按政治素质好、英文水平高、形象要好一点的标准“选择”出来的，有的被明确告知，参加这项外事活动还要参加一个培训。

或许正因如此，学子们也懂得了怎样揣摩并试图掌握“分寸”。从积极层面，这是中国人对奥巴马总统的重视，也体现了我们的朴素与善意；但从消极层面，这也造成了宽泛、平淡、缺乏锐气朝气提问的出现。实际上，懂点演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演讲人的发挥水平常常和提问者的发问有紧密联系，常常遇弱则弱，遇强则强。是不是尖锐的问题就是不善意呢？显然也不是。昨日有媒体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出2009年影响世界的100位“思想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名列第九，理由正是因为周小川今年深刻地批评了美国经济体制，并“挑战”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只要有独立的思考，哪怕是犀利的批评，也会让被批评者肃然起敬。

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不相信，青年学子就不懂得什么是外交礼节，就想不出来精彩的提问，就不能自信地和一个外国元首“在亲切友好地氛围中”探讨带有挑战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雍容大度，要体现于每一个人的雍容自信；一个人的雍容大度，要体现于这个人的独立思考与理性发问。一群青年怎么提问，也能映照出他们怎么思考，不会问，焉会答，这是中国青年深刻介入全球化时代的“试金石”，没有理由仍然被一种“保姆心态”所笼罩。或许，原汁原味的“真实”，是化解舆论关于那些“软硬”之争的最好法宝。

作者：毕诗成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2日



从“超级市场”到“专卖店”

——美国高校管理模式的新趋向

摘要：美国高校管理模式经历了四个阶段：过渡阶段的殖民地学院管理；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的“知识工厂”式管理；20世纪的“超级市场”式管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专卖店”式管理。“专卖店”式管理模式体现为三个特征：消费者成分日趋复杂；服务更加高效便捷，物美价廉；网络教育异军突起，很可能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专卖店”。美国高校“专卖店”管理模式虽有不足之处，但对中国的高校管理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

关键词：“专卖店”，美国高校，管理模式，新趋向

美国自1636年在美洲新大陆成立第一所高等学府Harvard学院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随着高校教育管理实践的变化，高校管理模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从‘象牙塔’的管理模式，走向‘知识工厂’的管理模式，并进一步走向‘超级市场’的管理模式”[1]（p47）。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美国的高校管理开始步入“专卖店”式管理阶段。





一、美国高校管理模式的演变

至20世纪末,美国高校管理模式经历了过渡阶段的殖民地学院管理、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的“知识工厂”式管理、20世纪的“超级市场”式管理三种管理模式的演变。

1. 过渡阶段的殖民地学院管理

美国殖民地学院的管理既不是“象牙塔”的管理模式,也不是“知识工厂”的管理模式,而是处于从“象牙塔”的管理模式向“知识工厂”的管理模式过渡的阶段。

殖民地时期草创的学院深受当时英国大学的影响,“牛津及剑桥这两所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尤其是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影响美新殖民地的学院最深”[2]。但其“由校外非教育行业人士(layman)决定学校事务的组织管理方式与欧洲传统上的大学自治的模式迥然不同”[3]。殖民地学院一改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象牙塔”模式,开始与社会发生联系,这一时期创办的九所殖民地学院几乎都将为教会培养宗教人士和为政府培养有文化的管理人员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致力于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所以,殖民地时期的学院管理仅仅保留了“象牙塔”式管理模式的些许遗风(如宗教性),失去了“象牙塔”式管理模式的诸多特性(如行会性、国际性、自治性等)。因此,殖民地时期的学院管理已大大不同于“象牙塔”式管理模式,而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2. 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的“知识工厂”式管理模式

作为“知识工厂”的大学,不仅强调知识的传播,而且将知识的生产作为其重要职能,大学成为“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4]。威廉·洪堡在19世纪初创办的柏林大学集中体现了大学的“知识工厂”倾向,塑造了大学的“知识工厂”形象。美国这一时期的“知识工厂”式管理模式又可大致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是美国独立到南北战争爆发前,美国高校初步显露“知识工厂”特征阶段。以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为标志的州立大学的兴起,揭开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篇章,州立大学摆脱了殖民地学院以古典语言为核心的博雅教育及全部必修的课程体系,增设自然科学、现代英语及农业、商业等实用课程,开展了专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大学管理也随之转变为“知识工厂”的管理模式,只是此时的“知识工厂”管理模式还未充分显示其所有特征,处于萌芽阶段。

二是南北战争后,美国“知识工厂”管理模式全面发展并最终形成阶段。这一阶段,随着研究生教育及专业教育的发展,大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动力站”。“美国于1876年创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则因袭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以研究生的培养为主要任务,以知识的生产为目标,标志着其研究模式开始形成。霍普金斯大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工厂’”[1](p49)。这一阶段,“知识工厂”的管理模式得到全面发展,充分展示了这一模式的丰富特征:强调对“知识的生产 and 加工过程的管理,大学管理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工厂模式的,学术权力在其中起着支配作用”[1](p47)。

3. 20世纪的“超级市场”式管理模式

进入20世纪,“随着大学把服务社会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大学管理也开始以服务为旨趣,以满足各种‘教育顾客’的需要。因此,有人把现代大学形象地比喻为购物中心、连锁商店、超级市场”[1](p50)。创建于1848年的威斯康星大学就是其中的代表,美国许多大学以威斯康星大学为榜样,使大学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服务社会生活作为其基本职能,“大学的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不再是超凡脱俗的‘象牙塔’,不再是强调科学研究的‘知识工厂’,而是服务于‘教育顾客’的超级市场”[1](p50)。大学的管理模式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市场”的管理模式。

二、美国高校“专卖店”管理模式产生的背景





美国高校“专卖店”管理模式的产生从外部看有其特定的政治与经济社会背景,从内部看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对美国高校变革的深入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高等教育已经从成长型产业转变为成熟型产业。于是,公众及作为最大出资者的政府对高校的理解和对高等教育的要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美国政府已经在财力上和政治上逐步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大大缩减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形势。面对变化的要求,高等教育的回应却异常迟钝。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亚瑟·莱文指出,美国各大院校除了提高学费标准、削减非重要部门的开支来应对新的困境外,一般都成立了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战略规划委员会,选择重点任务,“它们不得不裁撤重叠和冗余的部门,其中既有学校的中心部门也有涉及学校竞争力的机构,这样一来就使学校自身更具专业化和独立性的特征。大学便从提供百货大楼式的全面服务,转向奉献各具专业特色的‘专卖店’式的服务。人们普遍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必须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但现实情况是学校要用更少的资源去做少而精的事”[5](p40)。

莱文据此进一步做出了大胆的预设,认为“这些变化很可能是长久性的。即使政府有了更充足的资金,或者高等教育再次成为优先发展的项目,这些变化也不会消失”[5](p40)。莱文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政府对待成熟产业的方式完全不同于成长型产业。对成熟产业,它重在规范和控制。政府经常对成熟产业的成本、效率、生产率和效能等提出各种质疑,并试图限制成熟产业的规模和资助。政府还削减了成熟产业的自主权,加强管制,并要求其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5](p39)。政府对学院和大学吹毛求疵,提出了更多以前从未提到过的问题,如高校办学成本的不断加强受到多方质疑,高等教育的学费也一再受到激烈批评,学生资助制度再次受到审查,等等。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强,诸如“傲慢”、“自私”等词经常被议会用来形容学院与大学。而对待成长型产业的高等教育,它重在扶持,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政府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

进入21世纪,美国已经从工业经济社会走向信息经济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通过知识和信息,而不是通过曾经作为美国工业社会标志的自然资源或体力劳动来创造财富的社会。美国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国家为中心,重视物质资本,包括种植业、制造业等。相反,信息社会是全球性的,重视知识资本和获取知识的人。信息经济社会要求劳动者拥有比工业经济社会更高层次的技能和知识,因此,教育是信息经济社会的基础。在美国社会中,最好的工作越来越要求求职者拥有比以往更高的学历”[5](p43)。“信息社会意味着更多的高等教育、更高的学位、更多的继续教育和全球化的高等教育市场,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其一生中能够随时接受高等教育。新的教育观念是,教育要适应工作场所的需要,而不是迎合教授群体的愿望”[5](p44)。

20世纪4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20世纪下半叶,美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教育迈入“普及化”教育阶段[6]。在大学这个“超级市场”里,“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复杂。无论是大学办学方式、组织结构,还是教育内容、学生管理和教师管理,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p51)。作为“超级市场”的大学管理面临着困境。

美国高校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要树立自己的教育品牌。在美国,一个缺乏自己教育品牌的高校毫无声誉可言,一个没有声誉的高校注定要失去其应有的市场份额。于是,美国高校的管理模式从“超级市场”转向“专卖店”。

三、美国高校“专卖店”管理模式及其特点

美国高等教育虽以办学层次多元化和人才培养目标多样化而著称,但也同样存在趋同的一面,“美国多数大学和学院的基本情况大体相似,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表现在诸如专业计划的数量、‘升级方式’、研究生规模等一些方面”[5](p40)。





根据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最新分类,美国高校大致可分为博士学位授予大学、硕士型学院与大学、学士型学院、副学士型学院、专门重点院校及原住民学院。这些不同类型的高校都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在实现各自的目标时,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之间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竞争,一所社区学院不会向一所著名的文理学院挑战,一所文理学院也不会与著名的研究型大学竞争。但是在美国,各个类型的院校都有成百上千所,它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7]。

显然,美国高校的趋同表现在同一类型的不同高校之间,而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之间不存在趋同,这一点明显有别于我国不同类型的高校均向研究型大学看齐的极端趋同发展。美国同一类型的高校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必须在成百上千的高校中间准确定位,打造自己的专卖品牌,彰显自己的办学特色,以此来吸引需求千变万化的消费者,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总的来说,作为“专卖店”的高校管理,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消费者成分日趋复杂。莱文认为,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最大的变化可能表现在生源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高校招生中增加的学生大部分都不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高考入学的。到1993年,在所有大学生中,有38%的学生的年龄在25岁以上,61%的是在职学生,56%的是女学生,42%的是非全日制学生。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本科生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生,即在18~22岁之间的全日制学生”[5](p44)。这就意味着过去那种以全日制本科生为主的高等学校已经成为过去。上大学成为大学生所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之一。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已经不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工作和家庭也许更加重要。

第二,服务更加高效便捷,物美价廉。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建立在“就近原则”之上,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个公民都能跨越地域的差距而接受高等教育。如今,90%以上的人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5](p49)。新的消费群体想与高校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学生的新型关系,特别是那些年龄稍长的、非全日制的、在职的尤其是有孩子的学生希望和学校之间是一种消费关系,“他们希望学校离家比较近,开课时间正好符合自己的要求,学校最好能24小时提供服务”[5](p44)。他们希望学校建有停车场,无需排队,没有过多的限制,教师谦逊礼貌、乐于助人,且教学能力强,同时希望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物美价廉”。“现在,学生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如同他们作为消费者对其他消费的要求一样,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便利、服务、质量和低成本等方面”[5](p45)。

第三,网络教育异军突起,很可能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专卖店”。新的消费群体也发现远程网络教育对自己极具吸引力,因为在家里或在办公室就能方便地接受教学服务。面对如此巨大的消费需求,当今美国的网络教育方兴未艾,不仅各大高校开始发展网络教育,如纽约大学创立了纽约大学在线有限公司,它是一个营利性的服务机构,主要产出和销售在线课程,并向顾客提供咨询服务。威斯康星大学系统与莲花公司(Lotus)合作创办了教育创新中心,它向全球提供大学课程与学位教育,已经开发了565门课程。内布拉斯加大学也正在创办全球性的课程及学位教育服务供应系统。夏威夷大学运用双路视频、电缆、卫星和因特网,在全州范围提供13种学位教育项目服务[5](p51)。

不过介入网络教育最多的还是私营营利性部门,“一份未公开的近期研究表明,有72个私营部门的公司已经进入了远程高等教育市场。例如,迈克尔·密尔肯、洛厄尔·密尔肯和甲骨文公司(Oracle)的拉里·埃利森创办了一家名叫知识天地(knowledge Universe)的营利性网络大学”[5](p52)。琼斯教育公司最近获得了地区院校协会的认证,通过美国在线将电子合格证书与合作大学的学位教育项目结合起来,已经实现了成为世界性电子化大学的目标。由此可见,在远程教育领域,网络教育提供商采用同样的方法完全可能树立起自己的品牌,从而使自己与那些著名的传统的实体学院和大学分庭抗礼。

四、美国高校“专卖店”管理模式简评

“专卖店”管理模式诞生于美国从工业经济社会走向信息经济社会的时期,此时,对于作为成熟型产业的高等教育,美国政府已经在财力上和政治上大大减少了对它的支持力度。无疑,“专卖店”管理模式





在顺应美国多变的社会需求中满足了教育消费者“个性化教育”的需要,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消费者“众口难调”的难题,较为成功地应对了美国高校不断变化的生源。为了回应美国各界对于高等教育成本增长、质量降低、生产率低下、生产效果不佳的激烈批评,美国高教管理界做出调整,管理模式从“超级市场”转向“专卖店”。

但它只是美国高校战略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美国高教管理界在管理实践中的一项创举和可贵探索。它本身还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它不能包治百病,解决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而且,它本身也有不足之处,比如,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大学聘用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去负责招收更多的学生;招聘了更多的开发人员负责筹集更多的资金;聘用了越来越多专业的学生事务管理人员以应对学生间的矛盾与摩擦;聘用了更多的财会人员来控制开支。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措施只是增加了成本,而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收入。大学在削减非重要部门的开支与保证教育质量的承诺方面也很不成功。相反,这些措施的实施是以牺牲教育质量来避免学校的破产,因此,保证质量的承诺只能是停留在口头上[5](p41-42)。

五、“专卖店”管理模式对中国高校管理的启示与借鉴

尽管“专卖店”管理模式存在不足之处,但对中国的高校管理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在21世纪,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都处在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中国的高校也不例外。虽然我们不能确定高等教育能否像它以往曾经做到的那样顽强地继续存在下去,但私营部门的参与无疑将使高等教育发生巨大变化,现有高等教育的结构和体系将发生重大改变。世界正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与以往相比,高等教育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人口结构的重大改变、削减高等教育成本的压力、新科技的发展以及大量竞争者的涌现等。这一切使得高等教育不得不做出两种选择:改革与革命。改革意味着教育者和管理者要重新思考高等教育在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时,怎样才能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而如果教育者依旧没有任何行动的话,一场决定谁来主导高等教育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5](p57)。

与美国高校“专卖店”管理模式相比,中国高校的管理显得僵化有余,灵活性不足。多数中国高校的管理依然在历史的惯性推动下运作,缺少生机与活力。高等教育外在环境的变化并非只发生在美国,处于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与1999年扩招前的精英化高等教育相比,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甚至是徒劳地抗拒这种变化,更谈不上去积极应对新的现实,做出开拓性的探索。如果说,“一场决定谁来主导高等教育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对于中国的高校来说还为时尚早的话,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果中国高校的管理者依然昏睡在历史的惯性之中,而没有任何行动的话,那么一场决定谁来主导高等教育的革命最终一定会到来。

参考文献

- [1] 程晋宽.从“象牙塔”到“知识工厂”,再到“超级市场”[J].教育与现代化,2006,(4).
- [2] 林玉体.美国高等教育之发展[M].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
- [3] 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4.
- [4]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6.
- [5] Philip G, Altbach. In Defense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6] 王廷芳.美国高等教育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151-157.
- [7] 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74.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余承海 程晋宽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09年第5期

